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现代科技与人文大观

方方面面说宗教



方方面面说宗教

1. 形形色色的宗教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宗教，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没有不存在宗教的国家，也没有不存在宗教的民族，甚至没有不存在宗教的部落；一方面，有不少老宗教已经消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又有无数新宗教在不断诞生，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宗教划分出一些类型。

划分宗教类型的方法也有多种。如果我们按照宗教的发展演化来划分，有原始宗教（如氏族社会时期的各种实物崇拜）、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宗教）、历史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近现代宗教（如新教各主流教派和巴哈教）。如果按照各宗教所崇拜对象之性质特点来划分，又有多神教（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宗教）、二神教（如琐罗亚斯德教）、一神教（如犹太教）、交替主神教（如古印度教）。通常我们按照宗教流传的范围来分类，有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属于世界性宗教的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佛教、伊斯兰教、新近发展迅速而分布广泛的巴哈教；属于地区性、民族性的宗教主要有犹太教、神道教、印度教、锡克教、道教、耆那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等；迄今也还有一些宗教仍保持着部落宗教的风貌，如本教、萨满教、东巴教以及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一些土著民族的宗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分类方法，这些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它们为研究宗教提供了不同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形形色色的宗教。

从古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今天，各种宗教信徒仍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3/5 以上。以三大世界宗教为例，基督教分布在 25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天主教徒约 10 亿，东正教徒约 16000 万，新教徒约 36000 万。伊斯兰教分布在 172 个国家和地区，共有教徒约 93000 万；佛教分布在 86 个国家和地区，共有教徒约 3 亿多。

2. 宗教定义与宗教观

尽管人类的绝大部分都信仰宗教，人类思想的众多杰出代表都研究过宗教，但是，关于什么是宗教，即宗教定义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众说纷坛见仁见智的问题。宗教学的创始人，德裔英籍学者迈克斯·缪勒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多少种宗教，就会有多少种宗教定义。即使我们不能说世界上有多少宗教研究者，就有多少不同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但是我们都能说，在这方面所呈现的，确实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景象。

综观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类如下：

（1）着眼于崇拜对象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这类定义多出于宗教人类学家和宗教历史学家。缪勒认为，宗教就是对于某种无限存在物的信仰。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认为，宗教是对精灵实体的信仰。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英国学者弗雷泽，则把宗教说成是人超自然超人间的权威力量安抚并祈求和解的手段。英国哲学家皮尔逊认为，宗教是有限者与无限者之间的关系。

（2）着眼于信仰者个人体验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这类定义多出自宗教心理学家和宗教现象学家。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詹姆士将宗教定义为个人在其孤单中觉得他与任何一种他认为是神圣的对象保持关联时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德国宗教现象学家奥托则认为，宗教是对神既敬畏又向

往的感情交织。

(3) 着眼于宗教与社会之关系以及宗教之功能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宗教社会学家多采用这类定义。如美国学者英格把宗教规定为人们藉以同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体系。日本学者岸本英夫认为宗教是使人生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手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格尔则说，宗教是人建造神圣世界的活动。

(4) 从文化角度出发的宗教观。这类看法随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日益扩大和深入而逐渐增多。如在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体系中，宗教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与之相连的是对形而上学和人生之谜的意识，是对全面解答的寻求。意大利思想家让蒂尔将思想行为划分为主体、客体及二者之综合，他认为宗教是客体的精神形式即客体之升华。英国文化哲学家道森认为，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因为它是文化内部的连续性原则和创造性源泉。

(5) 从哲学角度出发的宗教观。宗教与哲学从来就有不解之缘，因为二者都关注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神学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哲学家也常常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来看待宗教。于是我们又有了从绝对唯心主义、人格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分析哲学、过程哲学等等出发的宗教观。限于篇幅，在此无法逐一说明，仅以存在主义为例，德—美神学家蒂里希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之说，就是一种影响极大的宗教定义或宗教观。

五花八门的宗教定义和宗教观，不仅说明了研究者的不同视角，而且说明了宗教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当我们解剖一下宗教的实质内容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是神道教还是犹太教，一般而言，其构成要素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信仰的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一还是多，是神灵还是自然物，都具有超乎人间的力量，并同人有某种关联。这是宗教的核心。第二是信仰者的行为与活动，包括祭献、祈祷、敬拜、守斋、朝圣等等，这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第三是信仰者的组织与制度，例如基督教的教会、佛教的僧伽之类，这是宗教存在的外在形态。第四是信仰者的宗教情感与体验，即其对信仰对象的亲身经验，这是宗教存在的内在前提。第五是教义理论，这是对信仰内容的阐释表述。当然，在一些低级宗教中，某些要素并不明显，但是在任何宗教中，核心要素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总是存在的。正是由于有这么多要素构成了宗教的内容，它才具有了比伦理、哲学等意识形态更加多姿多彩的形式。

宗教与迷信不同。迷信类似于巫术，是一种“伪宗教”或“前宗教”。它的目的是要借助某种超自然力量测知并控制世上的事物，要“神力”服务于自我利益。它关切的是眼下的、实际的、世间的事物和自我，也即是“非终极者”。而真正的宗教则要为人寻求“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或价值根基，要人的利益和行为符合于“神意”。要人超越自我。它关注的是“终极者”，即世界之根基或万有之源泉，就是说，真正宗教的终极关切是超乎于此世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以上各种因素常常是杂然并存，很难分开的。

3. 宗教的起源与根源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也有发生发展的过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原始时代已有了宗教的萌芽。宗教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信仰者认

为宗教来源于神的启示，研究者也有各不相同说法。这种种的差异又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多元的图景。在宗教学中，最有影响的宗教起源论有如下几种：

(1) 自然神话论。此说发端于一些研究印度日耳曼语言学与民族学的学者。这种学说认为宗教的来源和最早形式是自然神话，尤其是关于天体的神话，是对自然神话中的自然物的人格化。

(2) 实物崇拜论。法国学者布罗斯最先提出宗教的原始形态是实物崇拜和自然崇拜，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又发展了此说。孔德认为最早的宗教是对自然物体的崇拜，而不论这些物体是否有神寓于其中，直到后来，某些实物才被人格化或神化。

(3) 万物有灵论。这是泰勒的著名学说。泰勒认为，原始人根据自身不能解释的现象如梦幻、疾病、出神、死亡等亲身体会，得出了身体与灵魂不同这一看法，形成了关于灵魂的概念，后又将灵魂赋予天地万物，认为万物皆有灵魂。泰勒认为万物有灵崇拜要先于实物崇拜和自然崇拜，它是宗教的源泉。

(4) 前万物有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万物有灵论之前还有某种更为原始的宗教形式。它的主要代表是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马雷特认为原始人相信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对之怀有惊奇与敬畏感，随之产生相应的禁忌规定以及各种活动。如美拉尼西亚人的“玛纳”就是前万物有灵论的典型形式。

(5) 巫术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原始人最初企图用巫术来控制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失效后，才转向对神灵的祈求，因而巫术先于宗教。

(6) 祖先崇拜论。这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宗教起源观。斯宾塞认为，原始人几乎都信仰人死后其灵魂继续存在，对死者鬼魂的崇拜就是广义的祖先崇拜，它是一切宗教的根源。

(7) 图腾崇拜论。这是法国学者、宗教社会学鼻祖杜尔凯姆的著名观点。此学说认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与其意识形态混为一体，因而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就以某种被认为与其祖先有关的动物或植物作为其标记，即图腾，并对之进行崇拜。图腾遂成为氏族成员认同的关键，也成为氏族的凝聚力量。后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又提出，由于原始部落的家长占有所有女性，使其儿子嫉恨而被杀，夺取了父亲位置的儿子们对原始部落家长的回忆或对象征家长的动物的崇拜，导致了宗教的起源。

(8) 原始启示说。此说由奥地利学者施米特和苏格兰人类学家朗格提出。这种观点认为最原始的部落信仰的是一神教的至上神，而这种信仰起源于上帝对人类的原始启示，后来才退化成多神信仰和多神崇拜。

除了上述种种侧重于宗教在时间上的发生的宗教起源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非时间性因素或人类结构来探究宗教起源问题。

(9) 情绪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的无意识的恐惧和需要，或者人极其强烈的有意识的体验。例如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就认为宗教起源于对逆境的体验。

(10) 本能理论。当代不少研究者认为宗教是人的禀赋，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能力，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这种理论把宗教的根源归于人类自身的结构或人的本性。

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有其侧重点，往往也因而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对后人深刻地、全面地探索宗教起源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些学说像一条条溪流，从不同的方面汇成一条大河，丰富了人对宗教起源的认识。

4. 宗教的发展与演变

在宗教的发展或演变问题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理论。这些看法和理论多数是以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即认为宗教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简到繁的过程。例如从范围上来看，宗教经历了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再到世界宗教的发展；从时间上来看，宗教经历了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历史宗教（有些学者认为是中世纪宗教）、近代宗教、当代宗教几个阶段；从宗教的核心即神灵的性质来看，宗教经历了从低级的实物崇拜到多神崇拜的过程，后来才发展出高级的一神教形式。除此之外，宗教进化论还有从自然宗教到自由的主观宗教再到绝对宗教的黑格尔模式；有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霍夫丁（丹麦哲学家）模式；有从以古希腊宗教为代表的客观宗教（多神论到泛神论）到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主观宗教（一神论和超神论），再到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普遍宗教的克尔德（英国哲学家）模式；有从神人同形同性论到道德宗教再到宇宙宗教的爱因斯坦模式，等等。除了进化论的宗教发展理论之外，还有一些理论不从进化角度去看待宗教演变，如前边提到的施米特的原始启示说，在宗教演变方面就是一种退化论。

所谓发展，就是变化的过程，变化过程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形态上，既有量的增减，也有质的不同。

宗教这种现象是人类探索自身奥秘和世界奥秘的一种表现。原始人的宗教一般是一种低级的宗教，但也是这种探索的结果。例如，原始的图腾崇拜实际上就反映了氏族对自身来源的探求和对血缘关系的认识。此外，各种生殖崇拜、鬼魂崇拜、精灵崇拜等等都有类似的性质。原始人关于自己氏族或祖先的神话传说，构成了原始宗教的象征体系。原始人的宗教活动主要由各种仪式构成，所有的氏族成员都参与这些仪式并在其中扮演神话中的某个角色，那里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也没有纯粹的观众，而只有人与神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始宗教也是一种自然宗教，它具有自发性，并受到氏族的地域和血缘的限制。

当氏族社会瓦解、国家开始出现之时，原始宗教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进入了古代宗教时期。氏族宗教逐渐演变为以氏族联盟为基础的部落宗教，然后又经部落间的联盟而逐渐国家化，成为国家宗教。这个发展过程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低级的宗教逐步成熟，一些初具完整形态的宗教开始出现，如古希腊古罗马宗教、古印度教等等。古代宗教的特征是神的概念已经形成，而且众多的神构成了神的世界并与人的世界逐渐对立。原始宗教时期的神人认同已逐渐转变为人向神的乞求、祭献和膜拜，有形的宗教组织和专职的宗教人员如祭司等也开始出现。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出现，标志着宗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冲破了国家和地域的局限，赢得了更大范围的信众。三大世界宗教都是完全程式化体制化了的完型宗教，它们有明确的崇拜对象，有完整的组织制度与崇拜仪式，有权威性的经典教义以及阐释经典教义的神学体系。如果说宗教起源时是人类探索自身与世界奥秘的体现的话，那么发展后的宗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及价值取向的源泉。

今天，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世俗化对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各宗教在组织机构、礼仪制度乃至教义解释上的发展，都更注重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宗教特有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传统宗教随着社会的非神圣化而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世俗化，要求振兴并回复早期宗教的宗教复兴运动与革新此起彼伏。如基督教内各种新兴教派的出现，伊斯兰教席卷全球的复兴运动，印度教中“回到吠陀”的复古口号等，都是证明。同时，宗教与政治的纠缠不清也成为当代宗教的一大特征，如令人瞩目的前南斯拉夫局势，印度宗教纠纷，巴勒斯坦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都是显例，就连以标榜“出世”为特征的佛教，目前在亚洲许多国家中也积极入世参政。这些都说明，在当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中，宗教诸因素中的社会性因素也相应地加强了。

5. 宗教的作用与功能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没有用的东西迟早总会被扔掉。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持久不衰没有被作为整体的人类所抛弃，其原因正是它具有人们所需要的某些特性。按照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功能学派社会学家的看法，没有功能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当然，各种功能有正与负、显与潜的区别。我们可以从社会、文化、个人等方面来探究宗教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1) 社会方面。宗教具有一种凝聚力，具有使一个群体、一个集团、一个社会团结整合的力量，而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又可使社会趋于稳定。当然，宗教的这一功能是否就一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得视具体历史条件而定。当一个社会处于进步或上升时期，稳定无疑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宗教带给社会以稳定，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正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处于腐朽没落的状态因而需要彻底变革时，宗教带来的稳定就会起一种阻碍前进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宗教具有独特的感召力量，因而历史上以宗教作为旗帜的起义、战争、变革和革命等等也数不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又可以起到社会变革动力的作用。我们还应看到，当一个集团或一个民族因为共同信仰而团结一致时，它们与别的持不同信仰的集团或民族间也往往处于对立状态。对宗教所起的这种分裂作用，当然也须视历史条件而作出不同的评价。

(2) 文化方面。人类的文化与宗教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各民族早期的历史，许多都保留在它们的宗教神话中，记载在它们的宗教经典中。甚至不少民族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也常常受宗教方面的需要（如占卜）的促进。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无论涉猎艺术的哪一个门类——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我们都会发现，从它们的题材内容到思想内涵，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联。就连人们认为是与宗教完全对立的科学，也与宗教有着亲缘关系，如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化学起源于炼丹或炼金术。因此，难怪不少宗教学家认为，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精神源泉与重要载体之一。

(3) 个人方面。首先，宗教为信徒个人的人生提供了意义。例如，由于世界上数不清的“恶”（体现在地震、旱涝、瘟疫等天灾方面，也体现在压迫、不公、战争等人祸方面，还体现在个人的疾病、痛苦以及死亡等“极限情境”方面）的存在，个人会觉得人生荒唐而无意义，宗教的“神正论”为这一切提供了解释，从而消除了这种无意义感。第二，宗教为信徒提供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从而使从古到今的无数个人在面临道德选择时可以有所

遵循，免除了许多不必要的抉择危机。第三，宗教为信徒提供了心理上与情感上的补偿。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不少人对现实里的不平等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而宗教设想的未来世界都是人人平等，这就使人在心理上得到了补偿。另外，个人总有忧虑、孤独、悲伤、悔恨等等情感，宗教也常常在人处于这些境况时给人以安慰。尤其在现代社会，重竞争、快节奏的生活使人际关系趋于淡化冷漠，而宗教的组织和活动为人与人之间较密切的交往提供了条件。最后，如果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总是需要最终的精神寄托或信仰的），那么，真正的宗教既然关注终极的非此世的目标，也就让人走向了一种超越自我之局限性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人就可以轻视世间的名利得失，达到某种高度的宁静与满足。

如果还要挖掘，也许还可列举出宗教的更多的正反功能与显潜功能。正是因为宗教有这样一些功能，所以人类没有抛弃它。可以说，人类在这些方面的需要，就是宗教存在的原因所在。

6. 宗教的未来

宗教有发生发展也必然有未来。由于宗教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宗教的未来也必然与人类社会的未来紧密相连。现代社会的趋势是日益世俗化，那么它是否会成为一个无宗教的彻底世俗的社会呢？这个问题也就是宗教的前途如何的问题，换言之，宗教的前途是日益衰落直到消亡，还是不断发展蒸蒸日上，或者是改头换面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对此的看法也是形形色色。当代世界宗教学界对此的观点，可以归结为积极、消极与中立的三类，与此相关，对宗教未来的态度，也可以归结为乐观、悲观与中立的三种。

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拉为代表的积极乐观的一派认为，世俗化使宗教更加成为私人的事情，更能摆脱体制化组织的控制，因而人们将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而不受环境和家庭在这方面的影响。这种选择上的自主性体现了人类的进步，而具有自主性的宗教乃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因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前途是光明的。

以前面提到过的贝格尔为代表的消极悲观的一派认为，世俗化引起了宗教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国家，一极是家庭。在国家这一极，政教分离使国家永不再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没有政治参与色彩的宗教不过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修辞或点缀。在家庭这一极，虽然宗教仍然真实地存在，但它已不再像传统宗教那样能为社会提供统一的象征和统一的世界观。而人类的生活是需要宗教的这种作用的，因此这对社会和宗教两方面来说都是可悲的。

以德国宗教学者鲁克曼为代表的中立的一派认为，由于宗教是人的一种天赋能力，因此它不会因为社会的世俗化而消亡，而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些形式也许在许多人看来不像宗教，因为它缺乏现存宗教的制度体制和有形结构，但它仍然是宗教，只不过是某种隐形的或私人化的宗教。

根据 1990 年大英百科年鉴的统计，在 1980 年到 1990 年这十年中，世界各宗教的信徒增长率与世界人口增长率几乎同步，这一基本事实对我们理解最近的宗教未来当然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我们不是预言家，不可能对未来的宗教事实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有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宗教的形式不断变化而实质基本不变的漫长历史，以及哲学、科学、艺术等人类精神和文

化表现形式历经千变万化而依然存在的基本事实，是否对我们理解长远的宗教未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呢？

7. 救世主——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基督一词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语译文，意指上帝所派来的救世主，也是基督教对耶稣的专称。

基督教关于耶稣生平事迹，全部记载于新约的四部《福音书》中。据福音书载，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一座名叫拿撒勒的小城去，托梦给木匠约瑟的未婚妻马利亚说她将要蒙上帝之恩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将名耶稣，上帝将让耶稣为王。于是马利亚未婚但却从圣灵受孕怀上了耶稣。当马利亚与其丈夫约瑟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城注册户口的途中在伯利恒一家客店的马厩里生下了耶稣。后世将耶稣的诞生年定为公历的纪元，而诞生日现在称为“圣诞节”。

耶稣自小聪明好学，熟记犹太教的各种经典。他很早便认识到上帝给他的使命。成年后他在施洗约翰那里受了洗，受洗后曾在旷野里呆了 40 天，他经受了魔鬼撒旦的试探，拒绝了各种诱惑，然后开始在加利利的各个犹太教会堂宣传天国的福音。他一边行医，一边传教。据说他行了许多奇迹，如使瞎子复明，聋子复聪，瘫子复立，甚至死人复活，于是相信并依从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耶稣还召选了 12 个门徒和他一起传教。由于耶稣的言行触犯了犹太教中的上层人物，犹太教的当权者们对耶稣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迫害他。他们收买了耶稣的使徒之一犹大，在逾越节前夕，将耶稣拘捕，并交给罗马当局。耶稣被鞭打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把他的遗体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墓里。第三天耶稣复活并向众人显现，第 40 天升天，第 50 天派圣灵降临，其门徒领受了圣灵便开始传教。从此，基督教便在罗马帝国传开。

《福音书》中耶稣的故事对于基督教的历史、神学、礼仪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耶稣的故事说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降生、命名以及死后的复活都是上帝的安排。耶稣所宣传的福音中心，是爱天父上帝，爱人如己。这个中心也是基督教所有教义的核心。

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这是历代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拿撒勒城确实有个叫耶稣的人，他曾提倡改革，反对犹太教上层的腐化，并有一批追随者。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中的基督，也是后世哲学家关注的论题。然而，不论学者们作何评价，在基督徒眼中，耶稣乃上帝派遣到人间，并以其自身的受难来拯救世人的上帝之子。

8. 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书”——圣经

圣经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圣经包含《旧约》与《新约》两个部分。在此，“约”字意为盟约，指上帝与其臣民定下的约法。而约法的新旧之分，乃是基督教的想法。基督教认为旧约是上帝与其选民以色列人订下的第一约法，后因以色列人犯罪违法，上帝又差派其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人，来救赎人类，与人另立了新约。

《旧约》是犹太教的正式经典，由于《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它又被称为希伯来圣经。从内容上看，《旧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律法书，又称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5卷。它主要记载了古希伯来传说中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犹太教认为，律法书必须严格遵守，因为它是上帝制定的律法诫条，它表明了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第二部分为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先知书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重要人物以及众先知的言行事迹。第三部分为《圣录》，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记》及《历代志》（上下）。《圣录》是宗教诗歌、情歌、格言、智慧故事等的总汇。

基督教的经典除《旧约》外，还有《新约》。《旧约》是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新约》也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叙事著作，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其内容主要叙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史。第二部分为教义著作。这部分所采用的是书信形式，包括《保罗书信》、《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犹大书》。《保罗书信》有13卷，因传为保罗所作而得名。这部分著作是初期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它们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系统阐述。第三部分为启示书，只有一卷《启示录》。它用大量象征、启示语言，对天主教末日进行预言。整个《新约》围绕的中心是基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各卷成书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末叶。

《圣经》的原始抄本都已佚落，现存的最古本也是公元4世纪后的。4—5世纪时，《圣经》被译成拉丁文，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圣经》逐渐被译成各种文字。现今保存下来的最早汉译《圣经》，是明朝末年天主教来华传教士的译本。在中国，新教普遍用的是合和本圣经，天主教则用思高本圣经。

《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的书，到1986年，已被译成1829种文字和方言。除此之外，圣经可以以几个“最”在世界吉尼斯纪录中享有盛誉：出版发行量最大，读者层面最广，所译文字最多，阅读频率最高，价格最便宜—免费赠阅，价格最昂贵—一本英国詹姆斯王的钦定译本价格为书中之冠。

9. “太初有道”——创世纪的故事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是《新约·约翰福音》的开篇词。这句话说明宇宙存在之前就有了上帝。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旧约·创世记》详细记载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

据说，宇宙之初，无天无地，无光明无黑暗，也无物无人。上帝在六天时间中创造了天地万物，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为了使亚当生活不孤独，上帝又取亚当的一根肋骨，为他造了一个伴侣——夏娃。从此，亚当和夏娃在上帝造的伊甸园中无忧无虑地生活。伊甸园中有一颗智慧树，上帝警告他们不可摸也不可吃上边的果子，否则必死。住在伊甸园中的

蛇却告诉他们，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不仅不会死，反而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于是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因自己赤身露体而害羞，便用无花果树叶为自己编了裙子。为此，上帝惩罚亚当终身劳苦才得糊口；夏娃必遭怀胎生子的痛苦；而蛇将用肚子行走。

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生儿育女过着人的生活。他们的子孙越来越多，有的相互残杀，有的干了坏事。上帝对人的邪恶感到愤怒，后悔造了人，于是决定用洪水除灭他在地上的一切造物。亚当夏娃的后代挪亚是个义人，他得到了上帝的恩惠。在洪水泛滥之前，上帝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并带上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地上凡有血肉的生物也都带一公一母。挪亚按照上帝的吩咐办好了一切。在挪亚六百岁那年，洪水泛滥，大雨下了整整四十昼夜。除了方舟里的生物外，地上凡有生命的都被淹死了。当地上的水退后，挪亚领着妻儿和所有生物出了方舟。这是人类的又一个开端。此后，挪亚之子闪、含、雅弗的后裔分散到各地，而世上一切生物又开始繁殖生长。

《创世记》包含许多篇章，它是关于世界如何形成、人类如何起源的神话，也是以色列人为其历史创造的神话。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古人认识世界及自身的局限性远比现代人大得多，因而可以说，许多关于开天辟地、人类产生的美丽神话，就是古代人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一种探索。《创世记》中塑造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是万物的造主，是宇宙间一切的主宰。于是这个上帝就成为基督教所崇拜的神。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这一典故正是基督教关于人皆有罪的“原罪”教义的出处缘由。从“原罪”又引出上帝派其子耶稣道成肉身，受难拯救人类，而人要赎罪得救，只有信仰上帝和耶稣。

10. “12” ——《圣经》中奇妙的数字

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示吉祥、神奇的数字各不相同，翻开《圣经》，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事件与数字“12”有关。这是有意的安排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

据《旧约·创世记》第49章记载，雅各临终前叫他的儿子们到他的跟前，把他们日后会遇到的事都告诉了他们。雅各有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西布伦、以萨迪、但、迦保、亚设、拿弗他利、约瑟、便雅悯，他们接受了父亲的祝福。这也就是以色列后来的12支派，雅各的12个儿子成了这12个支派的12个族长。

旧约圣经的先知中有12卷篇幅较小的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该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它们构成了因篇幅较小而得名的“12先知书”。

基督教崇拜的救世主耶稣有12个门徒，他们是彼得、安得烈、雅各（西庇太之子）、约翰、腓力、巴多罗买、多马、马太、雅各（亚勒腓之子）、达太、多门和犹大。据载，耶稣当年就是与其12个门徒一起传播天国福音的。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原来是犹太教中最激进的奋锐党人，皈依基督教后成了耶稣的门徒，并掌管钱财。后来，犹大为了30银元，将耶稣出卖，他亲自领兵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马尼园，并以和耶稣接吻为暗号，让人抓获了耶稣。世人因此把犹大当作叛徒的同义词。

《旧约·出埃及记》第 28 章中记载了耶和华对犹太教祭司服上胸牌的要求。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上边要镶 12 块宝石。这些宝石分为 4 行，第一行为红宝石、红壁玺、红玉；第二行为绿宝石、蓝宝石、金钢石；第三行为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些宝石上要刻有以色列 12 个支派的名字。

在《新约·启示录》第 21 章中，记载了新耶路撒冷城的景象：高大的墙上有 12 扇门，东边三门，西边三门，北边三门，南边三门。门上有 12 位天使，门上还写着以色列 12 支派的名字。城墙有 12 条根基，根基上有 12 个使徒的名字。这 12 条根基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第一根是碧玉，第二根是蓝宝石，第三根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以下依次是红玛瑙，红宝石，黄壁玺，水苍玉，红壁玺，翡翠，紫玛瑙，紫晶。这 12 个门就像 12 颗珍珠，嵌在金光闪闪的新耶路撒冷城。第 22 章中还说，城内街道中有一条流着生命水的河，河边皆有生命树，树上结有 12 样水果。

看来，“12”这个数字的确是奇妙的，它引出的故事不仅有趣，而且还使人长点知识。

11. 从加利利到罗马——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

基督教是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第一大宗教。据《圣经》载，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耶稣，其诞生、活动、受难都在巴勒斯坦地区，故一般认为基督教是公元 1 世纪起源于巴勒斯坦的。

从历史上看，初期的基督教徒主要是犹太人。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相继受到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为反抗罗马当局的血腥暴政，犹太人举行过无数次起义。当公元 66 年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为争取民族解放的“犹太战争”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犹太人复国的希望破灭了。罗马帝国的铁蹄无所不在，人们只得把得救的希望从此世转向彼岸。

从宗教上看，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也有一个从多神观念向一神观念的演变。犹太教的雅赫维，原来也只是—一个地方神。从巴比伦之囚到罗马帝国初期，犹太人目睹了民族大统一的局面，雅赫维的概念随着这种统一观念上升为宇宙间唯一神的概念。这种—神论的观念，是基督教信奉耶稣基督—神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上看，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是斯多噶派与新柏拉图主义，对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基督教产生的具体过程至今仍然是个谜。《圣经》说，上帝为救赎人类派其子耶稣“道成肉身”，通过童贞女马利亚降世为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带传播“悔罪得救”的福音，扶危救困，行了很多奇迹。后被犹太教上层勾结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他所拣选的使徒们相信其为救世主，他们继续传播福音，并聚在一起举行仪式，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基督教会。1947 年《死海古卷》发现后，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根据《死海古卷》提供的信息，基督教的先驱也许是由农牧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犹太教“艾塞尼派”中的“库姆兰社团”。但是类似这样的社团在当时无穷无尽，早期基督教大致就是从无数的这类新宗派中产生的。我们能肯定的只是，信徒们多为下层民众，相信被钉死的耶稣就是救世主，他们集成若干团体，一起讲道，彼此帮助，伸张正义，期待基督再来临。

由于基督教强调救赎、慈爱，强调人人平等，信靠基督皆可释罪得救，在宗教礼仪上，它简单易行，而且破除了民族隔阂，在宗教观念上，它虽然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但却对它做出了新的解释。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它很快走出耶稣的故乡，越过民族界限，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国。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罗马当局对基督教进行过多次迫害。但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基督教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在此期间，基督教在组织上、仪式上逐渐程式化，其经典新约圣经逐渐完成，有钱、有知识、有地位的入教者日益增多，并逐步控制了教会的领导权。对于这样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罗马统治者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发表“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不再受歧视，与其他宗教享有同样的自由。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了成为世界宗教的历程。

12. 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天主教”与“东正教”的来历

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掌管帝国的东西两部分，皇徽上的鹰也画上了两个头。公元395年，帝国终于分裂。

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在政治、社会、语言、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基督教内逐渐形成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传播于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教会，以及以罗马为中心的，传播于拉丁语地区的西派教会。

东西教会的分歧由来已久，而分歧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会最高权力之争。

公元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就规定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地位仅次于罗马主教，君士坦丁堡因此也成为仅次于罗马的首席教区。451年的卡尔西顿公会议再次肯定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享有与罗马大主教同等的权力。罗马教会对此不服。其理由是罗马教会是由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所建，理所应当高于其他教会，罗马主教理所应当具有最高权力。君士坦丁堡教会对此强烈不满并竭力反对。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东西教会互相指责。9世纪中，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开除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的教籍，后者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因而关系破裂，史称佛提乌分裂。

第二是教义之争。东西教会在教义上的主要争执是两个字之争。东教会认为，圣灵“从父（即圣父）出来”，西教会在未经东教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改为圣灵“从父和子（圣子）出来”。这一教会史上的著名“和子”句纠纷引起了双方长期的争论不休，真是二字之差分裂永恒！

除此之外，是势力范围与经济利益之争。双方在领土、传教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也使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

公元11世纪初，东西教会又在宗教礼仪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斗。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自吹自抬，竭力贬低对方，相互揭丑数陋。

1054年7月16日，罗马教皇派红衣主教洪贝尔为首的使节团赴君士坦丁堡谈判。由于双方均不肯妥协让步，反而互相指控，致使矛盾白热化。最后洪贝尔闯入索菲亚大教堂，当众将罗马教会关于诅咒东教会、革除牧首教职的一份训谕放到圣坛上然后拂袖而去。东教会牧首被大大地激怒，立即召开会议以牙还牙，宣布革除罗马教皇及其使节的教籍。从此，东西教会彻底

分裂。分裂后的东教会以“正宗”自居，称为正教，即东正教或希腊正教，西教会则以“普世性”自诩，称为公教，中国人译为天主教。

13. 罗斯受洗——“第三罗马”的兴起

罗斯指的是9世纪中叶到12世纪初，在东欧平原即现在的俄罗斯建立的以基辅为首都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它是俄罗斯的前身。

罗斯国的居民早先信奉的是斯拉夫民间的多神教，崇拜自然力量和祖先，也敬奉灶神。在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战争和贸易中，罗斯的王族、亲兵和商人早已熟悉了基督教。当伊戈尔登位成为基辅大公，他的妻子奥丽加对基督教感兴趣，公元955年在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之后，罗斯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大增。当弗拉基米尔大公继位后，拜占庭帝国与基辅罗斯公国结为盟国。987年，拜占庭发生变乱，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兵相助。事后，拜占庭皇帝将公主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安娜公主到基辅结婚时，带去一批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安娜公主的影响下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同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由于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强迫所有的基辅居民都跳下第聂伯河，接受神甫的洗礼。原来罗斯人所信奉的神像，皆被抛入河中。此事件被史学家称为“罗斯受洗”。

基辅罗斯公国接受基督教后，立即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在基辅设立了大主教区，并派传教士北上向罗斯的其他居民传教。大公本人带头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到11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了整个罗斯。

基辅罗斯公国于11世纪中叶开始解体，到13世纪初分裂为若干公国。后来的两个半世纪是蒙古人对俄罗斯各公国的统治，直到16世纪初，俄罗斯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基督教于1054年底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后，俄罗斯一直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的管辖。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俄罗斯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断绝了关系，宣布独立。1589年在国内建立了牧首制（东正教会实行的以牧首为领导的教会管理制度，天主教则以教皇为首）。

随着统一的俄罗斯的不断强大，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成为整个东正教的霸主，并自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君士坦丁堡自称为“第二罗马”）和“基督教帝国的领导”。

17世纪，俄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在沙皇的命令下，俄国东正教会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改革。这次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选中的尼康，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修正了俄国东正教的经文，统一了祈祷词和东正教的仪式，如划十字不许用两个手指而必须用三个手指，环绕教堂的礼仪行列不是自东向西，而是自西向东，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等等。由于尼康的改革，俄罗斯正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4. 从改革到多元——新教的产生与发展

16世纪前，西方基督教世界一直为天主教所把持。为了消灭天主教认为的异端，令人生畏的异端裁判所将魔爪伸向了西方各国。然而尽管如此，天主教仍不可能维持其一统的局面。

14—15 世纪，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各国民族主权逐步加强。天主教内部则矛盾重重，教廷腐败，神职人员堕落。此时，开创欧洲文化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广泛传播了反封建的思想，一场既反罗马天主教教廷，又反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的宗教改革运动条件渐趋成熟。

14 世纪，宗教改革的先驱英国的威克里夫提出了建立民族教会，简化教会仪式，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的主张，同时他反对教廷征捐，反对教皇至上，否认教士有赦罪权。15 世纪初，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否认教皇的最高权力，要求改革教会。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主张影响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1517 年，德国神学家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最后发展成为德国农民战争。1541 年，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共和政权。其学说在西欧北欧飞速传播，他的宗教改革成为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法国的加尔文信徒“胡格诺派”经过长期斗争，获得了合法地位。在英国，经过从亨利八世至伊丽莎白一世的长期斗争，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终于成功，英国国教的地位得到确立。北欧各国也相随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三大新教派别，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宗教多元化的时代。

新教尽管在产生之时就有不同的派别，但它们却具有三个与天主教针锋相对的共同原则。

首先，新教强调因信称义。天主教认为除了信仰外还必须凭借圣事，通过神职人员为中介才能赎罪得救。新教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信。

第二，新教认为信徒皆可为祭司。既然得救只须凭着信心，就无须神职人员作为中介，每个信徒都有传播福音的职责。

第三，新教认为《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天主教尽管不否认这一点，但却坚持教会具有对圣经的解释权。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是新教各派趋于完善定型的时期。17 世纪初，英国的清教运动又将新教发展推动，一些脱离英国国教会的独立宗派如公理会、浸礼会、公谊会等出现，19 世纪卫斯理宗出现。这些宗派随着欧洲移民传播到北美，现已成为北美最具影响的教派。新教各派于鸦片战争前后进入中国。

在神学思想上，新教也出现了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形成了一些神学思潮和流派，如现代主义、基要主义、社会福音派、个人得救派等等。

如今，全世界信仰新教的人约为 3.6 亿，主要集中于欧洲和北美。

15. 从“最后的晚餐”谈起——基督教圣事

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有一幅名画“最后的晚餐”，画中表现了耶稣在被捕受难之前与门徒共进晚餐时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后众门徒的反映。这幅画取自《新约·马太福音》第 26 章设立晚餐一节。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的这最后一次晚餐中，曾拿起麦饼和酒向其门徒祝福，然后分给他们说：“这饼是我的身体，这酒是我的血，我的身体和我的血是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来的。你们应这样做，为纪念我。”于是领取圣餐便成为基督教圣事之一。

圣事又称圣礼，是基督教的主要礼仪。基督教认为圣事是耶稣亲自定立的，是具有一定形式的宗教礼仪。举行圣事就是借助这类一定可见的形式赋予领受者不可见的神恩和神佑，凡心诚者都能获得。同时举行圣事也成为基督教教会巩固发展自身不可缺少的手段。基督教的圣事因教派不同而有所区别。天主教和东正教承认的圣事有七桩：洗礼、坚振、告解、圣体（或圣餐）、终傅、神品、婚配。新教大多数教派只承认洗礼和圣餐，英国圣公会除承认洗礼和圣餐外，还承认婚配。但也有一些教派如公会等不承认有任何圣事。

洗礼又称圣洗或领洗，它是基督教入教仪式。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两种洗礼方式。第一种是浸礼，即将领洗者全身或半身浸在水中，同时念诵经文。第二种是注水礼，即把少量的水洒在领洗者的头上。由于浸礼对某些信徒如重病人、犯人等有许多不便，15世纪后，教会一般都采用注水礼。基督教认为只有领受过洗礼的人才能成为正式的信徒。

坚振又称坚信礼。入教者在受洗一定时间之后，由主教用右手的拇指蘸上坚振油在受洗者额头上划一个十字。据说这种按手礼可使信徒领受圣灵，坚定信仰振奋心灵。坚振这一圣事在教会初期就已普遍存在。

告解亦称办神工，是教徒赦罪的圣事。由教徒向神甫表明自己对上帝犯下的罪过以示忏悔。神甫则指示今后如何补赎。天主教东正教认为告解礼能使犯了各种罪过的人重新获得上帝的恩宠。

圣餐也称圣体，即信教者领取祝圣过的麦饼和葡萄酒。基督教认为麦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就是耶稣的身体和血。天主教在圣餐圣事中使用的是无酵饼，而东正教用的是发酵饼。新教认为两者皆可。

终傅圣事即为临终前的教徒敷擦经神甫祝圣过的橄榄油，一般是抹在临终者的五官和手足上，同时念诵经文。天主教和东正教认为这样可以使临终者的罪过得到赦免，使其安心地去见上帝。

神品圣事又称圣职。这是为担任神职人员举行的授神职礼。接受了圣职礼的人被认为圣化了，成为有资格主持圣事的圣者。

婚配即男女信徒结婚时在教堂举行的典礼。男女双方需要履行一套礼仪，如回答神甫关于双方是否自愿结成夫妻的问题，并接受神甫的祝福。

基督教圣事礼仪在其活动中有极重要的地位。16世纪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大多数新教派别，将圣事的简化视为一项重大改革，简化后的礼仪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16. 血与火的洗礼——异端与宗教法庭

只要了解一点世界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350年前惨遭迫害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当年审判伽利略并将其处于火刑的，就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而伽利略的罪名正是异端分子。

在古代和中世纪，基督教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将与之在神学理论上相左的派别贬称为异端。在基督教早期阶段，各不同教派间常发生教义上的争论。彼此指责对方为异端。4世纪20年代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教会开始通过编定新的正典，公布信经等形式，使正统信仰固定下来，并通过公会议来确定正统，斥责异端。

基督教历史上的异端派别大致可按历史时期分为古代异端和中世纪异端两大类。

古代异端主要有基督教诺斯替教派、马西昂派、孟他努派、阿里乌派、聂斯托利派、一性论派、贝拉基主义、多纳图派等。古代异端的含义主要指在神学教义上的错误。

中世纪异端主要有保罗派、阿尔比派、韦尔多派、鞭笞派、鲍格米勒派、一位论派等等。在中世纪，异端的含义已不仅限于教义上的错误，还包括基督徒生活与行为方面的“错误”。

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会仍保留了过去关于异端的理论，继续谴责其认为是异端的学说和观点，新教各派认为自己的信仰最正宗，也把其他派别视为异端。直到近代，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和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原则深入人心，以及基督教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对异端的理解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代基督徒已不再把坚持其他信仰与观点的基督徒视为异端。

早期基督教教会对所谓异端，一般只限于精神上的惩罚，最多是革除教籍。中世纪前期，对异端处以死刑的规定曾得到法律认可。13世纪，一个直接接受教皇领导、为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而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正式成立，这个令人生畏的恐怖机构除了一般的禁食、鞭笞、监禁、没收财产外，还操纵着被告者的生死大权。

当时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先后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其中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尤以残酷著称。这个裁判所有严密的组织机构，设有14个地方法庭，并与世俗当局有密切的联系。被它处以火刑的人据说有2000余人（一说有10余万人）。

宗教裁判所也是天主教对付宗教改革家、进步科学家、思想家的有力工具。宗教改革的先驱英国的神学博士威克里夫死后三十年还遭焚尸，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以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科学家伽利略都因其科学发现与教会传统教义相冲突而被定为异端惨遭活活烧死。宗教法庭用血与火来清洗其异己者的酷刑，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令后人难忘的黑色阴影。

17世纪后，随着教皇权势的下降，宗教裁判所日趋衰落。19世纪末，形式上完整的宗教裁判所已不存在。20世纪初，它改为天主教教廷的圣职部，1965年又改为信理部，其职责是公布禁书目录，行使“绝罚”（即开除教籍）。

17. 三进中原——基督教入华

在西安碑林，在一块引人注目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记载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基督教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安家落户却经过了曲折的三个回合。

最初传入中国的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在5世纪初与罗马帝国的正统基督教分裂后，自东进入叙利亚波斯一带，大约在7世纪时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的唐朝称之为景教。所谓“大秦”则是我们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唐太宗很重视景教，不仅亲派大臣到郊外去迎接景教传教士阿罗本，而且还下诏建大秦寺一座。唐高宗继承了唐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下令在各地建立景教寺院。此后景教兴旺繁荣。武则天称帝时扬佛教压景教，玄宗时期，景教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后来的肃宗、代宗都支持和保护景教。即使在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德宗时期，景教的地位也依然如故。公元845

年时，景教的命运急转直下。唐武宗下令废除佛教，景教遭波及，教士被逐出，寺院被废弃，景教一度绝于中原。待基督教再次入华时，已是13世纪下半叶了。

当时元朝统一了中国。随着统一，原来流行于中亚、蒙古一带的景教又在内地恢复活动，此时罗马教皇也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来华的基督教各派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在蒙古语中，“也里可温”意为“有福缘的人”。景教与天主教因派别不同而矛盾颇深，初来华的天主教曾一度受到景教的打击排挤，但由于元朝皇帝的宽容政策，天主教仍然日见发展，在北京、泉州、杭州、宁夏等地都建立了教堂，仅北京受洗入教者就有6000多人。元朝政府还设立崇福司专门管理基督教事务。然而，随着元朝的覆灭，基督教再次在华夭折，也里可温教的名称不复存在。

16世纪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由于西方殖民事业的发展，基督教的传教热潮日益高涨。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天主教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传教士相继来华。明末时，宫廷贵族受洗入教者已有500多人，全国的天主教徒有3万多人。到清朝康熙年间，教徒人数增加到30万人。17—18世纪由于发生了关于来华传教士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争论，清朝廷下令禁教，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曾一度受挫。

17世纪中，东正教传入中国。第一个东正教传教团体来自俄国。经过一百年间的传播，到18世纪中叶教徒达200多人。

19世纪初，新教开始传入中国。但由于清政府的禁教命令，新教在华的传播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所收信徒不满百人。

鸦片战争后，清朝廷被迫取消禁教命令，于是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兴旺发达。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90余年间，天主教来华的修会达100余个，女修会80多个，有教徒280万人。东正教有教徒25000余人，仅东北地区就有教堂67座。新教传入中国的教派有100多个，教徒9万余人，教堂1千多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教各派势力又有发展：天主教徒有320万，新教徒有70多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基督教徒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8. 从罗马到梵蒂冈——今非昔比的教皇国

在意大利罗马城西北边，有一座面积为0.44平方公里的城堡。城堡四周有高墙与罗马城隔开，只有城东的圣彼得广场与外界相连并向外敞开。这座城堡就是赫赫有名的梵蒂冈城国。

如今的梵蒂冈城国，是一座以教皇为君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城中拥有公民权的居民一般有数百人，其中大多数为神职人员。在城国中，教皇拥有立法、司法、行政全权。城内的一切公共事务，如公共秩序、安全、财产保护等等，均由教皇所委任的世俗官员管理。城国设有市政议会，议员由教皇指派。城国有自己的货币、邮政和电讯机构。除了这些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罗马教会档案馆，以及五所博物馆和两所美术馆。那里藏有的大量珍贵文献、文物和艺术品，不仅是无价之宝，而且是基督教近两千年历史的缩影。

你可曾想到这小小的梵蒂冈城国曾经是在西方世界显赫了千余年的教皇

国的中心吗？

教皇国之称要追溯到公元 756 年。那时法兰克国王丕平为酬谢教皇支持他篡位成功。亲自率军入侵意大利，迫使伦巴德人放弃所征服的拉文纳等地后，将意大利中部的大量领土赠给了教皇。这笔交易在当时也许平淡无奇，但自“丕平献土”始，一个以教皇为君主以罗马为首都的国家便诞生了，这是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

丕平的儿子之一查理曼大帝又将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赠予教皇，9 世纪时，德国皇帝鄂图一世又赠若干城市。教皇国的版图逐渐扩大。11 世纪教皇国势力逐步增强，13 世纪为其鼎盛时期。那时的教皇国不仅是西方世界精神上的统治者，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各国国王都向它称臣纳贡。14 世纪初教廷受法国影响迁移至靠近法国的教皇国领地阿维尼翁，14 世纪后期，又因为世俗君主的争夺，造成两个教皇并立甚至三个教皇鼎立的分裂局面。自此，教皇国的权势大大下降。教皇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地方自治政权，罗马市也屡次夺权建立共和国，许多城镇实际上已为封建领主控制。然而 15 世纪中叶，教皇国又重新恢复了它在意大利中部的势力。16 世纪后的教皇国版图屡有变化，但却是每况愈下。

1527 年，奥地利占领罗马，教皇国被承认为独立国家。1798 年，拿破仑进攻罗马，取消了教皇的世俗权力，成立了罗马共和国。尽管教皇庇护七世于 1800 年又重建教皇国，但 9 年后它就短命了。1815 年教皇国恢复，并受奥地利保护。1859 年奥地利败于意大利后，教皇国大部分领土并入意大利，只是由于法国的保护，罗马城及周围地区才免遭吞并。

1870 年普法战争中，意大利军攻入罗马，统一了意大利。教皇退居梵蒂冈，教皇国不复存在。第二年意大利国会通过“教皇保障法”，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内的自主全权。但教皇庇护九世拒绝接受此法，自称“梵蒂冈之囚”，发誓不再出梵蒂冈城一步。直到 1929 年墨索里尼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拉特兰条约，梵蒂冈国的法律地位才正式得到确认。如今，这小小的国家作为教皇国的继承者，在世界上仍然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19.20 世纪的新趋势——普世教会运动

在基督教历史上，教会的发展一直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是寻求扩张，一是寻求联合。如果说 19 世纪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的发展是扩张占优势的话，那么 20 世纪争取合一则是其主要特征。普世教会运动正是现代基督教内提倡各宗派重新合一的运动。

普世教会运动是由欧美新教中一些较大宗派的传教机构于 19—20 世纪间发起的。该运动的开端一般公认为是 1910 年在爱丁堡举行的普世宣教会议。事实上在此会议之前类似的会议已举行过 7 次，但前几次的与会者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的。爱丁堡会议后，普世教会运动成了 20 世纪除天主教外新教东正教大多数宗派的主要工作。普世教会运动主要在五个方面开展。

第一是传教活动方面。传教活动从一开始便具有各宗派竞争的特点，因而也首先要求合作。1921 年，在美国人穆德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协会，其目的是协调各教派间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跨教派的传教组织如德国福音宣教会、北美国外宣教会、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宣教会等加入了国际基督教协会。该组织后并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为协进会的“世界传教组”。

第二是青年工作和基督教教育方面。由于普世教会运动的开展，基督教青年世界协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世界基督教教育协进会纷纷成立。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跨教派先驱组织，为推动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方面是“生活与工作”和“信仰与体制”运动。前者的倡导人主张回避各宗派在教义与体制方面的分歧，而在教会与社会和国家关系方面寻求各教会的合作。但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合一，就不能避开各宗派在信仰与体制方面的分歧。经过多方面多年的协商努力，终于于1948年成立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又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是普世教会运动的核心机构。60年代以来，除原北美西欧新教大多数教会、一些东正教和东方教会等成员外，俄罗斯东正教、第三世界各国新教教会也加入了该联合会。该会的口号从“教会合一”发展到“世界合一”、“人类合一”，并积极开展同其他宗教甚至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第四方面是教会组织上的合一。如在苏格兰，联合独立会与济世会合并为联合长老会，联合长老会又与自由长老会合并成为苏格兰联合自由长老会。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路德宗都并入了三大机构：美国信义会、信义会密苏里大会、美利坚信义会；而在1957年成立的联合基督教会使4个不同的会派合而为一。在加拿大，长老派、路德宗、安立甘宗、浸礼宗、天主教等七大宗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加拿大教会协会。这种联合的例子在世界各地很多。

第五方面是一些宗派建立的世界团体，如世界归正宗长老制教会、世界卫理公会协进会、世界浸礼会联盟、世界信义会联合会、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等等。

当普世教会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之时，天主教却自开始就采取抵制态度。直到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以后，其态度才有所改变，但目前天主教仍不是世基联会的成员。而新教一些教派如一位论派、美国南方浸礼会等也因信仰上的分歧而对该运动持保留态度。

20. “革新”与“对话”——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

所谓公会议，是指基督教世界性的主教会议，始于4世纪20年代。在基督教东西两派未分裂之前，由罗马帝国皇帝召开过7次公会议。这7次公会议得到天主教与东正教的承认。第8次公会议是东西教会正式分裂的导因。第9次公会议至21次公会议实际上是天主教一派的公会议。新教各主要宗派只承认前4次公会议。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是第21次公会议。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寻求和平希望合作的趋向日益增长。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这三大派别组织间的高大壁垒和相互的敌对态度日益受到来自教内教外各方的批评，这种分裂被认为是妨碍基督教徒为人类福利共同合作的障碍。要求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改革势在必行。1958年上任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既是一个教廷外交家，又是一个具有与社会各界打交道之丰富经验的活动家。他曾发表过两道著名通谕《慈母与导师》和《世界和平》，号召天主教徒为共同的福利和持其他信仰的人携手合作，为建立有真理、正义、自由、慈善的世界和平而创造条件。1962年10月，约翰二十三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召开了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两千多名主教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与基督教各派的“合一”为

主题，强调教会必须赶上时代的形势。但直到 12 月 8 日休会前，会议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1963 年约翰二十三世大业未竟就逝世了。新教皇保罗六世决心继续开完这次大会，并决心将会议决议付诸实施。于是 1963 年秋会议又继续进行。这次会议于 1965 年结束。会议通过了新的“教会宪章”和“礼仪”宪章等 16 个文件，改组了教廷机构，增设了“基督教合一秘书处”、“非基督教徒宗教联络秘书处”等新机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普世教会运动的教令》，大大推动了天主教会与其他教会建立坦率的新关系，以及在世俗事务中发挥新的直接作用的进程。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不仅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议的影响很快在世界各地反映出来。首先是礼仪的改革迅速展开，如在仪式中广泛使用本国语言（过去天主教弥撒中一般都用拉丁文）。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徒之间为促进普世教会运动而进行的接触也迅速升级。各教派之间的双边对话也很快展开。

当然，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与“对话”，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较为保守的信徒被这种变化弄得不知所措，同时他们也为旧的习俗感到痛惜。而另一些激进的改革派却认为这次改革的步子太缓慢，太保守。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向对话合作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1. 第一个神学家——保罗

保罗原名扫罗，他既是《圣经·新约》中的人物，又是基督教早期教会的创始人之一。

据《使徒行传》载，保罗出生于小亚细亚大数城，属于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后代，早年时期曾在耶路撒冷读经习典，成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和法利赛人。保罗和当时许多犹太人一样，对刚产生的基督教抱有敌意，他曾参加过迫害基督教徒的行动。在一次去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的途中，保罗忽然看见天空中有奇光，并听到耶稣在光中向他说话，嘱咐他停止所干的迫害行动。随后保罗双眼失明，三天不吃不喝静思冥想。第四天保罗重见光明后，转而信奉基督教，受了洗。从此保罗不顾犹太人的反对，在大马士革宣扬耶稣基督。

一开始，保罗的传教十分艰难。一方面他得躲避犹太人的杀害，另一方面他必须让受他迫害过的基督教徒重新认识他信任他。他曾三次远途传教，不畏艰辛劳苦，足迹遍及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及地中海东部各岛，成了基督教第一个去外邦宣传基督福音的使徒。在犹太教徒眼中，保罗是一个叛教者，他们从未放弃对他的迫害。保罗曾被犹太当局捕捉关押，但在狱中他仍未停止工作，不断给教会和个人写信。出狱后，他又到各地传教，最后被残酷迫害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尼禄处死。

保罗在外传教期间，给各地教会写了许多书信，具体地解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通报了各地初期教会发展的情况。保罗的所有书信不仅是《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督教教义、教规、神学的重要依据，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保罗在演讲和书信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大致可分三个方面。第一是基督

论。为了让更多的外邦人信奉基督，保罗对耶稣的事迹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在他的讲道书信中，基督形象占有至高的地位。正是因为保罗，“基督”不只是一种称号，而成为真正的名字，信徒与基督融为一体。第二是因信称义。所谓因信称义，是指信仰是人能得到救赎和能与上帝交往的必要条件。保罗宣传要靠上帝的恩惠，信奉基督，才能洗涤自身的罪恶，而赦罪得救。他的这个核心思想与犹太教传统的恪守律法而称义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第三是期望、等待、行善。保罗深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热切地期望和等待着在那一天里与主耶稣相会并永远与主同在。因此，他号召基督教徒在末日到来之前，应多行善事，要顺从上帝。另外，保罗是犹太人，从小深受犹太文化的影响，因此，保罗的思想中还具有许多犹太文化的特征。他坚信《旧约》是上帝启示的，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是上帝所晓谕的律法。尽管保罗后来认为基督徒不必拘守这些律法，但他确信，犹太人的历史延续在基督的一生中。

保罗的思想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是基督教当之无愧的第一位神学家。

22. 《上帝之城》与《忏悔录》——圣奥古斯丁

广袤的非洲曾给基督教教会带来三个伟大的领袖，奥古斯丁就是其中之一。

奥古斯丁 354 年初冬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即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君斯坦丁区的苏克赫腊斯。他的父亲十分懒散，俗气十足，地位颇高而财产不多，直到死前才皈依基督教。而他的母亲却是品性高尚的基督徒。因此，年青的奥古斯丁身上具有追求感官享受（他 17 岁便有了情妇）与追求崇高思想的两种特性。

奥古斯丁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对摩尼教在理智和道德上是否恰当产生了怀疑。为此他曾去会见当时最受尊敬的摩尼教领袖福斯图斯，但这位领袖却无法满足他的需要。正是在他失望之际，他迷上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维克多利努的著作，尤其是维克多利努老年皈依基督教一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天，在进行了一番自责之后，他冲进花园，听到邻屋一个孩子说“拿着，读吧”，于是他便拿起圣经，看到这句话：“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你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武器装备自己；不要放纵罪性来满足你们的情欲。”奥古斯丁突然感到了上帝使他战胜罪恶的力量，于是 386 年夏末，他皈依了基督教。

奥古斯丁一受洗，立即就撰文批驳摩尼教。后来他进入神职界并当上了主教。公元 400 年，奥古斯丁著名的《忏悔录》问世。他在书中详细描写了他皈依基督教的经过，这种直言不讳的灵性自传书不仅在当时是第一本，在后世也是极少的，可以说它是描写宗教经验的经典作品。

公元 410 年，西哥特人攻下罗马，将罗马城洗劫一空。一些异教徒认为罗马城的陷落在于罗马人放弃了对罗马多神教的信仰皈依基督教所至。为了反驳这种指责，奥古斯丁写下了他的神学代表作《上帝之城》。全书用了 13 年时间（413—426），分上下两部。奥古斯丁在书中除了论述罗马的覆灭与基督教无关外，更多的笔墨则落在“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上。他认为“上帝之城”即天国，它是永恒而且完美的，“世人之城”却是短暂而且有

缺陷的；世人之城如巴比伦、罗马等最终要灭亡，被上帝之城所取代，而上帝之城在人间的代表即教会。因此世人若放弃世俗的追求信奉上帝，就会蒙恩得救，进入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术语概念及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预定、恩典、拯救等等主题。该书成为基督教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书中体现的神学思想，从 5 世纪到 12 世纪，一直是基督教教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思想。

公元 391 年，奥古斯丁到了希波城，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所隐修院。430 年，在汪达尔人围困希波城期间逝世。

23. “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在基督教历史上他则是中世纪神学的伟大代表。

1225 年，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洛卡舍卡城堡。他的父亲杜尔夫是一位伯爵，母亲则是贵族后裔，与王室有亲戚关系。阿奎那 5 岁时就被送到本笃会修道院受教育，9 年之后又被派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习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等七艺。1244 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天主教托钵修会多明我会，为此被家人幽禁于家一年多。1248 年他就学于科隆的多明我研究院，师从当时已大名鼎鼎的罗马天主教会大主教阿伯拉尔。他在科隆阅读并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时的阿奎那身材魁梧，性格沉静，行动迟缓，被同学戏称为“哑牛”。可是他显露出来的锋芒已为其师洞察，阿伯拉尔曾说：“这头哑牛的吼声将响彻全世界。”1252 年阿奎那领受了神职并在巴黎大学讲授圣经，1256 年后讲授神学和哲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此后，阿奎那的一生都在从事神学的教学、研究和著述。

13 世纪前，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界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是 4—5 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思想。奥古斯丁将新柏拉图主义与神学结合，建立了统治基督教思想界近 700 年的神学体系。13 世纪后，西方人开始认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博大精深，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智慧，他的学说许多与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直接冲突。于是后者的地位动摇了。能否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结合呢？阿奎那极其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使他的吼声响彻了全世界，用他的新体系给 13 世纪后沉闷僵死的基督教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和生命活力。

作为一个神学家，阿奎那十分推崇以柏拉图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奥古斯丁神学。但是作为一个顺应潮流的开明人士，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来论证基督教的神学和教义。首先，他提出了哲学与神学的区别，前者是认识理性真理之路，后者是认识启示真理之路，二者并不矛盾，但因为上帝的启示高于任何知识，所以，神学高于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其次，他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范畴“有”和“本质”，来说明上帝的“自有”和“永有”特性。他提出了西方哲学神学史上著名的论证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参考“上帝存在可以证明吗？”一节）。此外，他还强调人的道德倾向，强调法律观念，认为自然律出于上帝永恒的法，主张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等等。

阿奎那一生著有许多著作，其中最伟大的不朽之作是他的《神学大全》

及《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没有写完。当秘书催促晚年的阿奎那继续写《神学大全》时，他却回答：“不，我不能！因为我写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不值一提。”尽管如此，这部书不仅对当时的基督教，而且对后世的基督教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与价值。

阿奎那的学说在他生前曾遭教会攻击。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他是圣徒，其著作作为基督教神学的规范。他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也被后世称为“托马斯主义”，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将它定为天主教官方神学和哲学。这位享有“天使博士”之美喻的中世纪学者终于获得了他应得到的地位。

24. 叱咤风云的教皇——英诺森三世

教皇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pappas，意为父亲、爸爸。在早期教会里，是对主教的尊称，后逐渐专用于罗马教皇，中文译为教皇。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有过若干教皇，然而，若论教廷世俗权力最大，教皇权势最高的时代，当推英诺森三世统治下的时代。

英诺森三世原名洛旦里，出生于意大利。年青时曾在巴黎攻读神学，后又在波洛尼亚攻读教会法。据说他与当时的教皇克雷芒三世有点亲戚关系，后者曾将他从副助祭提升为枢机助祭。1198年，教皇西莱斯丁三世逝世，洛旦里当选为教皇，并在此宝座上统治了18年。

这18年不仅是英诺森三世个人事业获得成功的18年，也是中世纪教廷处于空前绝后之鼎盛的18年。在这18年中，英诺森三世充分施展了他的聪明才智，运用他高超的外交手腕，使教皇的实际权威达到顶点，使整个西欧世界拜倒在他的脚下。

在德国，亨利六世死后，他利用霍亨斯陶芬和威尔夫家族争夺皇位之机，挑起了德国内战，借此排斥了德国在意大利的势力，收复了曾被德国和意大利封建主占领的教皇辖地。在法国，他发布夺教权的命令，迫使法王菲利浦二世同被他无理废黜的王后英格堡复婚。在英国，他趁英格兰诸侯反对约翰王之机，迫使约翰向他称臣纳贡。此外，瑞典、丹麦、葡萄牙等国国君也臣服于教廷。

在教会内部事务方面，英诺森三世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主教选举有争论唯教皇有决定权，主教要调换教区，唯教皇有批准权。他在位期间，曾命令宗教法学者编纂其全部教令，对教会各方面的活动都做了重要规定。

他曾于1202—1204年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支持德国封建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又发动另一支十字军去讨伐法国南部被视为异端的阿尔比派，这次讨伐历时20年。他还批准成立了天主教的两个托钵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

1215年，天主教举行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会上许多重要的决议得以通过，如确认变体论（即认为圣餐时的饼与酒经祝圣就变成了基督的肉与血）；规定天主教徒每年至少向神父忏悔一次，复活节必须领取圣体；禁止神职人员参与决斗等等。这次会议各国首脑云集，英诺森三世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1216年，正当他积极准备再次发动一场收复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时得病死去。

就个人的性格而言，英诺森三世谦卑虔诚，但他企图扩张教皇权势的野心之大，为其他教皇所望尘莫及。他以后的诸教皇虽步其后尘，在教廷内外

事务上做出了许多同样的努力，但却未获得过像他那样的成功。

25. 点燃宗教改革之火的人——马丁·路德

提起马丁·路德，我们就想到16世纪震撼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这位德国学者，正是点燃那场燎原之火的人。

路德于1483年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艾斯雷本城。其父从矿工步入市民阶级，后当选为市议员，成为那个时代由贫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典型。路德先后在马格德堡共生兄弟会和爱森纳赫的圣乔治神甫学校学习，1501年后又开始了他在爱尔福特大学的生活。那时他是一个有头脑有主见的学生，刻苦钻研、能思善辩。但他从来不为周围的宗教风波所动。1505年，一件异乎寻常的事闯入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是路德从外度假回来，在返校的途中遇上了一场暴风雨，当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巨大的气浪将路德打翻在地，并甩出好几米远。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路德大声呼救：“救救我啊，圣女安娜，我要出家修行当修道士！”事后路德信守了他的诺言，进了爱尔福特奥格斯丁修道院。1512年获得神学博士后，在维登堡大学讲授神学。然而路德的内心是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他得不断地与自己斗争，以克服信仰上的犹豫和动摇。直到1513年冬春之际，在许多个日夜的苦苦思索之后，路德在维登堡修道院他的钟楼上突然领悟了圣经的真谛：义人必用信得生。路德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可以说，没有“钟楼得道”，也就不会有点燃宗教改革之火的路德了。

路德信仰上的飞跃，使他在1517年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九十五条论纲，路德在论纲中抨击了罗马教廷滥售赎罪券，并按当时的学术惯例邀请大家来讨论赎罪券的问题。路德将论纲贴在与维登堡宫廷相邻的教堂大门上。他自己也未想到，九十五条论纲如火花落入火药桶，一场迅猛异常的宗教改革大火一下就席卷了德国。

路德曾说，上帝就像牵着一头瞎马似的将他带进了历史的事变之中。如果开始是如此的话，那么后来的路德却是自觉地参与改革运动的。在民族运动的支持和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路德与教廷公开决裂，并当众焚毁教皇敕令。他一边躲避教皇的逮捕，一边翻译圣经，著书立说，周游讲学，被历史推上了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列。然而，由于运动的深入，农民平民的觉醒，运动本身的发展已大大超出了这位点火人的思想。路德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开始反对和攻击农民战争，最后公开主张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1525年是路德一生关键性的转折点，他与一个叛逃的修女卡塔琳娜·封波拉结婚，以此表示与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最终决裂。此后的路德一直从事圣经的德语翻译，实行温和的改革，从事路德宗的建设工作。1546年路德在故乡逝世，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尽管后人对路德的功过有褒有贬毁誉不一，但是我们仍可以说，路德是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伟人。今天，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路德宗已成为新教三大主流教会之一，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的神学主张，早已是新教各派的核心教义；可用来读写交谈的现代德语，也永远记载着路德对之做出的巨大贡献。

26. 影响深远的改革家——加尔文

如果说点燃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火的是德国学者马丁·路德，那么，使改革之火燃遍整个西欧的则是法国神学家让·加尔文。

1507 年 7 月，加尔文出生在离巴黎约 58 英里的努瓦永城。他的父亲曾任努瓦永主教秘书和座堂教士会法律顾问，因而立意要儿子学神学，后因与努瓦永座堂教士会发生争吵，于是又决定让加尔文学法律。加尔文曾于 1523 年进入巴黎大学，其出色的拉丁文就在那时打下了基础。后他又进奥尔良大学、布尔日大学学习法律。那时的加尔文对人文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却未被当时发生的宗教运动所触动。

1532 年间，加尔文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变”，尽管转变的缘由无法确知，但此后的他却十分关注宗教运动的发展，他认为上帝通过《圣经》对他启示，他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1533 年他因密友要求改革教会的演讲所牵连，被弗兰西斯国王通缉捉拿。在逃难期间，加尔文对宗教的改革认识加深，他放弃了旧有的信仰，改信新教。1534 年秋，他来到当时新教的中心瑞士巴塞尔，潜心研究《圣经》和神学。他在此期间所著的《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对维护新教作了有力的陈述。于是，年仅 26 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新教的权威发言人和法国新教领袖。1538 年，因急于推行宗教改革的进程，加尔文与日内瓦市政当局冲突，被迫出走。3 年后他重返日内瓦，在市政新当局的支持下，开始推行他的宗教改革。

他在日内瓦建立了归正教会，并亲自制定了教会宪章，根据宪章规定，每一教会设立牧师、长老、执事，各负其责。这种组织方式一直被新教长老派等教会使用至今。在神学方面，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预定论，即认为人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的命运包括贫穷还是富贵，早已由上帝“预定”，一切都决定于上帝的意志，因此在上帝意志之外去寻求得救的原因是荒唐的。所以人应该努力去工作，一切为了荣耀上帝。加尔文的这个神学主张论证了当时人们勤奋工作的合理性，因而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宗教观及其促成的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力。在对待圣事问题上，加尔文只承认洗礼和圣餐，他认为在圣餐中圣徒凭信仰领受到基督真正的尽管是精神的临在。日内瓦城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政权，议会由教士和富有的市民组成，加尔文宗（即归正宗）成为该市唯一合法的宗教。

1555 年后，加尔文致力于向其他国家推行新教教义，他收留了大批欧洲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传播加尔文宗的力量。加尔文还创办了“日内瓦学园”，这就是后来的日内瓦大学，学园很快成了加尔文宗的神学教育中心。它培养出来的牧师被派往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意大利。日内瓦逐渐成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国际中心，号称“新教的罗马”，加尔文也被誉为“唯一的国际性的宗教改革家”。

27. 西方来的“儒生”——利玛窦

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华，基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位最聪明，为了使西方的文化与宗教顺利地在中国落下根，他遵从中国的礼仪，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传教顺利进行。他就是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字西泰。他 21 岁时加入耶稣会，曾在罗马学院受神学教育，1589 年升为神父。1592 年奉耶稣会远东巡回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一年后，来到广东肇庆定居，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传教所。利玛窦入乡随俗，来华后立即削去长发，身着僧服，自称僧人，并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仙花寺。在肇庆期间，他发展了约 80 名教徒。1589 年，利玛窦移居韶州。此期间他研究了中国的四书五经，用拉丁文将其义译出并加了注释，1594 年译文完成，这便是四书五经最早的外文译本。通过翻译研究，利玛窦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赞赏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同时也亲身体会到在社会上儒生的地位要高于僧人，于是这位洋教士又废黜了自己的僧名，蓄起了长发，留上了胡须，改僧服为儒服，成了一名洋儒。1595 年他定居南昌后，广交儒士、官员，与他们谈天说地，讲哲叙史，并完成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义，声称他是从“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见解”的。

1597 年，利玛窦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后，曾以进贡礼物、协助修正历法为由，两次进北京。第二次因向明神宗进贡天王像、圣母像、天主经、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获得长驻北京传教的权利。同时，又因他能宫廷修理时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明朝廷授予了他官职。此后，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如地理、天文、数学等为由，结交了许多官员和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这些人除了对西方科学知识发生兴趣外，也对西方的基督教有了好感。如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徐光启，正是聆听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宣道，阅读了利玛窦的《天学实义》而受洗入教的。

利玛窦于 1610 年死于北京。除了《天学实义》外，他的主要著译还有《几何原本》、《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礼记》等。

在 16—17 世纪，一些传教士来华传教时要求信奉者要取西方教名，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因而使人们对天主教产生了厌恶。而利玛窦引用儒家经典解释天、上帝等概念，论证基督教上帝的存在，顺从中国祀孔、祭祖等传统和社会习俗，他的传教获得了成效。但他的做法却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认为祀孔祭祖是带有异端色彩的，是对中国偶像崇拜和迷信的过分宽容。但中国当朝却是支持利玛窦的，清朝皇帝康熙曾对传教士下令：“若不遵从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因利玛窦传教策略引起的中国礼仪之争，终以罗马教廷于 1939 年撤消关于中国礼仪的一切禁令而告结束。

28. 大理石筑成的交响诗——基督教教堂

教堂是基督教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建造教堂的历史便开始了。最早的教堂多由宫殿改建或仿照宫殿式样建造，因此，基督教的教堂以雄伟、壮观、庄严、肃穆著称。

不同时期的教堂建筑风格是各不相同的。早期的教堂多为长方形结构，这种建筑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美的。8 世纪后，拜占廷式的教堂开始出现。这种教堂在结构上呈正方的希腊式十字架形，内部装饰比过去更加富丽堂皇。11 世纪教堂建筑进入“罗马式建筑”时期，其特点是教堂建筑空间宏大，横厅和中殿呈纵长方形的拉丁式十字架，教堂各部分自成一体，又相互结成整体。12 世纪后期到 15 世纪末，是教堂的“哥特式”时期。哥特式的教

堂塔尖高耸，立柱修长，玻璃窗五颜六色，给人以神圣感。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建筑风格又回到古代希腊式和罗马式。宗教改革时期提倡简化圣事，简朴也成为教堂的建筑特点。现代的教堂，多为现代建筑风格，造型上讲究独特，不再千篇一律，而是百花齐放。20世纪中期后，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堂开始出现在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代风格还是拜占廷式、是罗马式还是哥特式、是现代式还是民族风格的教堂，大理石都是其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或用于地板的拼花，外墙的贴面，或用于堂内的立柱，堂内外的雕塑。现在让我们来游览一下世界最为著名的大教堂。

位于梵蒂冈城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堂。它于16世纪初始建于罗马。这座建筑集中了16世纪意大利建筑艺术上的最大成就，也凝聚了几代著名建筑大师和艺术大师的辛劳和智慧。在其修建的120年间，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著名大师都为之做出过贡献。它是最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特点的代表。

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典型。它坐落在巴黎塞纳河中城岛的东部，12世纪初动工，历时150余年。教堂顶的大钟重达13吨，钟响时声震全城。

英国伦敦城内的威斯敏特教堂建于7世纪初，11世纪后扩建。这个教堂不仅是一个宗教胜地，也是历史上英国政府的活动场所，英国国会曾在这里召开。威斯敏特教堂还以名人圣殿闻名于世，那里安息着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文豪。

东正教著名的大教堂当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堂。它建于6世纪，在造型上它融合了罗马式和希腊式建筑特点。它与雅典和罗马的万神庙并称为古代三大建筑杰作。

纽约曼哈顿河滨大道上的河滨教堂是美国新教著名的教堂。这座现代教堂的钟楼高20层，上有由74个钟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钟琴。

基督教的这些著名教堂现在已成为名胜古迹，人们在里面可以倾听到这些由大理石筑成的交响诗从古讲述至今。

29. 不竭的源泉、永恒的精神——基督教与西方艺术

不论你涉猎到西方艺术的哪一个门类——小说、戏剧、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你都会发现，这条流淌了两千年的艺术长河，似乎同基督教有一种不解之缘。

这首先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上。在文学方面，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波依修斯的《哲学慰藉》，从但丁的《神曲》到弥尔顿的《失乐园》，从班扬的《天路历程》到拉辛的《以斯帖记》，从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到托马斯·曼的《约瑟及其兄弟》等传世巨著，以及数不胜数的欧洲各国史诗和中世纪神秘戏剧；在造型艺术方面，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到提香的《圣母升天》，从鲁本斯的《下十字架》到奎尔查的《亚当夏娃》，从梵高的《撒玛利亚人》到高更的《黄色的基督》等不朽杰作，以及无法计数的不同流派的美术名作和不同风格的教堂建筑；在音乐方面，从亨德尔的《弥赛亚》到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从海顿的《创世记》到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从贝多芬的《D大调庄严弥撒曲》到柏辽兹的《基督的童年》，从施特劳斯的

《莎乐美》到伯恩斯坦的《耶利米交响曲》等伟大作品，以及不计其数的圣剧音乐和广为流传的赞美颂歌，全都直接取材于圣经或表现了基督教的信仰内容。

其次，这种“不解之缘”更多和更深的表现，是西方艺术中蕴含的思想、气质、理念和追求，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正或反、或深或浅地体现出基督教的精神。在英国，从莎士比亚到艾略特，在美国，从霍桑到福克纳，在法国，从拉伯雷到雨果，在德国，从歌德到黑塞，在俄国，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以及作为西方各民族文化代表的多如繁星的作家、诗人、美术家和音乐家，在其终生不懈的求索活动以及代表这种求索结果的广博深刻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基督教的精神。甚至在一些曾被称为反基督教的作家那里，实际情况也并不像我们的一些通俗读物介绍的那样简单。例如彼特拉克并不以“人性”反对“神性”，卜迦丘也只是对神性与人性的关系提出新的理解，伏尔泰实际上相信上帝，他抨击教会而不反对宗教，甚至尼采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当他在一则寓言中通过一个疯子之口说“上帝死了”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人们都不信上帝了。然而，西方人之继续信仰上帝，或者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信上帝，至今仍可以从其文学艺术当中看到。

第三，这种“不解之缘”的根源，若从表层分析，可以从西方艺术的源流中找到：在《圣经》中几乎可找到所有西方文学体裁的起源，而西方绘画、雕塑、建筑同基督教教堂的设计关系，西方音乐同基督教教会崇拜活动的关系，还有所有这些艺术形式后来的全部发展史同基督教历史的密切关联，都在证实着基督教与西方艺术的血肉联系。这种不解之缘若从深层分析，则应归结为西方艺术在内在精神方面同基督教的关联。事实上，最动人最优秀最伟大的西方艺术作品的力量，都可以归结为它们以不同形式反映的“神圣的爱”，而这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所以，人们常说《圣经》是西方艺术不竭的源泉，恐怕不应该只理解为它提供了无数的题材和内容，而应该理解为它里面关于“上帝就是爱”的宣告乃是西方艺术中永恒的精神罢。

30. 形形色色的神学——基督教信仰的理论表达

提起神学，有些读者会想起有些书上的这类介绍：神学讨论的是“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无聊问题。如果说这类介绍就好比说“这一滴水就是海洋”的话，那么读者是否该亲自去看看海洋呢？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顶多也只能装这个海洋中的一勺水。

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在历史中产生了众多的宗教，但是，从幼弱受困的初期直到强大盛行的现代，一直不断地在坚持自身信仰的同时还反思这种信仰，并力求用明晰一致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信仰的宗教，确实是不多的。基督教的这种反思和表达，就是基督教神学。“神学”这个词，在本来意义上甚至只属于基督教，只是在后来才被转用于其他宗教。神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theos*（神）和 *logos*（逻各斯），意为关于神或上帝的道理或学问或论述。它是基督教的理论表述，实际上是用语言和概念、逻辑和理性表述了基督教所理解的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即其最终的依托和意义问题。

在近两千年的变迁中，在不同民族的背景下，基督教神学一方面维持着统一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纷繁的形式。所谓统一的精神，就是各种神学不管彼此差距多大，都参与和反思着同一种信仰，即对上帝对基督的信仰。

所谓纷繁的形式，就是神学尽管有统一的精神，却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实践神学、历史神学、道德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等等；可以分成不同的学科——上帝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圣事论等等；可以形成不同的派别——天主教神学、新教神学、东正教神学、正统神学、异端神学、奥古斯丁主义、托马斯主义、加尔文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新正统主义、现代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新实在主义、过程神学、解放神学、黑人神学、妇女神学等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形形色色的神学讨论的都是极为严肃的问题，但它们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课题、宗教背景、概念体系、哲学框架、主要倾向和代表人物。所以其丰富多彩，绝不亚于人类创造的任何一门学科，而且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

神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它有什么重要性，或者有什么趣味呢？读者可以思考一下：你如果在外旅游，有时会寄居旅店，在那种情况下，知道一下这旅店主人在还是不在，如果在又是什么样的（是慷慨还是吝啬，善良还是凶恶，他是把店办成旅客之家还是办成宰客的黑店），自己在店里该放心自在还是该提防不测，这是不是毫不相干没有意义，是不是会影响你在住店期间的行动和生活？如果你思考了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自己对神学的重要性或趣味性作出判断了。因为“人生如旅”，“人生如寄”，这些老话告诉我们，人是世上的旅客，世界是人的旅店。神学要研究的，就是这个旅店有无主人，如果有则这个主人是怎样的之类问题，相应地，人在世界上，在人生旅程中该怎样行动的问题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反过来说，因为人不得不作这次旅行，不得不住这个旅店，所以也不能不产生这些问题，不能不探究这些问题，尽管很多人不像神学家那样有意识地提出和有意识地探究这些问题。

尽管神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但是它与这些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并且要把这些学科的成就纳入自己的视野。因为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本身的研究，必然会引起上述问题，甚至会引出对上述问题的某些观点。而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正是人的本性吧？

31. 上帝存在可以证明吗——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基督教的前提是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换言之，这是无需证明的。很多基督教徒还认为，这种信仰本身也是上帝的恩赐（恩典），人对上帝的认识乃是上帝向人揭示（启示）自身的结果。

然而，神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即自然神学（现在也叫哲学神学）却认为，以外在的自然（世界）为根据，用内在的自然（理性）作工具，人是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起码可以认识到上帝是否存在。于是中世纪的一些神学家就开始运用三段论之类的逻辑工具，试图像证明几何命题那样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首先应提到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提出的“本体论证明”。这项证明以后又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为之作了不同的表述。它的大意是：“上帝”意指最完美的东西；最完美的东西必然具备一切正面性质，其中包括存在；所以，上帝必然具备“存在”这一性质，即上帝必然存在。这项论证逻辑是，因为不存在的最完美者比起存在的最完美者来，不是最完

美者，所以说“上帝不存在”就等于说“最完美者不是最完美者”，这是自相矛盾。与安瑟伦同时代的僧侣高尼罗曾反驳此说，后来的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不赞成此说。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又提出了“五项论证”：1.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凡动者均由他物所推动，故必有一位最初推动者，即上帝；2. 世间一切事物作为结果都有其原因，因又有因，第一因即上帝；3.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偶然存在，依据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而存在，最终的根据即只依据自身而存在者或必然存在者，就是上帝；4. 世间万物之真善美等等都是相对的，相比较时都有更真更善更美者，故必有据以评判之绝对真善美标准，其本身是最完美者，此即上帝；5. 世间万物皆适合一定的目的，并为之而存在与活动，故必有一最高的理性作有目的的设计，此即上帝。前四项论证从已知的宇宙秩序出发，所以被称为“宇宙论论证”，后一项论证从事物的目的性和其中隐含的设计出发，所以又称“目的论论证”或“设计论论证”。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彻底批判了这些论证，但他的道德哲学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帝存在论证即道德论论证。这种论证一般的大意是：人的天性中都有道德观念，人还有不能不服从道德律的体验，这说明道德观念和道德律有超越于人之上的产生者或制定者，即上帝。康德论证的逻辑是：人明知善与福在此世常常不能结合，但仍然遵守“绝对命令”或仍然追求善，这说明善与福的结合即正义的存在，其既在此世不能完全实现，必延之于死后，而且必有其保障，即上帝。一般认为这属于在道德基础上的“公设”，而不是传统意义的逻辑证明。

现代哲学家和神学家中有不少人用新的方法修正了这些证明。如韦布、马尔科姆、罗斯和哈特索恩等重述了本体论证明；马斯科尔、科普尔斯顿、鲍恩和布莱特曼等人重述了宇宙论证明；帕雷、杜诺伊、布朗和泰勒等重述了目的论证明；纽曼、拉希德尔、德布尔等人重述了道德论证明。还有不少人士提出了新的论证，如马休斯、法默尔和滕南特等认为，把人类经验和宇宙发展的各个方面总起来看，有神论解释比其他解释较为更合理可信，就是说，上帝存在比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些。还有罗伊斯、拉希德尔、沃德、鲍恩、布伦塔诺、海勒尔、布龙德尔、贝格尔等都曾提出过不同的论证。

有些思想家批评了以往的证明，但又提出了新的论证。如帕斯卡、詹姆士和麦克因泰尔等都认为，上帝存在是不可证明的。因为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包括信和不信的自由，只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价值；如果上帝存在可以证明，那么人就受到理智的强制去接受，就像接受几何定理一样了。帕斯卡又论证说，既然上帝存在和不存在都没有证据，那么信和不信就像用自己的生命打赌，必须计算得失；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信则收获巨大（永生），不信则损失巨大（永罚）。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信则损失很少，不信也收获很少（都在此世），两相比较，信比不信更明智。这个论证被批评为个符合宗教精神。詹姆士的类似论证则提出，信的风险是受到欺骗，不信的风险是丧失真理，不能说后者比前者更好。

希克也批判了以往的证明，他指出要考虑的只是信仰的行动是否合理，因为信仰的对象无所谓合理不合理之分，只有真伪有无之别（就此而言，此世无法证明），对同一个对象，甲信可能合理，因为有充分的根据，乙信则可能不合理，因为其根据不充分。他在分析了信仰者经验的特征之后认为，他们是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宗教经验的。利奇蒙德认为，宗教经验、道德经验、

人类生存、历史和自然这五个领域的偶然性和非自足性都要求有超出经验领域的解释或整合，即必须用一个“不可观察的、非时空的、既卷入又超越经验世界的人格存在物”即“上帝”来解释，在我们经验中，“自我”就是这么一个存在物，换言之，世界的“自我”或“世界灵魂”就是上帝。蒂里希更进一步，认为上帝是“存在本身”，不是“存在物”；只有存在物才谈得上有或无，存在本身则谈不上，因为它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是使万物存在的力量；争论它的有无（存在或不存在），等于是把它降低为存在物，或者说谈论的就不是它而是存在物了。上帝不是存在着的东西，但是作为“存在”本身，比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更实在。蒂里希又总结说，人在有限性的处境中，必然要提出无限性问题即上帝问题，以往的证明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却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32.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

基督教虽不像很多古代宗教那样主张多神论，但其一神论也不是铁板一块式的僵硬主张。

基督教把创造并主宰天地的上帝称为“圣父”，圣父为拯救人类而遣圣灵通过马利亚之身生下耶稣，耶稣作为“道成肉身”，即是“人子”，具有完全的人性，又是“神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作为基督（意为救主）而被称为“圣子”；耶稣受难升天之后，圣灵（中国天主教译为“圣神”）继续在世活动运行，以使人从背离上帝的境况转向上帝“和好”。

基督教把圣父、圣子和圣灵看作同一个上帝的三个“位格”，即“三位一体”，意指三者各有特定的位分，却完全属于一个本体，同为一个独一的神而不是三个不同的神。教会认为这是不能凭理性理解，只能靠信仰接受的“奥秘”，所以关于三位一体的论述属于神学中的“启示神学”或“天启神学”的课题。这项课题又称“三一论”，它一般以《尼西亚信经》和教会历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三位一体”的表述为基础，以新旧约圣经和教父著作作为依据，解说父、子、灵三者互有区别不可混淆，但又同性、同体、同等而同为一个上帝的信条。这项课题还对“三一论”名称的由来，这项信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历史研究，并研究在三一论教义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学说及其相互间的论战，以及在这项信条上确定正统与异端的标准等等。

基督教神学家一般都认为三位一体论超乎理性但不违反理性，不少西方哲学家也同意此说。但是历史上对这项教义的解释还是众说纷纭。圣经中本无“三位一体”一语，但正统教会根据圣经记载，认为上帝通过父、子、灵三者的行动或表现而显示其本体，这是三位一体论的根据。在古代，奥古斯丁曾用心灵的“记忆、理解和意志”，或人间爱的“爱者、被爱者和爱的行动本身”来类比地说明三又一的关系。中世纪的阿奎那亦有类似说法。现代神学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有用类比心理学的“知、情、意”学说来解释者；也有按照“上帝即存在本身”的理论，把父、子、灵分别称为“创始的存在”，“表达的存在”和“统一的存在”，后一种说法指的是“存在本身”创生万物、表达自身以及使万物与自称复归统一这三方面的功能。

33. 世界从何而来？——基督教的创世论

“世界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是各种宗教和各种哲学都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力求回答的问题。基督教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整的但非一成不变的理论，称为创世论。

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历代的神学家曾对此作出了不少阐释。例如，奥古斯丁曾针对“创世之前”的问题论证说，是时间存在于创造之内而不是创造发生于时间之内，就是说，时间是同世界一起被创造的，所以谈论创世前创世后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按上帝形象造人之说，一般认为这意味着人身上也分有神性或者说与神有某些类似之处，例如精神、自由、创造和爱的能力等等。

19世纪以来，生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学说的流行，使人对圣经创世论的说法产生了疑问。一些神学家根据“圣经文字灵感说”坚持创世故事的字面意义，反对进化论；另一些神学家则认为圣经的说法有隐喻性质，所谓六天意指很长的地质阶段。现代神学家多半认为圣经不是自然科学著作，其中用神话形式表现的自然观属于前科学时代，不能从字面理解；关于上帝造人，也只是就人或生命的最终原因而说的。一些神学家更明确提出，在自然发展方面，基督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接受自然科学的观点，它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不是指世界有某个时间上的开端，而是说不论世界有无时间上的开端，它的终极依据或本原都不在自身。因为一切存在物都依赖于存在，所以世界作为整体也依赖于上帝。至于世界如何从无到有，那是一个神圣的“奥秘”。因此，创世论的意义是在宗教灵性方面，而在科学认识方面。

基督教创世论主张上帝创世是从“虚无”开始的。就是说上帝的创造不像人的创造那样必须以某种质料为基础。另外，它不同于“工匠造物”的比喻所暗示的自然神论（上帝创造了世界及其规律之后就任其发展不加干预），也不同于“太阳发光”的比喻所暗示的泛神论（上帝就存在于万物之中），还不同于主张“物是恶”的二元论（物属于恶魔，精神属于善神）。它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还在继续管理它，这既体现在自然发展又体现在人类历史之中，又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其自由而仁慈的行动之结果，他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还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是好的。现代不少神学家都主张“超泛神论”、即上帝既内在于世界又超乎于世界，还有些神学家则主张“持续创造论”，即上帝不是一次性完成创世，他的创造贯穿于宇宙进化和人类发展的一切过程之中。

34. 什么是“原罪”？——基督教的人性论

说起“原罪”，很多读者都知道圣经里的这个故事：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乐园里接受蛇的引诱，违反上帝禁令，偷吃知识树（或“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遂因抗拒神命而被逐出了乐园。

说起“人性论”，不少读者也知道从古到今有无数思想家对之进行过探讨，提出了“性善论”、“性恶论”等不同的学说。

那么，这个故事同“原罪”有什么关系呢？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不是就是“性恶论”呢？

这个故事的确是基督教“原罪”教义的圣经来源。这项教义认为，亚当和夏娃对魔鬼（蛇）的顺从和对上帝的背离，乃是人类的原始罪过即“原罪”，

它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间一切罪恶的根由，所以人类仅靠自己的力量无力摆脱罪恶，必须靠上帝通过基督（即救主）进行拯救。

基督教神学家对这项教义的解释，从古到今绵延不绝，众说纷纭。其中有些解释（例如把人人都有原罪说成遗传）和部分说法（例如刚生下来的婴儿亦有原罪），引起了一些疑问和误解，更使重视理性的现代人和非基督徒难以接受。其实，任何古老的教义或理论，其内涵都有适应时代、逐步阐发的过程，都需要用某一时代某一人群所能理解的语言，去解释包裹在古老的或神话的语言中的实质内容。

就圣经中这段故事而言，中国读者常怀疑：“知识”和“分别善恶”是好事，为什么上帝要禁止呢？且不说中国思想并不总认为知识是好事（例如道家就主张“绝圣去智”，“返朴归真”），实际上，圣经原文的“善恶”二字是超乎道德含义而具有本体含义的，就是说，它指的主要不是人的行为之好坏，而是任何事情的好坏或曰利弊福祸。人知道了这些，当然就能随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好恶而行动（例如趋利避害之类），因为人是不同于万物而赋有一定自由的。万物的行动都服从于自然规律（例如健康的动物饿时见了食物一定要吃），而人的行动都可以不服从自然规律而服从自己的意志（健康的人饿时见了食物可以不吃），一事当前，人是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行动的。这种按自身意志而行动的“自由”，正是神学上解释“原罪”的关键：人有滥用自己的自由而背离上帝的可能性，即任随自己的意愿而背离创造（因为上帝即创造活动）或不与创造合作、不为创造而只为自己生活的可能性。按基督教的说法，所谓“罪”，是弄错了对象的崇拜，是在追求生活的意义和支持时，转向自身和世间万物而不转向上帝，这就是偶像崇拜——崇拜自身导致狂妄之罪，崇拜事物导致纵欲之罪。一方面，这种“滥用自由”而犯罪的可能性是人人都有的；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不具有个人所具有的要负责任的感觉，所以它的倾向容易造成“集体的罪恶”或“罪恶的环境”，这是个人无力扭转而往往陷入其中的。把这两方面都考虑进来，再把原罪定义为人可能犯罪的倾向，也就容易理解每一个人包括婴儿都有原罪的说法了。至于用生理上的遗传来作解释，当然是现代人不可能同意的。

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正是一种人性论，因为它涉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解释。由于它侧重地讲了人犯罪的可能性（这“罪”当然不是指法律上的罪即对人间法律的违反，而是指宗教上的罪即顺从私欲违背神意之所行所言所思），所以有些人也许会把它归入“性恶论”一类的人性论。但是，“原罪说”，并不是基督教人性论的全部，因为基督教还主张：人也有“原义”，即对摆脱罪恶实现神性的渴望；人是“按上帝形像”造成的，即具有创造和爱的能力，这些又接近于“性善论”。但是同“性善论”相比，基督教人性论对人会作恶的可能性说得更多更深，不少人认为，这正是强调了人的自由和责任，使人对自己的罪过无所推诿，而且这正是西方社会政治观念重视契约制度、重视权力制约的思想根源。

35. 恶的难题——基督教的神正论

所谓“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道德上的恶，即邪恶或罪恶，二是指非道德的恶，即苦难或恶事；前者是人为的恶，即“人祸”，后者是非人为的恶，即“天灾”。这两层意义上的恶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为很多

人提供了不信上帝的理由：如果上帝全善，他就希望消除恶，如果上帝全能，他就能消除恶；既然世上有恶，那么即使有上帝，他也要么不是全善的，要么不是全能的，换言之，他就不是基督教所信的既全善又全能的上帝。这看来的确给基督教提了一道难题。

历来有无数哲学家神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在此先说两种答案。一种认为，罪恶是虚幻不实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这种答案既不符合多数人的经验，又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记录了很多罪恶，并认为它们违反上帝的意志），所以不是基督教的答案。还有一种认为上帝是有限的，正在努力同罪恶斗争。这种答案否认了上帝的全能，所以不是正统基督教的答案。

基督教对此的答案称为“神正论”，因为它的中心是说，尽管世上存在恶，但并不说明上帝不是正义的。它不是要辩解世上每一件恶事，而只是要说明，虽然有不可理解的恶存在，但并不妨碍人理性地相信上帝。这可以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恶不是上帝所造。上帝的创造是善（上帝创世后说这一切“是好的”）。恶也不是与善并立的终极成分，而是“善之匮乏”。恶只是本来善的东西之过错，本来有价值的东西之扭曲，或者在适宜的位置上本为善的东西之倒错。

第二，就道德上的恶即罪恶而论，它是由于具有“意志自由”的人滥用这种自由而造成的。一事当前，人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人在面临道德选择时，总有为善或作恶的可能，就是说他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选择作恶，这就是道德上的恶的根源，甚至就是“道德上的恶”的本意。因为，正如“身不由己”地做出好事不能称为道德上的善，同样，“身不由己”地做出坏事也不能称为道德上的恶，恶必须是“身能由己”的，即自由选择的。换言之，既有自由，就有了恶，同理，也就有了善。既然要有自由才有善，而且只有精神才是自由的，当然也不能否认自由本身是好的、是善，而且是已知的最高级的创造物。所以，道德上的恶乃是人对自由的滥用，即“本来有价值的东西之扭曲”，“本来是善的东西之倒错”。

也有人提过这样的诘难：上帝为何不造一种既有自由又不做坏事，既没有道德上作恶的可能的创造物呢？回答是：没有道德上作恶的可能，意思指生来就被注定不会做坏事，这样一种状态绝不能叫做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种状态下做的任何事绝不能称为道德上的善，正如不能说一台为人服务的机器在道德上是善的一样。因此，要上帝造一种只能做“好事”又有自由的东西，就等于要他造一种没有自由又有自由的东西，这是提问者的自相矛盾。而且，只能做“好事”的东西只不过是机器，或上帝牵线的木偶，它是比赋有自由的人低得多的。

第三，就非道德的恶即苦难而论，首先，它是很难同人类自己的选择截然分开的。例如水旱之灾就同人的贪图眼前利益（破坏森林或忽略水利建设）有关，很多疾病也同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关（以车代步与心血管病有关，性生活混乱与艾滋病有关，人造的生活环境与很多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都有关），甚至对地震这种似乎最不由人控制的现象，也可以提出一个诘难：如果人类把用于军备的人力物力全部用于地震预报和建筑改进，在减轻这种苦难方面会有怎样的效果呢？一句话，在所谓“天灾”中，总可以看到“人祸”的作用，看到人的罪恶或愚蠢。其次，它必然涉及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看法。关于世上有苦难所以上帝不善或无能的论证，有一个前提，即上帝造成了人，

就应造一个没有苦难的环境给人居住，换言之，所谓好的世界，应该是人的安乐窝。神正论的回答是：创造是一个无穷的过程，人也有一个通过自由选择而逐渐“圣化”，即发展自己的人格品质的过程，就此而言，人是未完成的，尚未完全“造成”，世界就是铸造人的灵魂的地方。假如世界上没有任何苦难，没有不义、危险、匮乏、艰难，会惩罚人的客观规律等等，那么当然也就不会有义、勇敢、谨慎、同情、坚毅、智慧，甚至不会有知识（因为没有必要认识规律，正如猪在猪圈里那样），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发展“人格品质”所不可缺少的。所以，那样一个世界尽管可能十分“安乐”，对于“铸造灵魂”来说，却可能是最坏的一个世界。正是由于这些理由，基督教主张，不但不能因世上的“恶”而否定上帝的“义”，而且正是因为有这些恶，人才更要选择善，并通过苦难而接近上帝。

36. 释迦牟尼是人，还是神？——佛教是怎样产生的？

在一部国外编写的《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书中，排列了 100 位自人类有史以来，贡献卓著的历史名人，其中释迦牟尼名列第四位。那么，这位被人们以雕塑、画像等形式长久地供奉在古刹洞窟中的释迦牟尼到底是人，还是神呢？

据有关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释迦牟尼作为世界三大教之一的佛教的创始人，本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所谓神通广大、大智大慧、手长过膝、面如满月的描写，不过是世人对他的渲染和神化，出于宗教信仰的崇拜而出现的。

释迦牟尼佛本名悉达多，意为“义成就者”，姓乔答摩，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城（约在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566—486 年。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此外还有佛陀，世尊等名号。

释迦牟尼出身显贵，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其母摩耶夫人早死，由姨母抚养长大。他早年生活优裕，又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后娶妻生子。此时的古印度各国之间相互争战讨伐，民不聊生，他所属的释迦族又受到邻国拘萨罗的威胁，朝不保夕。亡国灭族的预感，“积尸如莽、流血成池”的人间惨象，使他判定世间“无常”。又转向自身，反思人一生历经生、老、病、死，无论贵贱终不免相同的命运，而发出人生是苦，苦海无边的悲叹。终于在 20 岁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踏上了探索人生解脱的漫漫长路。

离家以后，他到处漫游寻师，曾在尼连禅河边静坐思想，实行苦行，据说他 9 天才进一餐，身穿树皮，睡在牛粪或荆棘上，6 年后，身体消瘦，形如枯木，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真理。于是他抛弃苦行，来到菩提伽耶，坐在菩提树下静思冥索，历经 7 天 7 夜，终于觉悟成道，因而被称为“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 35 岁。

释迦牟尼悟道后，为使他的思想学说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他便开始了长达 45 年的传教活动。他先在婆罗奈城郊的鹿野苑，向阿若侨陈如等他的 5 个侍从宣讲“四谛”（意为“四条真理”）的道理，并收他们为最初的佛弟子。这次传教被称为“初转法轮”。以后释迦牟尼主要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传教，舍卫城的祇园精舍和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成为他布道说法的重要场所。他传教的对象，上至国王、大臣，下至渔民、妓女，很快他的学说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起初，他和他的弟子们云游乞食，后来方建立了僧院，并

制定了戒律。据说他在拘尸那迦城郊一条河边的婆罗林中圆寂，终年 80 岁。殁后火化的遗骨被称为舍利，为教徒们建塔供养。

以后，由释迦牟尼开创基业的佛教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所创立的一整套佛教学说，2500 余年来一直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许多理论和实践至今仍为佛教徒所遵循。他提倡要人们去除欲望，追求清净解脱，摆脱世俗的事务烦恼，对现代处于紧张运作社会中的人们，也不失之为一种自我调整的方法之一，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因为此，他所创立的佛教能够绵延二千余年。今天，佛教仍流行于中国、日本、东南亚诸地，并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一个超民族和超国家地区的世界性宗教。

37. 独善其身焉为坏事——小乘佛教指的什么？

“乘”是外来的佛教名词，依照“乘”的梵文原义，即为“运载”、“车辆”，或者有“道路”、“事业”的意思。

小乘，即小乘佛教，是指大乘佛教产生后对其先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因此，先有小乘，即原始、部派佛教；后有大乘。换言之，小乘是大乘发展的前题。小乘的主要经典是《阿含经》等。它产生于古印度的奴隶制社会，大约在公元前 6—5 世纪左右，相当于我国春秋百家争鸣时期。

按照佛教的说法，所谓小乘，就是小道小业、车小路窄的一类。它只能“度”自己或一一些人，即“自利”；它不能“普度众生”，即“利他”。但是现在所使用“小乘”的说法，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专门名词，它不再含有任何贬意。

大约在公元 1 世纪前，小乘的一些部派向大乘各派发展，最明显的是，小乘的大众派系向大乘的空宗发展；另一是小乘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形成大乘法相唯识有宗。这些发展的地区，一般地说经济比较发达；而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则基本上保持着小乘的主要特点。

现在小乘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属于南传佛教，自称“上座部佛教”，并反对“小乘佛教”的说法。我国三大地区佛教之一的云南傣族等地佛教（简称云南佛教），均属上座部佛教。

从理论上讲，小乘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即否认有真实的自我，但不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从实践上讲，小乘佛教徒认为佛祖释迦牟尼佛是最高的，一般世俗之人是达不到他的地位的，教徒即便修行，也只能证得到阿罗汉的果位而已。所以小乘佛教徒关心自身的解脱，追求无我的境界，佛教称为“灰身灭智”。但是，小乘佛教徒也关心世间，主张行善的宗教伦理道德，反对作恶的活动。只是他们更多地认为行善去恶是每个信徒自身所具备的起码素质，毋需别人去多点拨。在具体修持方法上，则注重于持戒修行，有了戒行以后再去修习定，然后取得佛教的智慧，走的是一条渐渐获得觉悟的道路，称作“渐修”。

其实，佛教关于“乘”的说法，本来就是后人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做法，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小乘佛教能够经过 2000 多年的时间，至今还在世界流传，说明了有其存在的理由。世界本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环境，因此根据具体的情况，才能决

定采取什么学说和宗教信仰。小乘佛教所主张的“独善其身”，行善去恶的思想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把自己管理好，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影响人家呢？如果每个人都“从我做起”，那么整个社会和世界就会减少许多暴力凶杀等犯罪活动，行善去恶是普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准则。

38. 人人都可以成佛——大乘佛教古今谈

大乘，即大乘佛教，是在古印度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之后出现的一个全新派系的佛教。它的主要经典有：《般若经》、《维摩经》、《大般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大乘佛教产生于古印度的封建制社会，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或稍后一个时期。

按照佛教的说法，所谓大乘，就是大道大业，车大路宽的一类。它不仅能“度”自己，而且能“度”众生。即既能“自利”，更能“利他”。

大乘佛教在古印度有三个发展阶段：（1）初期阶段，约1世纪至4世纪，其《般若经》主要阐述“诸法性空”的理论，后形成龙树、提婆创始的中观学派；（2）中期阶段，4世纪至6世纪，其《涅槃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解脱理论。由《胜鬘经》、《楞伽经》所讲的如来藏缘起，和《解深密经》阐扬的阿赖耶识缘起为特点，不少佛经进一步阐述一切唯识的理论，从而形成由无著、世亲为始祖的唯识学派，一称瑜伽行派；（3）后期阶段，7世纪以后，其《大日经》、《金刚顶经》为密教创立的经典。密教既吸收了中观，唯识两派的观点，又吸收了印度教的信仰，以推重咒术、仪规以及神秘主义教义为其特色，密教后期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作法。至13世纪初在印度绝迹。

东汉初，大乘为主的佛教传入我国，后由我国再传入朝鲜、日本、越南；7世纪由中国内地又传入西藏、蒙古、苏联西伯利亚等地区。属于北传佛教，其分为两个系统，前者经典是汉文系统，后者为藏文系统。

从理论上讲，大乘主张“我法二空”，既否认有真实的自我，也否认有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从实践上讲，大乘把佛陀全盘神秘化了，佛与众生没有区别，人人都可以成佛觉悟，故提倡三世十方的无数佛。主张利他、众善，追求普遍解脱（普度众生），把成佛度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修持的最高目标。在修持内容和方法上，则倡导和兼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内容的菩萨行。

印度大乘佛教的出现，是反对原有的小乘佛教的修行繁琐和僧团堕落等情况而新出的。其特点是在实践上更加简便易行，在信仰上将天国和世间的距离拉近，佛成为人人可见，能够得到的直接信仰。在思想上，哲学的思辨色彩更加浓厚，以至发展到了繁琐至极的经院哲学之地步，结果又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最后终于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但是，大乘佛教在东亚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所主张的人人都可成佛的佛性说，和“三界一心，唯识所造”的唯心主义思想是禅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思想渊源。它所提倡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是佛教徒的做人准则。而既要自己觉悟，又要让他人觉悟的“自觉觉他”主张，激励了历代佛教徒做无私奉献。它所构造的宇宙观，与现代天

体物理学的观点极为接近。所做的禅定心理分析方法，是现代心理学界的先驱，至今受到西方心理学家的推崇，更是现代气功学挖掘的重点。其流传下来的寺塔窟院等宗教建筑和绘画音乐也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基础，总之，它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糟粕，需要我们去有批判地继承

39. 中国佛教第一个民族特色宗派——天台宗泛论

天台宗是我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初创于陈隋，唐代盛行。本宗以印度龙树为初祖，二祖为北齐慧文，三祖慧思（515—577），四祖智颢（538—597年），而智颢才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南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智颢和弟子20余人久居天台山，反复探究佛教教义，并著书立说，遂成一家之言，首创此宗，并以天台名宗。又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创宗经典。以智颢所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一称天台三大部）为基本经典，因此天台宗又称法华宗，这是以经名宗。入隋后，天台宗传法的主要道场，是天台山国清寺。

天台宗主张止观并重，就是说禅定和义理同时修习。这一主张，就是把南北朝时的“南义北禅”异趣融合在一起。还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即将声闻、缘觉、菩萨不同果位构制的“三乘”教义，会同归到佛的“一乘”。天台宗在本体论上，主张心、真如划一，世间万物，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现象，都是人心一念的产物，即称为“一念三千”。此外，还提出了“三谛圆融”、“一心三观”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没有“自性”的，因而是空的（即“空谛”）；它只是“名相”，或是一种“假名”（即“假谛”）；而非空非假，才是对真理“中道”（即“中谛”）的认识。空假中三谛互相融通，即为“三谛圆融”。“三谛”为什么能“圆融”呢？因为“三谛具足，祇在一心”（引自智颢《摩诃止观》卷六），只要“一心”念起，就能具足“三谛”，所以“三谛”是可以互相融通的。从认识论和修行上还要求“一心三观”，就是观空、观假、观中三观，全在于“一心”念起。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摈弃恶根，进入“真如”境界。从判教上看，天台宗提出了五时八教。五时就是：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即把佛经宣说分为“五时”，而天台宗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法华涅槃时。从教义内容和说法方式上，把佛教分为“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即所谓“八教”。化仪四教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四教分为：藏、道、别、圆四教。天台宗认为自己是属于教义圆满（“理圆”）的圆教。

天台宗在智颢、灌顶（561—632年）时极为隆盛，后渐见衰微。到了中唐，经湛然（711—782年）的努力，呈“中兴”之势。他提出了“无情有性”之说，即主张草木砖石皆有佛性，是一种接近泛神论的观点。会昌法难后，天台宗一蹶不振，到了11世纪初分为山家、山外两派，山家派对后期佛教有一定影响。

9世纪初叶，日僧最澄入唐求法，到天台山国清寺从湛然弟子道邃、行满苦修天台教义，回国后传播天台宗，又传密宗。11世纪下叶，高丽僧义天曾入宋学习天台教义，自此天台宗远播朝鲜。13世纪，日僧日莲据传入《法华经》创立日莲宗。

40.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的学说

印度龙树的“净土三经”和世亲《往生论》被传译之始，就一直风靡中土。一个构想神秀，“妙有”的佛国乌托邦紧紧吸引着乞求改变命运的芸芸众生。《无量寿经》的美妙、《观无量寿佛经》的精致、《阿弥陀经》的简捷平等、《往生论》（全名《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的渴求，深深打动了苦难中挣扎的人们的心扉。据史书载，东晋名僧道安首持这种信仰修行，每次他带领弟子8人，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往生兜率（即净土）。稍后，竺法旷又倡导一种祈求往生弥陀净土的思想，其中西方三圣的观音信仰也始行于此时。以后道安高足弟子慧远在庐山邀集18贤，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而名噪一时。因此被尊为净土宗初祖。此外，还有一位对东瀛至今有影响的净土先驱，他是北魏住玄中寺的昙鸾。他所著《往生论注》对后世影响久远。据说现在日本僧人还尊玄中寺为净土祖庭。但是，真正的净土创宗人是唐代的道绰及弟子善导。道绰以前，修净土偏重“观想”，经道绰改为“持名”（称名）念佛，即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前为心念，后为口念。因此由道绰改革的净土信仰的简便法门，奠定了净土宗形成的基础。至于到了善导，极力推崇“念佛”，还根据“净土三经”中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描绘，创作了“净土变像”三百幅壁画。他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往生礼赞偈》。净土宗，由善导实际创宗于终南山。会昌法难后，净土宗绵延不绝，明清两代更为盛行，出现了禅净双向修行的局面。净土宗也称莲宗。其世系、法统，历来有“莲宗七祖”、“莲宗九祖”之说。

净土宗创宗经典，为三经一论，即“净土三经”和《往生论》。

净土宗人主张俗居的现实世界是“尘世”、“秽土”。“西方极乐世界”，其教主是阿弥陀佛。那里由“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的五光十色的一切，是个富丽堂皇的理想之国。无论是僧人、居士，还是普通人，只因口诵教主名号，就可以死后往生西方净土，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

净土宗经文短制、义理单一（目标明确），诱惑力强，修行方法简便易行，确实是“功高效速”的简便法门。

由于净土宗经文简短，修行便捷，又向所有人出售通往净土的门票，对于长期处于种种困扰中的人们，这无疑是一剂沁人心肺的良药。他们似乎真实地感觉到了一种往生佛国的平等权力，精神和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于是他们便投向了净土的怀抱。因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广为传播，经久不衰，并流布至今。比如像《净土资粮》一类的浅显读本，现在还广为流通。唐宋时期，该宗远播日本、朝鲜。在日本特别兴盛，派别林立。12世纪初，由法然创立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开创净土真宗，分为大谷和本愿寺派等等。

41. 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法相宗学说的古为今用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亦名慈恩宗。此宗创建，发轫于唐三藏法师玄奘，完成于其四神足弟子之首的窥基。

法相宗以一经二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

为创宗经典，主张“八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从阐述法相入手，推证“唯识真性”的存在。还有“唯识三大部”（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弟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再传弟子智周《成唯识论演秘钞》）也是本宗的基本经典。

万法唯识，这是法相宗最基本的观点之一。他们认为，五彩缤纷的世界都是由人的主观内识而实现的，世间的各种现象虚妄分别，都是人们执著于名词概念而受遮蔽的结果，这就是事物的“遍计所执性”。换言之，就是客观世界是虚空妄有的，可是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又不可能否认，于是进一步又说万物由缘（互为条件）而生起，并非“实有”，只是假有，这就是“依他起性”；这种推论事物假有的主观意识，也就自然破除了被名词概念所蔽的万物实有性，这样才能最后显露出“真如”的实有，得到圆满的认识，这就是“圆成实性”。前二性是说万物是妄有的、假有的，后一性是说“真如”是实有的。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这是法相宗人的认识论。显然这三性都离不开“识”。识有八种，而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八识”之首，是具有变现万物功能的最重要的“内识”，因此又被称为“种子”，而且是最圆满的“无漏种子”。此外，还编织了“五位百法”烦琐的方法论；提出了“五种性”的佛性论，主张“五种性”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佛，这和南北朝以来佛教界早已倡导的“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理论相违。还将佛教逻辑学（因明）传到中国。但由于法相宗基本照搬印度的唯识教义，不能适应“贞观盛世”的社会要求，因此在唐代兴盛了数十年而已，不久即衰。但是它的精深思辨和缜密的思维方式却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的理论水平。虽然后来有人指责这是典型的经院哲学，然而却不能否认它的成就。

法相宗创宗不久，唯识之学便远播日本、朝鲜。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沙门道昭等随使入唐，遂为玄奘弟子，并得到奘师亲传，后携新译经论回国，为日本国弘传慈恩学说之始。后日僧智通、智达入唐留学，受学于玄奘门下，业成回国，为日本法相宗二传。又长安三年，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从智周门下，返国后大弘法相宗义，为第三传。以上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开元四年，智凤再传弟子玄防入唐，仍从智周修习慈恩宗义，在唐留学19年后返国，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玄奘门下的新罗沙门，人材荟萃，有神昉、圆测、道证、顺景、道伦、太贤等人，后学成归国，取得较大成就者有道证、顺景、道伦。

法相宗的学说虽然在中国大地盛行一时，不久即寂，但是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步入近代，以思辨为特点的唯识学说再次受到了人们关注。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杨仁山、熊十力等人都对法相宗的学说给予了新的解释。谭嗣同以法相宗的学说作为经世佛学，认为唯识思想可以正人心，通思想，舍身救世，勇猛无加。梁启超认为唯识的“境由心造”，“万法唯识”的认识论，构成了东方人生哲学的“尽性主义”，以心力征服世界为特征。章太炎则认为由识所造的思想，可以增进国民道德素质，建立“无神宗教”，批判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本世纪在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法相宗的二个学术团体，它们是南京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以韩清净为首的北京三时学会，时称“南欧北韩”。而著名哲学家熊十力以唯识学说为本位，杂揉儒、道二家思想，创建了“新唯识”学说，至今仍有影响。以上种种情况说明，法相宗的思辨学说在东方哲学中有其独特地位，并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例如谭嗣同、

章太炎等就认为唯识学比康德的理念学说高一筹。

42. 以律为本——律宗概说

律，就是三藏（经、律、论）之一，是佛教僧侣和信仰者守戒、受戒的法律典籍。在三藏中，仅次于佛说的经文，它也是佛制的律法条款，具有普遍意义。从教义实修上来讲，律，又是戒律，是佛教僧侣和信仰者铁的纪律，也是三学（戒、定、慧）之首学，是用它来区别于非佛教中人的最根本标准。

至于受戒，就是根据戒律条款的规定，对于佛教徒守戒条款的多少，有次第地授予相应学份的宗教仪式。比如，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等等。受沙弥戒后，还不算是正式僧人；只有受了比丘戒、才算是正式僧人。授菩萨戒之人，就是身份较高的僧人。然后发相应身份的度牒，即身份的合格证书。根据身份高低，再授予相应的职务。一般要由政府颁发。历史上曾出现滥发度牒的现象。至于身份和学问，一般是成正比的。

律宗，以三藏之一的律藏称名宗。创宗人是唐初名僧道宣（596—667年）。

据说佛陀在世时，为约束僧众行为制定的各种教规、教律。佛教在第一次结集时，由优婆离诵出律藏。印度部派佛教初期，各部派所持戒律差别很大。南北朝时，先后都已传来中国，其中《四分律》流布最广，最后由道宣在从智首学习《四分律》教义基础上，写出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使各派律师统一于《四分律》之外，同时对《四分律》加以改造，用大乘教义讲解《四分律》，对其作出了“定于一”的阐述。还规定了新的传、受戒法的制度，使以后学者，都以他的解释和规定为依据。这样道宣创律宗于终南山，成为一代宗师。晚年一直在终南山潜心著书立说。律宗又称“南山宗”或“南山律宗”，弟子有大慈、名恪、周秀、灵萼、融济和新罗智仁等。与道宣同时在弘传《四分律》的还有相州日光寺的法励和弟子明导、昙光、道成等人，创律宗之一的相部宗。西太原东塔寺怀素因不满意法砺的学说，独创一家，称东塔宗。后来相部和东塔二派渐渐衰微，只有南山宗独自流传下来。元明之际，律宗几于无闻，到明末清初，才开始复兴。

现代律宗门下最为著名的是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后改名叔同，别号息霜，亦称晚晴老人。他出家前是一名有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担任过多所学校的图画和音乐教师。出家后，潜心律学研究，著有佛学著述多种。他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在佛教界影响很大。1942年逝世于泉州，后人在杭州专门为他立碑设立纪念堂。

此外，在唐开元年间，著名僧人鉴真法师，为传播律学，六次渡海，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到日本传戒，被日本律宗信徒奉为宗祖，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43. 三密相应，天人合一——密宗养生的意义

唐朝中叶，印度的密教进入隆盛的时期，当时传来的行为密法和瑜伽密法，顺应了王室和民间的需要，又杂揉儒道两家和民间信仰的一些内容，形

成了一个有特色倾向的佛教宗派——密宗。当时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已经先后来到长安，一行（673—727年）遂拜善无畏为师，又从金刚智受戒灌顶。善、金又应一行请求，分别译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即胎藏系密法（行为密法）、金刚系密法（瑜伽密法）。这样一行在两位大士分别指导下，同时研修两种同源异流的密法，从实践上开了两种密法合流的先例。同时还撰写了密宗创宗经典《大日经疏》。后来不空（705—774年）大士也受了两系密法。而一行的这些创举表明，密宗的道统观念基本确立，是不空无法替代的，随之创立密宗。创宗人是“大慧禅师”——一行法师。

密宗依据的经典是《大日经》、《金刚顶经》、和一行的《大日经疏》。密宗人以高度有组织的密咒、仪规、俗信为主要特征，宣传“六大为体”（整个世界是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三密为用”，即众生修行必依手结契印（作各种特定的手势，“身密”），口诵真言（宣说各种特定的咒语、“语密”）、心作现想（心里想着大日如来等各位本尊，“意密”），这样和如来的三密相应，就能“即身成佛”。此外还宣扬“金胎两部”、“五佛五智”、“三句法门”等思想。其中特别是《金刚顶经》杂有印度的性力崇拜和“大乐”思想，推行灌顶、双修、轮座等秘仪，这与中国传统道德不合，受到制止。开元之后不久便衰亡了。但在西藏、云南等地仍然流传。

贞元二十年，日本僧空海来华学习瑜伽密法，从慧果受胎、金二界，回国后创真言宗，成为初祖。始弘瑜伽密法，称为东密。后真言宗出现了许多派别。此外，日本天台宗人圆仁也弘瑜伽密法，被称为台密。

密宗因以修习密法为其特征，故历来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斥之为“污秽之术”。但是在密宗的修行活动中，也有一些内容应该加以重新认识，例如密宗的瑜伽密法，实为佛教所说的禅定方法，现成为现代气功学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密宗认为，除了自然界的大宇宙之外，人是一个小宇宙，修习密法，通过入静得定的过程，就可以达到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的情形。现代生理学和医学已经证明，人体内存在着一个经络系统，只要运用得当，体内的潜能就可以发挥出来，各种穴脉贯通，可使身体器官运动更加协调统一，因之有助于健身。从社会意义而言，现代人始终处在一个充满各种烦恼和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绷紧神经和紧张的大脑也希望能有一个松弛的机会，就此而言，修习静坐密法，专心致志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求得心中的片刻宁静，暂时忘却尘世的喧闹，全部身心都投入超然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密宗并没有被人们遗忘，而更多地作为一种健身之术和养生方法，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44. 佛教的中国化——禅宗流行原因谈

禅是梵语音译，一作禅定，是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又是戒定慧三学之一，也是大乘独修的六度之一。禅宗则是以禅名宗的佛教派别。禅宗和中国佛教各派一样，大多主张定慧双修，禅教并重的。它又特别推重禅定，将其视为佛教修习的全部内容。同对又以传佛心印，觉悟众生佛性为宗旨，因此又称“佛心宗”。

根据禅史记载，禅宗祖师可以上溯到印度的摩诃迦叶，后有“东土五祖”，即初祖菩提达磨，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弘忍后主要有两派，神秀在北方传教，主张渐悟，恪守上代教法，坐禅息念，住心看净；

慧能在南方弘法，主张顿悟，不死守名词概念，不重坐禅，认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在世时，南宗禅偏于岭南一隅，未见有大影响，可当时神秀贵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确实独步帝都，显赫一时。后经慧能弟子神会几十年的努力，南宗禅终于在北方获得正统地位。在神会死后30年，被定为禅宗七祖。慧能弟子还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两系，后衍为“五家七宗”，后期禅宗的鼎盛局面可见一斑。因此行思、怀让对后世禅宗的开创意义，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会昌法难后，南宗禅主张“农禅并作”，使其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晚唐五代传遍全国，宋以后，不仅湮没了弘忍门下包括神秀北禅一系的所有支脉，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流传至今。

12世纪，禅宗由日本僧人荣西、道元师徒传入日本，还传入朝鲜、越南等国，以后又远播欧美，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禅宗被人们称之为最具中国化的佛教派别。所谓“中国化”，是说外来的佛教进入中国大地后，被中国佛教徒吸收消化，并给予改造，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宗教文化特点的情况。禅宗创始人慧能破除对佛的权威之迷信，大胆摆脱经典教条的束缚，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便法门，并把禅与生活结合起来，倡导了“农禅并作”的修行生活，既保持山林佛教特色，又主张出家不离俗尘，佛与众生不二，人人平等的成佛思想，为现实中欲求解脱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45. 外来宗教文化必须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早期藏传佛教的四大宗派

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在当地流传的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唐代，我国的汉地佛教禅宗曾一度传入藏区，但不久即退出，现在的西藏佛教主要受到来自印度和尼泊尔佛教的影响，称之为“藏传佛教”。

从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进入了成熟期，其重要的标志是，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开始形成，最早出现的是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四派。

宁玛派，宁玛，意为古旧。因该派僧人戴红帽，又称红教。祖师为8世纪来藏传密法的印度僧人莲花生，实际创始人为索尔波且·释迦生（1002—1062年）、索尔迥·喜饶扎巴（1014—1074年），索尔迥·卓浦巴（1074—1134年）、绒·却吉桑波。他们依莲花生入藏时所传密咒和所遗伏藏修习，传承分为三条：一系是索尔波且将整理的宁玛经典和密法传授给养子喜饶扎巴，喜饶扎巴又传幼子卓浦巴；另一系是绒·却吉桑波所传大圆满法；再一系是以部分伏藏传承为主，兼弘第一系传承的经典，以娘·尼玛俄色、古如·却吉旺秋、扎西多吉、居美多吉为代表。三系发展较为缓慢，16、17世纪才有一定规模的寺院，后在达赖五世支持下，才得以发展，是宁玛派的极盛时期。其寺院曾一度遭准葛尔王摧毁，不久便修复，如多吉扎寺、敏珠林寺等，有大德世代住持弘法。

噶当派，噶当，意为一切佛语（经律论）是僧人修习的准则。创始人翁仲敦巴（1005—1064年）。1054年他去阿里迎请孟加拉僧人阿底峡来藏传法，遂拜为师。阿底峡针对西藏学法僧中出现的重密教轻显教、重师承轻经论、重戒律反智法以及修行次第混乱等偏颇现象，作《菩提道灯论》，《论》中

阐明显密教义不相违之理，应遵循由显到密的修行次第。此《论》对后世藏传佛教影响深远。1056年，仲敦巴建热振寺为根本道场，遂成噶当派。仲敦巴死后，其弟子传承分为三大派系：即教典派系，由博多哇所传，主讲“噶当七论”；教授派系，由粗赤拔所传，主弘阿底峡“三士道”，以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而达到“即身成佛”；教诫派系，由普穷哇所传，以“恒住五念”为主旨，所崇本尊为“噶当七宝”。噶当派传法甚广，其他宗派均深受影响。15世纪初，宗喀巴主要依此派教义创立格鲁派，后噶当派归入格鲁派。

萨迦派，意为白土。此派因建萨迦寺所在地（今日喀则萨迦县）得名。又此派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金刚手的红、白、黑三色花条，因称花教。师祖为卓弥译师（994—1078年）。他曾到印度学密法，所得“道果教授”为萨迦派所奉的特有教法，对后世佛教影响颇深。实际创始人是贡却杰波（1034—1102年），意为宝王。幼从父兄学宁玛派教法，后改从卓弥学新译密法，以卓弥所传“道果教授”为主。1073年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遂开创萨迦派。后此派由贡却杰波家族世代相传。主要弘扬显密佛法，不禁娶妻，并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色。元朝是萨迦派的极盛时期，该派五祖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为西藏地方僧侣贵族统治之始。元末式微，其地位被噶举派取代。

噶举派，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服，又称白教。其创始人是玛尔巴译师（1012—1097年），曾多次赴印度、尼泊尔学法，从印度月称派 孛热巴修习无上瑜伽部密典，又从弥勒巴证得大印境界，并详细研修各种佛法。回藏后，在洛扎卓窝垅广为收徒传法，遂创立噶举派。该派主要学统是印度月称派中观见，其大印传承，不重文字，重在证理。以隐匿山林，重实修为乐，又融会噶当派教义，支脉众多，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曾超过当时藏传佛教一切教派。后一直受到元、明两朝册封，势力日盛，不少支派分别执掌西藏各地方的政教大权，前后一直持续了80多年，称为噶举派极盛时期。明宣德十年（1435年）以后，由噶举派人发动了多次的不义之战，致使前后藏政权分裂了150年左右。1640年，固始汗进藏，尽取前后藏政权，噶举派势力才日趋衰落，逐渐被新兴的格鲁派所取代。

以上四个宗派的成立和发展，旨在说明一个这样的事实，即外来的宗教文化，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然后经过吸收和改造之后，才会有新的发展，否则只能被拒之门外，或传入不久即衰。事实确实如此，佛教传入西藏后，曾与当地原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互相吸收，互相斗争，互相影响。10世纪以前佛教曾一度在藏区兴盛过，可是后来受到维护传统，信仰本教贵族的排斥，佛教受到打击，几乎差点没有影响。因此，佛教史上称9世纪前的西藏佛教为前弘期，把10世纪以后的佛教称为后弘期，一个“弘”字恰恰点明了佛教在西藏的盛衰消长变化。

46. 后来者居上——从禅宗来看格鲁派的发展原因

在西藏佛教史上，15世纪初由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影响最大。“格鲁”，意谓善规或善律，以严守戒律而得名。又因此派僧人皆着戴黄色僧帽，亦称黄教。宗喀巴从小皈入佛门，16岁入藏习佛，37岁时开始对西藏佛教进行宗教改革，撰写经论，举办法会，创立了格鲁派。明永乐年间，他派遣弟子达玛仁钦在拉萨修建了甘丹寺，标志了格鲁派的正式建立。1416年弟子绛央却

杰建造哲蚌寺，越2年弟子释迦也失修色拉寺，史称黄教三大教。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格鲁派实施活佛转世制度，最终形成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系统，其势力遍及西藏、青海、新疆、蒙古、西伯利亚等地。从17世纪以后，格鲁派僧人与西藏贵族一起执掌统治西藏的权利，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权，长达几个世纪。

在格鲁派兴起之前，西藏佛教原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四个佛教宗派，但是在格鲁派兴起之后，上述四个派别都纷纷衰落，有的势力锐减，有的移入它派，有的退出原有的地盘，只在藏区的边远地方流存，影响日益减少，远远敌不过后出的格鲁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值得我们好好思索一番。有人认为是因为清朝政府极力维护和支持格鲁派，使得其兴盛发展，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宗喀巴对佛教进行改革，整肃了僧团，严格了戒律，促使格鲁派日益兴隆。这些原因固然重要，是格鲁派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把眼光放得更宽阔一些，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的背景下来看看历史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是汉地佛教的鼎盛期，这时曾先后出现了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八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形成诸宗竞秀，共享天下的大好局面。但是没有多久，到了宋代，整个汉地佛教主要留下了净土宗和禅宗两大派别，到了明清，唯有禅宗的影响最大。禅宗自我标榜为“佛心宗”，以提倡顿悟，不重禅颂，直指人心为特色。它的建立正好适应了中国人的口味，即不执著于文字言相和烦琐的修行方法，仅心中有佛，即可速成的宗教实践观。可见，一个新教派的建立和发展，是由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创新特点所决定的，禅宗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因而能够流传。至于天台宗等其他民族宗派，有的因仍然执囿于传统的印度佛教理论和实践而忽视了中国的特点，故不能长期流传，如法相宗。有的因教义烦琐，理解的人不多，而只能在素质较高的教徒中流存，如华严宗。也有的因在实践上难以取得速成，因而影响骤减，如天台宗等等。禅宗兴盛发展的事实，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格鲁派的身上，它之所以能够独枝一秀，关键还在于它适应了藏区的情况，充分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特色。与宁玛等四派相比，格鲁派所受的印度佛教的影响较少，又吸收了各派的长处，特别是噶举派的教义，同时还抓住了机遇，赢得了西藏贵族和清朝廷的信任与支持，故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压倒其他，大行于藏区。

47. 长期被人忽视的滇密——大理阿闍梨教琐谈

密教是印度佛教晚期出现的教派，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手持契印，心作现想三种密法，并认为此三种密法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密教早于唐代就传入我国，以后又传入西藏。但是密教在云南大理的传播，却被学者忽视，直到近年，才开始被系统介绍出来。

据云南邓川《大阿拶哩（阿闍梨——引者）段公墓志》载：“唐贞观己丑年（629年）观音（人名——引者）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扬法律等五十姓之僧侣，开化北方，流传密所……迨致南诏奇王之朝，大兴密教”，可见7世纪初云南大理地区已有印度密教传入。从墓志看，它被称为阿闍梨教。阿闍梨，意为教师，轨范师。其中提到的扬法律，是印度僧人，在大理传教

的成就很高，被称为“大密法师”。尔后来滇游化的阿闍梨教僧人日见增多，他们大多是由滇缅古道北来云南大理传教的。因此可知，阿闍梨教一般认为是由印度的阿萨姆通过缅甸传入云南的。亦因云南独有，故又称滇密。来滇传法的阿闍梨僧人，有的驻山弘法，有的办密教道场，有的助建寺庙，提倡神灵崇拜等等。此外，阿闍梨教有自己的手抄经藏三千余册，集唐、宋、元、明四代乃成。

阿闍梨教传来云南之始，为了适应云南多民族、多民俗的社会特点，迎合南诏王的需要，既保持了自身的一些祭祀仪规，又和白族、彝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原始宗教相融合，并吸取了他们的神祇、礼仪、巫术等。在大理密教的神殿中，密教的神灵与巫教的鬼主并列，甚至印度教的大黑天、大自在天也掺杂其间。另外，阿闍梨教还吸收儒家思想，设坛讲授儒学。南诏国王室对阿闍梨教尊崇备至，在 22 位国王中，有 7 位为僧，全国的官员都从阿闍梨教徒中遴选。在民间，阿闍梨教徒还多次举行了起义，反对异族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统治云南后，曾一度禁令不得尊崇，但终因深入民间，无法执行。清以后，西藏密教传入大理，阿闍梨教才逐渐衰竭，但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势力。

48. 家家有僧人，村村有佛寺——云南上座部佛教概说

我国云南省西南边陲居住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是南传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从现在所见的资料来看，约 6、7 世纪时缅甸佛教就传入这一地区。以后由于缅、泰两国发生战争，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渐渐衰微。12 世纪泰国佛教经缅甸传入西双版纳，以后缅甸佛教再次传入景洪等地，形成了今天的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格局。

云南上座部佛教主要有 4 个大的派别。“润派”流传在西双版纳和德宏、临沧等地。因泰国东北部清迈地区的泰人被称为“泰润”，故其传入的教派因此而得名。据说该派曾直接受自于斯里兰卡大寺派长老，因此对戒律执行较严。后来僧团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了持传统主张的莲花塘派和持改革主张的花园寺派二大派。

“摆庄派”又名“寺院派”。属于缅甸佛教派别。传入时间较早，僧侣持戒较宽，主要分布在德宏和保山地区。它和润派为云南座部佛教的主体，信徒最多。

“多列派”也为缅甸佛教派系。此派保存了较多的原始佛教特点，对戒律的执行严格，僧人不到时间不得吃饭，不得亲手接受信徒的布施，不与在家的俗人同桌用餐等等。

“左抵派”也是传自于缅甸的派系。教徒持戒极严，不能抽烟喝酒，不能从事铁器生产和贸易活动，除养一只报晓公鸡外，饲养其他牲畜都被看作杀生犯戒。

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分为四个等级。州总佛寺是级别最高的寺院，负责协调佛事活动，颁布有关宗教法规，形式上批准僧人的晋升，以及为新述职的官员和级别较高的土司举行宗教仪式活动。各州的总佛寺是二级寺院，负责州内的宗教活动。同一地区的四个或更多的村寨佛寺组成的若干个中心戒坛是三级寺院，负责每月定期的佛事活动和监督检查比丘持戒情况，批准考核沙弥晋升比丘等事。各村寨的佛寺是级别最低的寺院，负责村民日常

礼诵佛经活动和对年轻人进行佛教教育、文化培训等职。僧人的僧职分为八级，最低的是帕（沙弥），最高的是松迪阿迦摩尼（大僧正长老）。一般地说，第五级袪巴以上的僧人地位较高，对佛教有精深的理解，挑选僧人要经过严格的手续。

上座部佛教对当地的社会影响很深。其特点是全民信仰，男孩一般 10 岁左右就要到寺院学经，出家过一段寺庙生活。20 岁以前大多数人都还俗回家。每个村寨至少有一个佛寺，佛寺成为全村人聚会、文化教育的中心。云南上座部佛教还有自己的经典，用傣文写成，刻写在贝叶或枸皮纸上面。重要的佛教节日有：浴佛节，又名泼水节、入雨安居、供养经书节、出雨安居、豪干节等等。云南上座部佛教是中国佛教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它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三大语系佛教存在的国家。

49· 经、律、论——佛教经典分类

按中外佛教史一般说法，经藏（素怛缆藏），唯佛所说；律藏（毗奈耶藏），唯佛所制；论藏（阿毗达摩藏），罗汉、菩萨所造。前二藏出现较早，论藏略晚于经、律藏。合三者，简称三藏，是概括佛教所有典籍的总集。藏，原意是盛东西的竹筐，后为藏书的意思。根据佛教理论不同，又分野为大、小乘三藏。而通晓总集的大德，称为“三藏法师”，学衔，品位最高，如玄奘被称为“唐三藏”。

在我国，三藏俗称为佛经，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文三个系统，前二者（包括蒙文、满文等佛经）均属北传佛教的，后者（包括傣文等佛经）均属南传佛教的。

据说汉文佛经（即大藏经）总数为两万多卷，其中真正属释迦牟尼版权的，是极少的一部分，即现存的佛经中形成最早的一部分经典——《阿含经》。更多的是后人的作品。佛经中还包括律藏，硕学高僧论释教义的各种专论，以及种种佛史等。因此佛经的作者（包括译师）决非释迦牟尼一人。

这样看来，三藏是由释迦牟尼先启始的，众多僧侣先后结集编撰的佛教全书。

佛陀在世时，注重口诵“说法”，并无文字记载。去世后，弟子们举行集会，对其说法内容进行会诵、鉴别，最后用文字确定下来，这一过程，史称“结集”。据说最早期结集有四次，先后结集的产物，即是佛教三藏形成的过程。第一次结集在佛陀逝世的当年，有迦叶、阿难等五百比丘参加。会后，确定了由弟子优婆离分 80 次诵出的戒律为佛陀为律藏，由另一位弟子阿难诵出的诸经为佛陀的经藏，并形成最初的佛经。阿难诵出的经藏就是现存的《阿含经》，是早期佛教最基本经典，它是佛陀创立佛教说法内容的语录式汇编。优婆离诵出的律藏称为《八十诵律》，是佛陀为规范佛教徒种种行为而制定的大法，也称戒律。第二次结集在佛陀去世后一、二百年间，有耶舍为首的七百比丘参加，目的是想消除有关戒律方面的细微争论，但事与愿违，并酿成了公开分派的状态，即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后又分为 18 或 20 个派别。这也是印度佛教历史上的部派佛教时期。有关分裂原因，南北传佛教说法不一，南传认为是戒律不同引起的，北传认为是教理有分歧。其实这两者兼而有之，但更重要的是宗教理论分析上的歧异。因此，这次集会，经、律藏大大扩展，如《八十诵律》广衍成《四分律》、《十诵律》、《摩

诃僧祇律》等等。第三次结集是在印度阿育王时代，佛弟子们因当时形势之需，撰写了大量解释经藏的专著，补足了三藏中的论藏部分，从此三藏经典完备。第四次结集是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代。会上重新整理三藏，并以文字记录成册。自此，佛教三藏在印度本土形成了。

尔后，印度佛教及其经籍向外传播。公元前3世纪传入斯里兰卡，逐渐形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公元1世纪之后，大乘三藏逐渐确立，并经中亚传入我国，后由我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形成汉文三藏。7世纪后，由中国内地或经尼泊尔传入我国西藏，形成藏文三藏。之后，佛教发展成世界性宗教。其后世著述数量浩如烟海，并成为三藏中的有机部分。

50. 古代印刷术的先驱——从木刻《金刚经》谈起

《金刚经》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意思是，用金刚比喻智慧有能断世间一切烦恼的能力。现流通的汉译本是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一卷。经文主要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无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著或留恋。这无疑是一种出世思想。此外，还有四本主要的异译本：北魏菩提流支和南朝陈真谛的同名译本、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若经》第九会）、唐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金刚经》是大乘空宗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在大乘佛教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我国南禅宗发展有一定影响，禅宗将其奉为根本经典之一。

隋唐时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成熟期，各种佛经的手抄译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雕版印刷术，在我国印章和拓石基础上，应运而生。唐代最早刻印的原本，包括佛经、佛像等，多已散失，仅存的一部最有价值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咸通九年（868年）刊本，这是目前世界上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印刷物。卷首有释迦牟尼说法图，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它是一件刻版技术相当成熟的作品，也是一件绝世的珍贵文物。原藏敦煌千佛洞，后被英国人斯坦因劫去，现存英国伦敦大不列颠皇家博物馆。

木刻本《金刚经》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历史上记载的唐朝佛教盛行的情况，而且还表明了我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首创的雕版印刷术，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对世界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佛教的本身。

51. 宇宙是不可分的——《华严经》的宇宙观

由于想象力宏富，曾被蔡元培先生说成是神话小说的《华严经》，是一部佛经总集。也是我国佛教华严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同时，《华严经》还是大乘有宗的重要经典之一，在大乘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主要有两种汉译本。一种是东晋义熙末年佛驮跋陀罗所译的34品、60卷本，被称为“六十华严”；另一本是在武则天主持下，由实叉难陀主译的39品、80卷本，亦称“八十华严”。此外，还有30余种单品经的异译本。

《华严经》的内容相当复杂。作者描绘的天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称为

“华严藏庄严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上下 20 重世界，其外面又有 10 个 20 重世界环绕，形成漫无边际的“华严藏庄严世界海”。这一天国的构想，的确具有现代天体物理中的宏观意义。现代科学知识已经发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和太阳系之外，整个宇宙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系，整个宇宙是广袤无限，漫无边际的，这不正与“华严藏庄严世界海”的构想有相近的地方吗？宇宙是无限不可分的理论是现代科学家通过卫星和乘坐宇宙飞船调查后而得出的，可是早在千余年前，佛教徒通过想象而看出了这一现象，表明了佛教思想的博大精深，《华严经》正是这一博大精深体系的忠实记载。

但是，《华严经》是宗教经典，它所要阐述的是佛教的天国理论，为世俗的凡人勾画了一个美好无缺的理想世界。因此，在这一神秘的天国里，住着毗卢舍那佛、“万刹尘数”诸佛，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正是作者构想的令人神往的天国，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话世界，因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十方成佛”、成佛十法阶次，即作“菩萨行”等一系列思想。

此外，《华严经》的作者还玩弄了否定事物存在，进而虚构出“法界缘起”论，将其看作是派生世界一切的本原。这便陷入了神（佛）的世界。还提出“三界所有，唯是一心”的思想。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包括人本身，都不过是人的主观意识，即心幻化的结果。

52. 中国佛教发展的完成——《坛经》出世的伟大意义

《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所依的根本经典。按照佛教的规定，“经”专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法。但是这部由中国僧人慧能所说的语录也被佛教徒尊奉为“经”，可见这部中国化经典的独尊地位。现存的《坛经》有多种版本，最早是敦煌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其弟子法海记录整理当时每次法会情况以及弟子传诵慧能的片言只语编辑而成的。一卷，不分品目，共五十七节。最流通的，为元代僧人宗宝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文字比法海本多一倍。内容为慧能在大梵寺说法等事迹，其中包括慧能平时与弟子们交谈，以及慧能临终遗嘱等等。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晚唐僧人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坛经》，三卷，十六门，现仅剩下、下卷，十一门。共五十七节，约一万四千余字，比法海本的字数约多十分之一左右。另一个是无名氏编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一卷，十品，两万多字。1944 年还出过以上四种本的合编本。以上四种版本相比较，还是法海本，即敦煌本较为真实、可靠。但最为流通的是宗宝本，原因是内容上后期禅宗的思想多一些，民主、平等的气氛更强一点，再加上文字比较通畅。从《坛经》字数不断增多这点，也反映了禅宗思想的发展。

《坛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在南宋绍兴（1131 - 1162 年）年间，和禅宗正式在日本弘传的年代基本相符，当时比较活跃的是首创日本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 年），他曾多次入宋留学，专攻中国禅宗义理。

《坛经》的主要思想，即六祖慧能的佛教主张。就是“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本有”、“见性成佛”，同时还进一步提出：识心见性，顿悟成佛。他还在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基础上，反对一切静坐观心的修习方法，认为“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他还进一步打比方说“自性常清净”，好像“日日常明”，况且日月有时还会被云

遮住，忽明忽暗，一时看不清楚，忽然惠风吹过，云消雾散，朗朗日月，又在中天，森罗万象，一目了然。这里慧能仍在说顿悟，不过他说的顿悟，不是指历尽苦炼后的恍然大悟，而是指参佛人们的每一闪念，都可能从自心中顿现佛性来。这一佛性学说和解脱理论是全新的，中国化的。其影响是显著的，它一改中国佛教遵循印度佛教的老面孔，开辟了活脱脱，不拘一格的新风尚，一本短短的《坛经》，超过了印度泊来的篇幅浩瀚的本本巨著，中国的佛教终于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53. 中西方佛教交流的首席译主——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的地位

自张骞首途西域，打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之后，继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影响，即佛教的影响。在东汉初以后的四百多年里，中西方僧侣频繁交往，译事盛行。众多的来华译师中，最著名的佛教翻译家、开创佛经“新译”、中西方佛教交流的首席译主，是印度后裔鸠摩罗什（344—413年）。

我们知道，东晋佛教大师道安过世以后，他的新安译场冷清了16年，也是鸠摩罗什来内地途中，被后凉吕光扣留凉州的16年。而取代道安译主地位和入主长安大寺译场的，却是一位出生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境内）的印度国相的后裔，被后世称为我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佛教理论家的鸠摩罗什。他的译经，对后代中国佛教发展影响极大，称之为“新译”。在中西方文化最初的建构和交流中，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此酿成了中国北方后秦王朝佛教的鼎盛时期，并已远远超越前代。

鸠摩罗什，简称罗什，意译童寿。天竺籍人，其父鸠摩罗炎，舍相位出家，东渡葱岭，来到龟兹，被龟兹王封为国师，并将妹妹与他为妻。罗什母亲耆婆也出家为尼。罗什七岁时出家，天资聪慧，能“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高僧传》卷二）。九岁随母游学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先从罽宾王弟学习佛教基础经典《阿含经》，得到赞许，受请入宫，予以奖掖。十二岁（355年）随母回龟兹，途经沙勒（今新疆喀什一带），住了一年。在沙勒国，始从罽宾僧佛陀耶舍（按：曾长期在长安当译经僧）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阿毗昙八犍度论》和该书的有关论释，以及小乘戒律《十诵律》。同时又参学了古印度文化典籍及“五明”诸论等。后又受业于大乘佛教学者须耶利苏摩，跟他学习大乘空论《阿耨达经》，得到启发，悟性大开，并摆脱了“三界实有”的小乘之说，认识到小乘的“实有”乃是“眼根”所障的结果。世界一切事物应是“无实”，自性是“空”的。从此专务《三论》等大乘论典，对罗什一生的思想影响极大。后与母亲一起游化龟兹西部的温宿国，曾经外道辩论获胜，“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高僧传》卷二）。20岁于龟兹王宫受俱足戒。此间又从罽宾沙门卑摩罗叉学习了《十诵律》。

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年）九月，后秦王苻坚遣将军吕光攻讨龟兹，获得罗什。当吕光回兵新安，途经凉州（今甘肃河西地区）时，得知苻坚已败于淝水之战，前秦覆灭。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原前秦将领姚萇在渭水建后秦。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吕光进入姑臧（今甘肃武威），自领凉州刺史，第二年又听说苻坚被害，于是在凉州立国，号称后凉。吕光两次拒绝

后秦放行罗什之请。后秦弘始三年（401年）五月，姚兴大败后凉，同年十二月二十日，鸠摩罗什终被后秦迎进长安，时年58岁。自385年罗什随吕光入凉州算起，至401年进入长安，前后在凉州留居了16年。这16年中，除应付后凉王室外，主要从事传教活动，还攻习儒家经典，为后期的译经奠定了基础。

后秦姚兴“少崇三宝（佛、法、僧）”，是一代儒雅帝王。罗什请来长安后，被安置在逍遥园西明阁（后又设长安大寺），并“待以园师之礼”，请他评经说法。还亲来听讲佛教，甚至参与译经，还经常向罗什请教，曾亲撰多部佛书。由于姚兴的提倡，这里便成为东晋时期北方佛教最隆盛的地区。因此后秦王朝以鸠摩罗什为首的僧团是极其庞大的，译经场面宏阔典雅，译经场的气氛也异常活跃。每次译经或每译一经，长安大寺就是一个中外盛大的传教场所，也是当时中西各国高僧、学者佛教学术交流的中心。比如，译《大品般若经》时，在场有五百人（据僧睿《大品经序》）；译《法华经》时，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见慧观《法华宗要序》）；译《维摩诘经》时，有义学沙门一千二百人（据僧肇《维摩诘经序》）。又据《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记载，当长安大寺译经时，西域各国义学沙门不远万里，渡涉流沙，云集长安。他们谈经说论、切磋义理、推敲新经，那情景真实感人。有时后秦王姚兴还亲自和罗什共同主持规模空前的译事，那译场气氛就更加活跃。因此罗什的长安译场是远超前代的。

鸠摩罗什在长安近12年（401—413年）译经、传教活动，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前后共译佛经35部294卷（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几乎囊括了当时流通的佛教三藏。

413年，鸠摩罗什译主圆寂于长安大寺，时年70岁。其一生弟子很多，号称三千人。他们都是“学贯内外”的僧人，其中影响较大，有姓氏可考者，也有30余人。入室弟子8人，史称“八俊”，他们是：道融、僧睿（叡）、道生、僧肇、昙影、僧晫（或作僧略）、慧严、慧观。而僧睿为首领。“八俊”前四位，也称“关中四圣”，地位最高。著名门徒还有道恒、道标、僧迁、僧邈、慧斌，慧仪、僧嵩、慧睿、昙无成、僧导、慧恭、宝度、慧精、法钦、道流、道恢、道棕等人。

54. 首创中国佛教宗派的第一僧——外来佛教在中国扎根结果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佛教学派“南义北禅”的异趣。寺院经济的无限膨胀，给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丰富的译经活动和人们对佛教教义的钻研及理解，促进了中国佛教理论的建立。

于是，作为统一的宗教形式的天台宗应运而生。而开创中国佛教宗派第一宗——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就是陈、隋时期的僧人智顛（538—597年）。

中国佛教史称“天台大师”的智顛，俗姓陈，字德安，原籍颖川（河南许昌）人，北方士族世家。后东晋迁都，随家南移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父亲陈起祖，为梁元帝帐下的军事高参，后封益阳公。母亲徐氏，信佛斋戒。智顛生于华容，双亲亡故后，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门下，受沙弥戒。再北上从慧旷律师受学，熟悉律学和各大乘经典，随后驻大贤山隐居，潜诵《法华经》。二十岁受具足戒，已成经律研学。二十三岁不顾陈齐战火，赴大苏

山，从慧思受学，并悟得师祖慧文禅师独悟的“一心三观”，自此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陈光大元年（567年），赶赴建康，宣讲《法华经》，又传授禅法。他的“定慧双开”的禅法，对南方信佛，既有新鲜感，又有吸引力，并博得了上自帝王、下至僧徒的敬服。陈太建七年（575年），智顛入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附近）建草庵，静修近十年。陈代公子王孙多次赐给大量钱物。后应陈后主诏请，回到建康，并为太子授菩萨戒，成为王室的菩萨戒师。此外，还常宣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论》、《法华经》。陈亡后，游化荆、湘两州，又往庐山讲经说法。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应晋王杨广之请，赴扬州为其授菩萨戒，又为取“总持”法名，成为总持菩萨。杨广则称其为“智者大师”。开皇十五年，受杨广之请，又赴扬州，并撰《净名经疏》。第二年春天，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天台山，修整僧舍，行禅宏道。因病休养在山寺。开皇十七年（575年）冬季，应杨广之请，再度出山，行至天台山西门石城，因病逝世，时年六十岁。

智顛一生，著作甚丰，约有140多卷。其中《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尤其是《摩诃止观》均为天台宗所依经论。他以《法华经》为中心，提倡义禅和判教新说，加上拥有陈隋王室所提供的丰厚的寺院经济，创宗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他在天台山创立以山名命名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又因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之一，所以又称法华宗。

智顛生前造大寺36座，度僧14000多人，入室弟子32人，其中著名的有灌顶、智越等。智顛圆寂后第二年，杨广承其遗愿在天台山南山脚下为之立寺，名天台山寺。大业元年，隋炀帝赐名国清寺。此寺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被誉为天台山祖庭，是中外驰名的寺院之一。

天台宗的创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对后世的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9世纪后，天台宗远播到日本和朝鲜等地，现在仍为各国的僧人所宗。

55. 《西游记》中的唐僧——一代大师玄奘

慈恩宗（一称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是继天台宗之后而建立的，其宗主是我国民间早已熟知的《西游记》中的唐僧，但在书中被神化了。唐僧俗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公元602年生于缑氏陈堡沟，此地处于嵩山少林寺西北。陈氏家族世代为宦。他的父亲一度为官，后还故邑，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对孩子影响极大。在兄弟四人中，玄奘排行最幼。少年早慧，聪悟不群。当时，皈依佛教已成时尚，他的二哥陈素，先已出家，法号长捷，善内外之学，誉为“释门栋干”。玄奘颇受影响。11岁就能背诵《维摩经》、《法华经》，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在洛阳出家。出家后，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从洛阳出发，跋涉陕、蜀、荆州（湖北）、相州（河南安阳）、赵州（河北）、长安等地。先后访寻佛学名宿十三位，游学长达十四、五年之久。其间，在成都时间最长。21岁他在成都受具足戒，获得正式僧人资格。贞观元年（627年），回到了久别的长安，这时他已精通了京师各家之说，但常有困惑，对中土师说不一，验之佛典，又欠完备，甚至各类佛典也不尽相同，实在无所适从。特别对当时盛行的摄论与地论两派关于佛性的不同说法感到不解。25岁时，他从中印度访问学者那里，了解

到了印度那烂陀寺讲经盛况，以及佛典的完备。由此他决定去印度取经。

贞观初年，玄奘曾向朝廷申请西行求法，未允，他就先学习西域诸国语言，等待西行机会。公元629年，长安饥荒，他借机西行，踏上了忽而“热风似火”、忽而“寒风如刀”人迹罕至的万里流沙，开始了他漫长而卓绝的西行求法之路。他从长安出发，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走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荒沙、草地、冰山等艰险，通过数十个国家，终于进入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印以后，边参学边朝圣，又辗转数十国，于贞观七年（633年）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从戒贤主持学《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中论》、《因明论》等经论，着重钻研《瑜伽师地论》，兼修梵书《声明记论》。不久，他的佛学水平仅次于戒贤。他还游学印度各地，向知名高僧受学请教。回到那烂陀寺，应戒贤主持之嘱，开始宣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适逢著名大乘空宗学者师子光也来到那烂陀寺讲学，用三论空宗思想反对大乘有宗的法相唯识学。玄奘用梵文写了三千颂的《会宗论》、批驳师子光对空、有思想的割裂，受到戒贤法师的高度赞赏。后又奉戒贤之命，独自与小乘论师辩论获得胜利。一位“顺世外道”前来挑战，被玄奘几个回合就挫败了。中印度的羯若鞠闍国国王戒日王专门为他在国都典女城先后举行了全印佛教学术辩论大会和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玄奘被众人推为论主，做主讲人。到会者有：五印度十几个国家的国主及僧俗几十万人，据说那烂陀寺也派来一千多名僧侣参会。会上，玄奘荣获了“大乘天”、“解脱天”等美誉，声誉五印。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满载着名震五印度的荣誉和友谊，携带大批经、像等学成回国。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到达长安。

玄奘东归后，在洛阳受到唐太宗的召见，之后回到长安，被安置在弘福寺，后移居大慈恩寺，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

从贞观十九年始，近二十年间，他先后译出大小乘论75部、1331卷。其中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称赞净土经》、《瑜伽师地论》、《大毗婆沙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玄奘一生，求法译经外，并无其他著述，仅撰一部《大唐西域记》传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当今世界学术界所推崇，现已译成多种文字远传世界。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主要体现在译经时对弟子窥基等人的随时讲说之中。因此僧传上说，“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窥）基乃守文述作之宗”，这就说清了玄奘和窥基师徒创立唯识宗的关系。

玄奘的译事，以直译为主而配合意译，所译佛经相当准确，而且文采斐然。继罗什之后，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

公元664年的正月初一，玄奘刚刚完成了一部六百卷的巨著《大般若经》之后，又开始了另一部大作《大宝积经》的翻译，刚译几行，心脏病复发，只好停笔。到二月初五午夜，这位从不肯向困难低头，终生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玄奘大师圆寂于长安玉华寺。时年63岁。按照佛教规定，举行火化，其遗顶骨则被分供在南京、北京、天津、成都、广州的佛寺里。

玄奘门下有中外弟子数千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窥基，有“玄门四神足”之称。最受玄奘推重的是才华横溢的窥基。玄奘门下的新罗沙门有神昉、圆测、顺景、道证、太贤、道化等；日本沙门有道昭、道严、智通、智达等。可见法相唯识宗在唐代已经远播朝鲜、日本。

玄奘一生为发展佛教和致力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受到了后人的敬仰。他的译经因卷数庞大，质量好，被人们尊为“四大翻译家”之一。他不畏艰难，西行求法，真诚、执著、谦虚、质朴的人格，感染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鲁迅曾把他称为“中国的脊梁”，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56. 华严座主、五帝门师——法藏其人其事

唐代，京城长安人才济济，大德云集，除玄奘、圆测、神秀、窥基，义净之外，还有一位当时城内佛教界名望特高的巨擘，著名的佛教理论家，擅于结纳武则天的康居国侨民后裔，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就是“贤首大师”法藏（643—712年）。

法藏，祖籍西域康居，以国为姓，名贤首。他的先祖曾为康居国相，后来祖父迁来长安，成为居住中国的侨民。父亲康谧，曾在唐太宗时任左侍中官职。法藏生于长安，精通两种文化。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里。16岁曾炼（断）一指于歧州法门寺舍利塔前，这是一种虔诚信徒舍身奉佛的宗教行为。17岁游化太白山求法，广涉各种佛教大乘经典，后回京从云华寺智俨法师学参《华严经》多年，颇受智俨赏识，一直没有披度机会。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28岁的他奉敕于太原寺出家，受沙弥戒，后奉诏在太原寺和云华寺宣讲《华严经》，声誉日显，受到武则天崇信。据说他为武则天上台编造了种种“佛意”，为报答武则天的各种慰问和礼敬，法藏为武则天当女皇效了犬马之劳。唐高宗上元元年，在武氏精心安排下，命京师十大德为法藏受具足戒，随即称“贤首国师”。后武则天年老多病，他又巧妙地投在唐中宗门下，受到很高的待遇，时有嘉奖。中宗、睿宗也请法藏为菩萨戒师，中宗特赐号“国一”。他历经五位皇帝，故又有“五帝门师”之称。此外，由于他有梵汉语的根基，加上年轻时的努力，使他成为唐代重要的翻译家之一。据说早年参加过玄奘译事，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解不同而退出译场。又参与由西域僧实叉难陀为主译的《华严经》八十卷新译本的翻译工作，担任笔受。新译本世称“八十华严”或唐译本，补足了晋译“六十华严”的缺陷。法藏将两个译本与梵本作了认真对勘，把地婆诃罗（中印度沙门）补上的两段脱文又重新补上。经法藏整理过的《华严经》，文从字顺，遂为善本，流通至今。还参加了义净、菩提流支等人的译事。他一生宣扬华严教义，讲《华严经》三十多遍，著作甚丰，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共100多卷，其中仅有关《华严经》的论著近20种，为创立华严宗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从“判教”入手，立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门等来阐扬法界缘起理论，建立起“周遍含容”、“圆融无碍”、“自在圆极”的华严宗。公元712年，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终年70岁。皇帝特敕“鸿胪卿”、“典属国”位。其葬仪十分隆重，可见他死后的殊荣。

法藏的主要弟子有文超、智光、宗一、慧苑、后有澄观、宗密最为知名。

法藏的“圆融无碍”、“自在圆极”等思想，其实质在于消融世间一切差别、对立，对后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外，公元661年，法藏和他的新罗同学义湘，交往甚好，共同研讨《华严经》多年。义湘回国，驻太白山浮石寺，弘扬华严，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公元692年，法藏趁其弟子、新罗僧胜诠回国之便，送给义湘自己著的华严专著《华严经探玄记》、《一乘教分记》等，受到义湘的高度评价，宣称“博

我者藏公”。成为中朝古德间弘扬《华严经》的佳话。法藏的弟子，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弘扬华严，成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57. 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是怎样创立禅宗的

慧能，一作惠能，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其父为朝廷命官，唐武德年间被贬，流放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贞观十二年慧能生于新州，三岁丧父，家境式微，后随母移住南海（今广州境内）。稍长，常年靠卖柴养母度日。有一次卖柴，送柴到客店，忽听一客人正在诵读《金刚经》。据说他有悟经神契，“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他从客人处得知，弘忍禅师传法驻地，遂往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东山寺，参谒弘忍，弘忍见他出语惊人，非常器重，知是传法奇才，先安排在磨房以行者的身份干杂活，以避人耳目，等待日后重用。

慧能来此不久，适逢弘忍选嗣法子。大师遂告寺内僧众：“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寺内七百多僧众都认为，这位法子，非教授师、上座神秀莫属。于是神秀写下一首偈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师父看过，虽加赞赏，但不传衣法，神秀也不敢枉自问师。第二天早课，僧众走过回廊，突然发现廊壁上又多了一首偈句，赶紧转告师父，师父又来观看，偈句是这样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师父看过，暗暗称喜，可嘴上却说：“此是谁作？亦未见性。”慧能立刻回答师问，说是童子代他所写。弘忍也看出了众僧徒折服而惊愕的样子，怕人加害慧能，假意嗔怒地命门人把慧能的偈句擦掉，只留下神秀的一首。第二天一早，弘忍乘僧众早课之机，来到磨房，见慧能正忙着舂米，便劈头问道，米舂好没有？慧能回答，谷早已去皮，还未筛过。意思是说，对佛法虽已彻悟，只少传衣法手续。弘忍用手杖敲了三下石臼，然后离去。慧能会意，便于夜里三更时来到师父房内，弘忍终于向他传授了衣法。慧能旋而南下，先至韶州曹溪，后多次被人追逐，混迹岭南市井长达十五年之久，北来追寻禅宗法衣之事也渐渐被人淡忘了。仪凤元年（676年），一说武则天垂拱（685—688年）年间，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偶遇印宗法师讲《涅槃经》，这时有风吹幡动，两个僧人正为此争论，一个说风吹的，一个说幡自己动的。慧能上前劝说，既不是风吹的，也不是幡自动的，实在是两位仁兄的心动。印宗闻此，欢喜合掌，自愧不如，又知其六祖身份，愿事为师。于是为行者装束的慧能落发，又请智光律师授满分戒，这时慧能39岁，才算正式出家。第二年，回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据说有徒众十万，可谓名声大作，誉满岭南。正当慧能弘传禅法之际，同门神秀在北方传渐修法门，亦成一大势力。久视年间（700年），神秀奉武则天诏请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此时，慧能的顿悟禅早已传闻京城上下，也吸引了北方众多僧徒的关注，武则天、唐中宗曾先后诏请进京宣法，慧能均托病力辞。尽管如此，朝廷对慧能仍采取了拉拢手段，唐中宗专门赐磨衲袈裟一领及绢等物，并敕修慧能住过的宝林寺，赐额为法泉寺，又敕新州的慧能故居建国恩寺。门人法海记录整理当时每次法会情况以及弟子传诵慧能的片言只语编辑成《坛经》。公元712年，慧能曾回新州，命门人在国恩寺建塔，次年夏末落成。713年8月，慧能在新州国恩寺圆寂，

其遗体即被弟子迎回曹溪。时年 76 岁。慧能死后，唐宪宗时被迫谥为“大鉴禅师”，世称禅宗六祖。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均为其撰写碑铭。

58. 宗教改革大师——宗喀巴对藏传佛教的贡献

藏传佛教格鲁派是公元 1409 年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在拉萨成立的一个佛教宗派。“格鲁”意善规，或善律；而“格鲁派”意为严守戒律派，又此派僧帽皆黄色，又俗称黄帽派，或称黄教。

格鲁派的创始人是 15 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1357——1419 年）。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生于青海湟中，藏语称湟中一带为“宗喀”，故尊称他为宗喀巴。还有称他为杰仁波且。意为宝贝佛爷。出身显贵。三岁从乳母多吉活佛受近事戒，七岁在甲琼寺出家，从顿珠仁钦受沙弥戒，随顿珠修习显教密法 9 年。16 岁前往西藏深造，先后在前后藏各地拜师求法，在喀当、萨迦诸大师指导下，研习五论、五明，先显后密，显密兼通，造诣颇深。29 岁在南杰拉康寺，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34 岁能宣讲十七部经，大乘显教各派经论均能通达了知，因此名声日隆。讲经之余，研讨显经疑义，遇机亲验密法。37 岁时进行宗教改革。鉴于当时僧人生活放荡、佛教戒行弛废，遂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倡导一切僧人必须严守戒律入手；同时结合自己见解，先后写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书，为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两论主要阐明显密两宗修行次第，提倡不分显密都必须恪守戒律，要形成一代宗风；要创立讲经法会、整肃佛门戒律。明永乐七年（1409 年）在帕竹地方政权资助下，他在拉萨大昭寺创办了大祈愿法会。影响极大，与会僧人一万多，俗众多达数万。扩大了守戒的声威，提高了宗喀巴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的地位。法会以后，宗喀巴派弟子贾曹杰·达玛仁钦修建甘丹寺，该寺落成，标志着格鲁派体系的形成。公元 1416 年，他的另一个弟子绛央却杰建造哲蚌寺。1418 年，他的又一个弟子释迦也失修建色拉寺。上述三寺，合称黄教三大寺。宗喀巴的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1419 年圆寂于甘丹寺，终年 63 岁。弟子们将其遗体建塔供养。塑像置于佛殿内加以叩拜。其后，他的法嗣在蒙古和硕特部及清朝支持下，格鲁派逐渐成为前后藏执政的教派。

59. 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与文殊菩萨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五台山属太行山一个支脉，分布在山西省东北五台、繁峙二县境内，以五台县东北约 60 公里的台怀为中心，方圆五百里，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的峰顶平坦宽阔，形似垒土之台，所以称作五台山。五台的山顶又各有一峰名和寺院：东台有望海峰望海寺，西台有桂月峰法雷寺，中台有翠岩峰演教寺，南台有锦绣峰普济寺，北台有叶斗峰灵隐寺。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称台内。因山中盛夏气候凉爽宜人，五台山又名“清凉山”。

五台山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料记载，东汉永平年间（58—75 年）已有寺庙。相传台怀镇西侧山峰与古印度灵鹫山相似，故将山中第一座寺庙改名大孚灵鹫寺，即今天的显通寺。北魏时建有大孚寺、清凉寺和佛光寺。北齐时山区扩建寺院二百多所。隋文帝时，又下诏令五个台顶各建

一寺，并遣使在山顶设斋立碑。唐朝时期寺院极盛。敦煌莫高窟中现存的“五台山图”就是五代时山区寺院情况的历史写照。此后，宋、元、明和清初，各代皇帝均曾敕令修建寺院。清代嘉庆（1796—1820年）中叶以后，方逐渐衰颓。

大约从明代起，中国佛教就开始有了“四大名山”的说法。在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位于首位。按照佛教的说法，五台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山，是文殊菩萨曾在此居住。文殊是佛教的菩萨之一，佛经里曾说他是过去、未来诸佛之师。据说文殊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身骑狮子，表示智慧、锐力和威猛，所以在佛教中，文殊是智慧的代表，通常将他立于释迦牟尼佛的左边，为“左肋侍”。事实上，这只是佛教中的神话而已，文殊菩萨其人和其事都是佛教徒根据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五台山成为佛教的名山，则主要是来自二个原因，一是五台山的自然景观富有特色，全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气候洁净凉爽，与佛经里所描写的文殊菩萨所住的雪山之处十分相似，因之给予附会。二是历代佛教徒和统治阶级的崇奉及支持有关。从北魏起，历代皇帝和国戚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特殊政策，建寺盖庙，优渥僧人，使五台山在佛教里的地位突出。同时，在五台山还居住了不少有名的高僧，著名的华严宗的领袖，如四祖澄观等人以此为华严道场，把文殊菩萨尊为“华严三圣”之一，使五台山的影响大增，如此种种原因，才使五台山名声远扬，成为名山之首。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有广泛的影响，日本、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僧人都前来巡礼朝拜。

60. 云海、佛光、圣灯——峨眉山的祥瑞

峨眉山在今天四川省峨眉市城西南七公里处，雄踞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著名的普贤菩萨应化的道场。因为其山势逶迤，“如螭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眉山。佛教上又称光明山。峨眉山的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峰峦起伏，重岩叠翠，气势磅礴，雄秀幽奇，素有“峨眉天下秀”的美誉。从山麓到顶峰的金顶50余公里，石径盘旋，直上云霄。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赞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明诗中也有“峨眉高，高插天，百二十里云烟连，盘空鸟道千百折，奇峰朵朵开青莲”之句。

据传峨眉山汉代就有佛寺。但据《峨眉山志》记载，峨眉山的佛寺又以东晋期间的高僧僧肇所建的黑水寺为最早。晋代建普贤寺，成为峨眉山寺奉普贤菩萨的开始。在晋代，西域的高僧阿罗婆罗尊者曾不远万里来到峨眉。到了唐代，唐僖宗时敕建永明华藏寺，重建中峰、中心、华严、万年、黑水、灵岩六大寺。后来，黑水寺被称为峨眉山祖堂。唐宋后佛教兴起，到明清之际达到鼎盛，一时梵宇琳宫，遍及山峦，大小寺庙近百座，大多以供奉普贤为主。自清代以来，佛教渐至衰微，原有的寺庙不少遭到破坏。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建立，都与佛教崇拜的四大菩萨有关。峨眉山被看作普贤菩萨的道场。普贤也是一位印度的尊神，传说他是转轮圣王的第八太子，是诸佛之子。他的特点是以“愿”为长，也就是说向佛发出种种愿望，并加以实行。具体内容是“十愿”。在峨眉山流传着许多与普贤菩萨有关的传说或佛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山巅的金顶云海佛光和圣灯。云海是一种物质现象，是因水蒸汽在山区蒸发上升，缓缓地围绕在山峰周围，看上去云

浪翻腾，惊心动魄，气势壮观。佛教将此称为“兜率云”，视之祥瑞。“佛光”是彩虹，只是在太阳初升之时而出现，是一种水蒸汽与阳光发生反射作用后产生的物理现象。一般的彩虹多在雨后出现，而峨眉山的彩虹却在清晨出现。早上天一亮时，旭日冉冉升起，翻腾的云海上面现出了弧状的半圆彩虹，景色格外迷人。佛教徒认为，生出的彩虹是佛发出的光，能见到佛光即如见佛。“圣灯”是指在金顶脚下入夜时所见到浮动的亮光，多为一团，到处飘游。这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山脚的腐竹树叶的磷发出的磷光。佛教徒附会为圣火，同样视为不可多见的吉祥之物。今天云海、佛光、圣灯的现象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谜底正在破译，人们已不再把它看作佛教所拥有的专利，但是对它们仍然向往，一睹为快。云海、佛光、圣灯已成为建设峨眉山，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资源之一。

61. 地藏菩萨的道场——九华山

九华山在今天安徽省青阳县西南 20 公里处，面积达 100 余平方公里，周围有 99 座山峰，又以天台、莲华、天柱、十王等九峰最为雄伟，主峰十王峰海拔 1342 米。九华山旧名九子山，因唐代大诗人李白留有“若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绣出九芙蓉”的游山诗句，从此遂更名为九华山，与五台、峨眉、普陀合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九华山佛教发端于晋代隆安年间。到唐代开元年间，佛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地藏王菩萨金乔觉渡海来到这里，见此山明水秀，便开辟道场，传戒于山中化城寺。唐贞元十年（794 年）七月金乔觉以 99 岁高龄圆寂，容颜仍鲜润如生，众信徒因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称他为金地藏，建塔纪念。此后每年农历七月底前后，吸引来此朝拜的各地信徒络绎不绝。明朝万历皇帝又赐给塔名“护国肉身宝塔”，以后又建殿宇拱护。殿内有七级木质宝塔，每层有佛龛八座，供奉地藏菩萨金色坐像，塔两侧有十王立像护侍。宋、元、明、清几代均曾大规模建筑寺庙，鼎盛时期，佛寺多达 300 多座，僧众 4000 多人。山中香烟缭绕，经年不绝，所以九华山又享有“佛国仙城”的称号。

九华山以化城寺为中心，现有大小寺院 80 余所，其中著名的还有东岩寺、甘露寺、百岁宫、祇园寺等，此四所寺院又号称九华四大丛林。化城寺位于九华山中心山谷。唐代至德二年（757 年）由青阳人诸葛节等创建，后迎请金地藏来此居住；唐建中二年（781 年）正式辟为地藏道场。皇帝曾赐额“化城寺”，后世历朝屡受修缮。今天寺内仍藏有明代皇帝谕旨、藏经等珍贵文物。该寺四周青山环绕如城，一向以风景清幽著称。东岩寺位于九华山化城寺东 1.5 公里处的东崖。明代万历年间由相传为金地藏的晏坐堂进而扩建而成，1933 年毁于大火，现仅存地藏洞、钟亭等。地藏洞在寺东，因祭祀地藏而闻名。亭分二层，六角翘天，内中悬有“幽冥钟”，声音浑厚绵长，响播全山。另有一巨石突出，形状如同苍龙昂首，巨石上有晏坐岩，传为金地藏的晏坐处。山中名刹古迹、奇景美地甚多，在今日，九华山正以它幽美的自然风光及独特的佛教文化色彩为海内外游人所瞩目。

62. 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

普陀山在今天浙江省普陀县，是东海中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为我国佛

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观音菩萨应化的道场。整个岛呈狭长形，南北长 8.6 公里，东西宽 3.5 公里，面积 12.76 平方公里。最高峰佛顶山，海拔 291.3 米，其东南面为著名洛迦山，两山合称作“普陀洛迦山”。普陀山的名称最早源自一段佛教传说，相传唐朝大中年间有一印度僧人来此岛上，亲眼目睹到观音菩萨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故称此地为观音显圣地。佛经中本有观音住南印度普陀洛伽山之说，遂以此命名为普陀山。

唐朝以前传说岛上曾有梅福等人隐居修道。五代时期后梁贞明二年（996 年），日本僧人慧锷自五台山迎请观音像归国，途经普陀山，为大风所阻，无法启航，遂结茅留居，建“不肯去观音院”。自北宋以来，寺院渐增，僧众云集，岛上佛教鼎盛。南宋绍兴九年（1131 年），全山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嘉定七年（1214 年），又规定该山以供奉观音为主，由此，普陀山以“南海观音”、“南天竺”等美名闻名海内外。以后历朝相继兴建寺院，最盛时有寺院、庵堂等 218 座，僧尼 2000 余人。古代来往日本朝鲜等国的旅人，又常停此候风，拜观音，祈求航途平安。

普陀山现存紫竹林、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南天门、西天门、盘陀庵、洛迦山观音庵等 10 余座寺庙，其中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规模宏大，建筑考究，堪称我国清初建筑群的典范。普济寺在普陀山白华顶南，灵鹫峰下。初建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称宝陀观音寺。清康熙皇帝赐寺额“普济群灵”，故名普济寺。寺院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为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法雨寺位于白华顶左、光熙峰下。创建于明万历八年（1580 年），因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兴修大殿时赐“天花法雨”匾额而得名。慧济寺位于佛顶山上，由明初僧人慧圆结茅山顶，最早创寺。

普陀山岛上风光绮丽，多平岗幽洞，崇岩曲涧，梵楼庙宇点缀其间，错落有致，与周围景物和谐一体。

63. 中国佛教第一寺——洛阳白马寺

位于今天河南省洛阳市东 10 公里处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历史地位显赫，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有“中国第一古刹”的美誉。

据传东汉永平七年（64 年），明帝曾“夜梦金人”，又听说西方有异神，便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据《高僧传》等记载，水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挟带佛教、佛像回到洛阳。最初他们住在鸿胪寺，后因鸿胪寺不是久居之地，故于次年明帝诏令在雍门外建另一处住所。因为同来的僧人是西方所来的客人，当以贵宾的礼节对待，使命名该住所为寺。

关于“白马”一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据《高僧传》记载，有一外国的国王曾经下令毁坏各地的寺院，只有招提寺还没来得及破坏，这时有人夜里看见有一匹白马绕着寺塔悲鸣。这件事使国王深受启示，立即下令停止破坏，并把招提寺改作白马寺。另一种说法是：据《洛阳伽蓝记》所记载，汉明帝派使者去西方求佛法，回来时用白马驮载着佛经，于是就以“白马”命为寺名。

白马寺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成为东汉时最重要的翻译佛经的译馆。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这里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

汉译佛典，同时译的《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经今已失传。西晋时，先后有竺护法、安法钦、法立、法炬等佛门巨子在寺内译经传法。唐代时的白马寺比魏晋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寺院规模宏伟，香火隆盛。武则天执政后，白马寺由其亲信薛怀义主持，因而成为宫廷的重要寺院。以后一千多年间，白马寺屡有兴衰。

今天的白马寺存有天王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等殿堂及古清凉台遗址，建筑、雕塑、碑刻等则大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殿内造像以大雄宝殿内所存的元代造像释迦牟尼、药师、阿弥陀三世佛、韦驮、韦力二天将以及十八罗汉等最为珍贵，其中十八罗汉的造像工艺是目前国内最精致的一例。寺山门内东西两侧有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的墓地，寺东南有座建于金代的齐云塔。

白马寺北依邙山，南望洛河，绿树红墙，梵殿宝塔，一派庄严肃穆、清幽绝俗的气象。白马寺历经千年，几多辉煌、几多沧桑，今天已是国内著名的佛教胜地和游览名胜。

64. 藏族宗教文化艺术的瑰宝——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座享有世界声誉的西藏著名的佛教建筑。它建筑在今天西藏首府拉萨市西北的红山上。“布达拉”，是梵语“普陀罗”的音译，意为“佛教胜地”。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当时的唐朝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开始修建布达拉宫。以后大部分宫殿毁于雷击和战火，只剩下“曲吉卓布”和“帕巴拉康”佛堂两处。公元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委托第巴·索朗绕登主持扩建布达拉宫，历时8年，建成白宫。五世达赖死后，又由总管第巴·桑结嘉措统一经营，集中全藏人力、物力，历经3年，建成红宫。经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多次扩建增建，布达拉宫才具有现在的规模。

布达拉宫系宫堡式建筑群，木石结构，依山叠砌，从山脚蜿蜒至山顶，共13层，高117米，东西长360米，周围占地10万多平方米。它殿宇重叠，巍峨耸峙，金碧辉煌，气势雄伟，充分体现了西藏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也是藏族人民智慧和劳动的伟大结晶。宫内保存有达赖喇嘛灵塔八座，明、清两代皇帝封赐西藏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玉册、匾额、工艺品、贝经叶和经文、医药、历史、文学等典籍，以及各类佛像、壁画、唐卡、法器、供器等大量珍贵文物，仅极乐宫内就供有大小无量寿佛一千余尊，是藏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布达拉宫既是原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也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

白宫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宫殿。由布达拉宫正门拾级而上，经过廊道，有一个离地面60多米，面积1600平方米的广场，这就是过去供达赖喇嘛进行喜庆娱乐活动的平台。平台东西两侧各有楼房，从平台走上宫殿，并列着三排木质扶梯。扶梯之上称德阳厦（堂），楼上东墙绘有松赞干布向唐请婚及文成公主进藏的图画；北墙绘有文成公主进藏故事以及到拉萨时受到隆重欢迎的宏大场面。北佛殿里供有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像，其上覆盖着金色屋顶，外观富丽堂皇。东佛殿正中供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坐像，坐像周围环绕着好几十尊小型的金佛。壁画中描绘的是唐代金城公主进藏的故事。旁边的一座经堂里则供奉着藏传佛教宁玛派祖师莲花生。

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供奉着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其中以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为最大，塔高达 14 米，耗用 3721 公斤的黄金和无数珍珠宝石建成。五世达赖喇嘛遗体为坐式，两侧安置着十一世与十二世达赖喇嘛遗体的小灵塔。西佛殿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享堂，也是红宫最大的玄殿，其中，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清朝顺治皇帝的壁画，处于最显要的部位。

此外还有现存的布达拉宫最古老的建筑——法王洞，洞内供着据传为松赞干布生前所造的他自己和文成公主、尼泊尔尺尊公主等人并列的塑像。

65. 半嗔半喜，哭笑不得——谈谈济公形象的意义

在中国佛教罗汉堂里，济公有其真实而独特的位置，他不是站在罗汉堂过道里，就是蹲在房梁上；面像塑造的也和其他罗汉不同，不是“哭笑不得”，就是“半嗔半喜”。特别有关他的神奇传说，历来为百姓所推崇。可以这样说，他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但又被神化为“降龙罗汉”转世的僧侣形象。他非常贴近日常生活，但又是世外之人；他既保持山林佛教超凡脱俗的特点，又要干预人间不平事。据说，他不守戒律，嗜酒食肉，特别是狗肉蘸大蒜。举止如痴如狂，被称作“济癫僧”。他的这个样子，既令人无限同情，又使人啼笑皆非。

就是这个南宋时期家喻户晓的“癫僧”，后世称为济公（1148—1209 年），原名李心远，台州（今浙江临海）人，出家后取法号道济。最初居杭州灵隐寺，后移住净慈寺。公元 1209 年圆寂，时年 62 岁。

透过济公层层的神化色彩，我们真实地感觉到一个富于强烈的正义感、诙谐幽默的性格的存在，他早已活化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其实他的这种出家又入世、佛与自然不二的处世态度，正是南禅宗“见性成佛”简便法门的进一步深化。只是把禅和日常生活结合得更紧密了。南禅宗一开始，由于实践的要求，对原有的义学和信仰已经出现了一种反抗趋势。这与慧能出身没落士大夫家庭，又不识字，热切要求平等的思想，不能说毫无关系。到了南宋，这种反抗趋势愈加猛烈。当时儒家的理学更加贴近禅学。理即是佛，佛即是理的思想，重新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理学家们已经不能满足顿悟思想，因为它不能踏实穷理。而这些思想当时直接影响着佛门中人。因此一个新的人格出现了。济公强调自力不能，便借助于神力；主张平等不可，只好劳驾法力。这就是一个神化了的“济公和尚”存在的真实原因。这种反佛教思潮，慧能在创立南禅宗时无法想到的。但对当时一般佛学沉湎于义解，或依赖他力，或脱离实际的思想，力求破除对佛的迷信，摆脱佛典教条的束缚，这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66. 北传佛教文化圈

公元 1 世纪左右，印度佛教自丝绸之路向北传入中国，复又从中国流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组成了以大乘佛教为中心的北传佛教文化圈，并对各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佛教最初传入朝鲜，是在朝鲜三国时期。公元 372 年，中国前秦苻坚派遣僧人顺道携佛像、经书到高句丽，是为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到了新罗王朝时期，中国隋唐时代所形成的佛教学派、宗派除极个别外，大

部分传入朝鲜，来华学习佛教的朝鲜僧人络绎不绝，最终出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佛教——“五教九山”。“五教”是涅槃宗、成律宗、圆融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指禅门九支，即迦智山、实相山、桐里山、闾崛山、凤林山、师子山、曦阳山、圣住山、须弥山。高丽王朝建立，朝廷崇拜佛教，又将“五教九山”改为“五教二宗”的形式，其中五教仍为原来的五个宗派，“二宗”是“禅门九山”和天台宗。禅宗内部出现了曹溪宗，成为朝鲜最大的一个佛教派别。李朝开创，统治者尊崇儒学，佛教衰落，形成了禅宗和教宗二派。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佛教虽一度影响了朝鲜的佛教，但朝鲜独立后，日本佛教退出，有影响的仍然是传统的民族佛教。

日本的佛教是在6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的中国大乘佛教。7世纪圣德太子笃信佛教，颁布诏书，佛事大兴。8世纪初，奈良古都已经有了“南都六宗”和“七大名寺”的说法。不久，又有了“平安二宗”和“入唐八家”的分类。到11世纪后，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出现，日本佛教的民族化、大众化益显，佛教在日本已经成熟起来。镰仓时代禅宗在日本进入鼎盛，看话禅和默照禅流行。以后中国明朝僧人隐元又传去了的黄蘗宗。禅宗在日本成为佛教界最有势力的派别之一，并且受到武士阶层的欢迎，对武士道的形成产生过影响。17世纪日本佛教受到了限制。到明治维新时，佛教屡屡受挫，进入困境。佛教界被迫做了一些改革，建立新教团，兴办文化事业，以图发展。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政府颁布《宗教法人令》，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佛教与现代社会进一步结合，净土真宗、日莲宗、真言宗、禅宗和新兴教团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都是影响较大的佛教派别，有一定的势力。

2世纪时，中国佛教就已传入越南，一些来华的印度僧人也是取道于越南再入汉地的。越南佛教的第一个派别是灭喜派，它是由中国到越南的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建立的，属于中国的禅宗派别。9世纪中国唐代僧人无言通在越南弘传南宗禅，创立了无言通禅派。不久另一名中国禅僧草堂在越南创立草堂禅派，并受到统治阶级的礼遇。陈仁宗奉祀佛教，建立了竹林禅派，这是越南佛教徒自己创立的佛教宗派之始，佛法大行。15世纪初，黎朝建立，奉儒学为国教，佛教日衰。200年后竹林派僧人白梅麟角吸收中国白莲教思想，建立莲社，融汇了禅宗和净土宗的思想。同时中国禅僧元绍在北越建元绍禅派，推行看话禅。越南僧人了观在越南创了观禅派。19世纪僧人段明媛、宝山奇香建新派，在农民中流传甚广。20世纪越南佛教徒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为争取独立解放，做出了贡献。

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当地的社会、宗教、文化起到了重要影响。这些国家的佛教，一方面紧扣中国佛教发展的潮流，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步伐相适应。例如宋以前佛教在中国鼎盛，各国的佛教也蓬勃发展。南宋儒学地位上升，佛教衰落，各国也尊儒贬佛。另一方面，佛教传入各国，不是简单地“移植”，而是经过各国佛教徒消化、吸收以后，再给予发展的，出现了民族化的宗派，并且撰写了一大批本民族的注疏，将本国的具体情况与外来的佛教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民族化的佛教。北朝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建立，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朝鲜、日本的佛教徒相继来中国求法取经，拜中国僧人为师。中国僧人到越南宣法，弘传佛教，使佛教在各国得以发展，密切了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一些僧人还对佛经注疏立论，阐发奥义，推动了佛学深入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发达。中国汉译佛经被各国僧侣竞相诵读，各国镌刻出版佛典，推动了整个文化向前发展，对汉文

化圈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宗教的交流，更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交流，也是一种双向的宗教文化交流。

67. 南传佛教文化圈

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向南渡海传到斯里兰卡。据说当时把佛教传去的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儿子摩晒陀。他在岛上受到兰卡王的礼待和供养，在首都创立了大寺，形成了大寺派僧团。这一派僧人属于上座部派，所习的经典是用巴利文撰述的，故又称南传土座部佛教或巴利佛教。

大约在公元前后，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开始发生分裂，以摩诃帝沙长老和印度僧人达摩流支为首的僧人搬到无畏山居住，成立了无畏山寺派。4世纪初又从无畏山派中分化出祇陀林寺派，此派宣传大乘佛教的中观派思想，至此斯里兰卡佛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5世纪时是斯里兰卡佛教的鼎盛时期，国内寺院林立，全国上下奉佛甚烈。印度僧人觉音大师在大寺创作了《清净道论》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南传佛教经典里最著名的一部论书。8世纪后，因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印度教的流行，斯里兰卡的佛教开始衰落。11世纪缅甸僧人应国王之邀前来岛国弘法，佛法复兴，到12世纪朝廷确定大寺派为佛教的中心。16世纪岛国又从暹罗引进佛教，于是斯里兰卡佛教最终演变成暹罗派和缅甸派二大派，信仰佛教的主要是僧伽罗族人，故又名僧伽罗佛教。

5世纪前缅甸已有佛教流传，当时是大小乘并举，以后密教也流行一时。11世纪蒲甘王朝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从斯里兰卡引入上座部佛教，从此缅甸成为上座部佛教国家。15世纪勃固王朝达磨悉提王遣僧到斯里兰卡授戒，在国内推行大寺派戒律，佛教僧团统一起来。19世纪，敏东王在旧都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的第五次结集会议，重新修订、校勘了巴利文三藏，并把它们镌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置于寺庙内保存。1954年又举行了亚洲七国佛教徒参加的第六次结集活动，推动了缅甸佛教复兴运动的发展，影响深远。

柬埔寨、泰国、老挝几国也属于上座部佛教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在11世纪以后接受了上座部佛教的信仰。柬埔寨的佛教称为“高棉佛教”，泰国佛教称为“暹罗佛教”，各国佛教内流行的是法宗派和大宗派二大基本派别，前者多在王室贵族中流传，后者多为下层百姓中信奉。这几个国家还拥有一整套与世俗政权并立的僧官制度，僧王是佛教界内最高的首领，由资历甚深，行解双优的长老中遴选担任。近年来，泰国的佛教表现尤为突出，佛教事业蓬勃发展，在世界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世界佛教徒组织——世界佛教联谊会总部就设在泰国。

佛教在南亚、东南亚各国已经流传了1000余年，成为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的主体，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全面影响。在南传佛教国家，盛行男子出家为僧的制度。每个男子一生中至少要到寺庙出一次家，而且只有出了家的人才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找工作、结婚等这些人生大事上取得便利。南传佛教在教义上注重解脱，在实践上注重禅定，论理的功能尤为发达，因此更多地保持了早期佛教的传统理论倾向，可以看出一直处于印度文化的影响。但是，南传佛教人士反对将他们称为小乘佛教，认为他们信奉的是传统的上座部佛教。

68. 神话譬喻，俗讲变文——佛教文学的特点

佛教文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佛典中包含的文字手法，如佛典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二是佛教影响到世界各地而形成的一般文学。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对中国的影响，一般认为：《维摩经》、《百喻经》等，激发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世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禅宗语录则影响到后世的民间文学创作。

佛典中一些经卷，如《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本身就是想象奇伟、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还有记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通过想象、塑造了佛陀前世转生的各种神话，编写的许多觉悟成果的故事，以此启示、教育世人，对后世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积德行善，仍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类佛陀本生故事，取材于印度民间传说，主人公形象突出，情节引人入胜，内容完整风趣，因此是传记性的文学作品。其中像萨锤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救鸽、九色鹿等故事，早已众口皆碑，成为千年传颂的美谈。在散见于各佛经中的大量譬喻故事、寓言等，以现实中人作模特，他们的言谈举止，往往令人捧腹，寓意深刻，趣味隽永，能启迪人们智慧，富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老少皆宜、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此外，佛典中的文学创作形式，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等，都值得借鉴。

佛典中寓言故事的汉译和流传，促进了中国晋、唐古白话小说的萌发。比如，刘文庆《世说新语》的体例，明显受到印度佛教寓言故事的影响。俗讲话本“变文”的产生，是俗讲佛经大众化、通俗化的产物。“变文”本身是一种传奇性的文学样式，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具有易读易记的特点。对我国宋代以后兴起的说唱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宋元以后，在文学作品中，杂糅了不少佛教内容，特别在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中，描写佛教的东西俯拾皆是，以《西游记》最为典型。由于禅宗重意念、意境，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诗歌的创作，文人作诗是否有禅境，成为评诗的一个标准。

69. 纤婉为工，深高为胜——佛教音乐的历程

佛教音乐，一般指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赞颂、奏乐等多种活动。以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民间化为特点。

公元前后，印度的佛乐盛行，后随佛教传入我国新疆，继而传入我国内地。最早来汉地的一批佛教音乐家，都是祖籍域外的僧人。他们都有文艺的特长，如竺法兰歌诵的梵呗，“直声而宣剖”，旋律虽不很强，基本属于天竺乐。为梵呗传入中国的始祖。之后有康僧会，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还传“泥洹呗声”；支谦依《无量寿经》造“连句梵呗”；帛尸梨密多罗作“胡呗三契”，又传弟子“高声梵呗”；支昙^竺“裁制新声，梵响清美，四飞却转……所制‘六言梵呗’，传响至今”。这些人基本上照搬天竺、西域佛乐，属于中国佛乐草创时期。能使“梵声显世”，要数3世纪初曹植所创制的示意谱，还有藏传佛教中的“央移谱”。到了4世纪末，吕光灭龟兹，获鸠摩罗什和龟兹乐之后，罗什终于打破了唱梵声、难传法的局面。5世纪初，在罗什倡导下，终于完成了“改梵为秦”的伟业，在中国内地以用中国

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这一功劳，揭开了佛乐汉化的第一页。同时作为器乐的龟兹乐大量涌入长安。5世纪中叶到6世纪，出了一位笃敬佛法、熟谙内外之学、又素精乐律的梁武帝肖衍，他亲撰《善哉》等十首佛曲，名为正乐，又亲定音律，在他遴选的49首三朝乐中，有多首带有佛教色彩。为大兴佛曲，他还亲自上阵，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万人以上的“无遮大会”，每次历时多日。法会期间，与会僧俗可看到带有印度和新疆风格、演技精湛的佛教歌舞，还可听到高僧们的法事讲座等，此举无疑为传播佛乐、弘扬佛法，提供了环境，也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提供条件。

肖衍的佛曲创作，自然是扎根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他谙熟的清商乐（清乐）基础上的。他早年就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清乐作曲家，49岁曾改西曲，创作《江南上云乐》14首，其中《江南弄》7首，都是典型的清乐。因此肖衍佛曲无疑是清乐化、中国化的佛曲。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清乐佛曲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表明天竺乐必须改造，才能顺利在中土传播，如果完全是印度音乐语言和民族习惯，则不可能广泛流行。此外，汉族艺僧的涌现，促进佛曲中国化进程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俗讲大盛，赞呗风行的年代里，一大批兼通中外佛乐的艺僧用俗讲的形式，宣传佛教义理，听者聚众，深受教育。7世纪后，中国佛乐进入成熟期。唐代，和天竺佛乐有密切关系的十部乐曲已经盛行于宫廷，经南北朝改制的清乐化佛乐也走向民间，当时庙会繁荣、俗讲极盛，庙会既为佛教音乐家提供了艺术表演的机会，也是这些艺僧们活跃的最佳场所。当时众多寺院已成为佛教音乐的传播中心，它们成为寻常百姓娱乐、休憩之地。法师们的俗讲、艺僧们的精湛演技，吸引了广大百姓，韩愈曾有“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的慨叹。每当“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酒坊鱼市尽无人”，可见当时这些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佛乐大众化、通俗化进程中，一些佛教音乐家审时度势、革新佛乐，不遗余力地弘传佛法，为中国佛教音乐规范化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净土僧人少康就能变通话脱佛乐，是颇有创新精神的一位佛乐作曲家。据《宋高僧传》记载，他在创作赞呗过程中，都能主动去“附会郑卫之声”，主动从民间音乐中吸取营养，以民间音乐为基点，融汇贯通，“变体而作”，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特征。还有一位叫文淑的高僧，他吟唱经文的歌声宛转流畅，倾倒普通百姓，以致“听者填咽寺舍”，足见他的声乐表演有着多么巨大的艺术魅力。甚至那些“教坊”的专业音乐家也“效其音调”，谱写新曲。佛乐正在向通俗化、大众化的深层发展。被民众狂热喜爱的佛乐专家，在当时不断涌出，慧常、道英、神爽、宝严等人，都是技超一流佛教音乐家，形成了一个佛乐学者群体。这种用一种崭新的佛教音乐形式，表明佛乐和我国民间俗乐已经结合，以致于满足了千百年来中国普通百姓审美心理，这应该是中国佛乐成熟期的标志。中国佛乐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中国佛教音乐分为两个流派：一个为“纤婉为工”的南方佛曲，另一个为“深高为胜”的北方赞呗。直到现在仍然流传。

70. 印度造像，中国石窟——佛教美术纵横谈

从现存遗迹看，印度佛教美术始于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232年），但都是一些以示佛存在的实物图案，全无佛陀本身的整体形象。大约在2世

纪初的安达罗王朝，出现了象征佛陀的实物图案和偶有佛陀形象共存的现象，其杰作是阿玛拉瓦提石雕等。从2世纪上叶始，佛画又在已立国一百多年的贵霜王朝帝都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贵霜王朝位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长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又具有佛教信仰的传统，因而彻底破除了早期佛教雕刻及对偶像崇拜的禁忌，于是犍陀罗的艺术家们在佛教建筑上直接雕刻了佛陀的形象，后来又发展到以雕佛陀形象为主的倾向。其代表作品有迦膩色迦大塔等。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佛陀造像，一般表现为：眉长唇薄、眼窝微凹、鼻直耳阔、波浪形发式，明显受希腊造型的影响。而头上的肉髻和头后的圆光等，代表了佛主身份。此外，其椭圆型的脸部表情恬静而庄重，流露出一种深沉反思的神态。佛陀造型，肩宽体高。身披的僧衣衣褶厚重，为御寒之用，似有印度西北部地区高寒特点。这一造型和印度本土的佛陀形象已有极大的差异。印度本土的佛陀形象，既受希腊裸体艺术的影响，又带有印度炎热气温下反映的风格，造型身材瘦削，衣褶薄蝉，脸像凹平，更多地体现了印度传统艺术特点。

3世纪初，犍陀罗佛教艺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新疆西部，最早的新疆龟兹石窟，即现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等，也有此类情况，4世纪上叶，焉耆、吐鲁番等地受龟兹艺术影响，开始凿窟造像。新疆石窟的特点是禅窟僧房，多中心塔庙窟和大像窟。更多反映了印度佛教艺术特点。4世纪中下叶，敦煌及甘肃一带开窟已成风气。5世纪中叶至8、9世纪，是中国石窟开凿的全盛时期，云冈、龙门，均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最精美的石窟，出现了不失为驰名世界的艺术精品。这些佛教绘画和雕塑，都是在中原北方地区发育成熟的，充分体现了它们中国化的具体进程。其中以凉州名僧昙曜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为最早的五大窟，是中国化的始发期。五大窟，既保留了较浓厚的犍陀罗、笈多佛教艺术特点，又体现了新疆、特别是凉州石窟艺术的特点。尔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以及迁都洛阳，使云冈石窟中后期的佛教绘画和雕塑，中国民族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从云冈石窟的造像看，其雕刻技法主要取平直刀法，作品风格粗犷浑厚。后凿的龙门石窟，其造像已有“秀骨清像”之美誉，在技法和风格已接近中国化的成熟期。敦煌石窟，内容宏富，规模巨大，历时最久，是诸石窟之首，也是全国石窟之冠，最著名的是精美的壁画，表现了多种风格。它们已经成为国际间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活化石；构成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特殊门类，被誉为“敦煌学”，并且成为一门显学。此外还有长江下游和四川、云南等地以及大理剑川等地的石窟，也有其时代、民族和地区的特色。其中以四川大足石窟为其代表。这是研究中国晚期佛教（特别是晚唐以后的密宗造像）艺术的重要代表，具有完全中国化、世俗化的倾向。

71. 佛教艺术的表征——佛塔建筑漫谈

塔，梵文音译“^窣堵波”、“塔婆”等；意译“方坟”、“圆塚”、“灵庙”等。最早的塔形为半圆土塚（“圆塚”），即埋遗体或舍利于土中，再垒上土石。至阿育王时，始造复钵式塔，由基台、复钵（基台上半球部分）、方箱形祭坛、竿和伞五部分组成。后又增一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住刹身）。最早的塔分为两种：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遗物的，称塔；没有安放舍利的，称支提。这种对塔和支提的供养崇拜，都具有纪念

的意义。随着对佛塔崇拜的深化，佛塔表面出现了各种有关佛陀的表征形象的雕刻物，如表示佛陀降生的大象，示意他出家的圣马、喻示他成道的菩提树、暗示他降魔的宝座、借喻他说法的轮子、象征他涅槃的宝塔等等。雕刻者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实物的形象来图解抽象深奥的教理。同时使用艺术性很强的雕刻，更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也和印度民族心理相适应。这种对佛塔和塔雕的崇拜，成为通向佛像崇拜的桥梁。在佛塔的早期雕刻中，并无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可能和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有直接关系。

中国佛塔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据说3世纪始有之，尔后遍布神州大地，蔚为大观。从塔的民族形式和用途方面来看，已呈现更加鲜明、多样和广泛性的特点。中国佛塔以供人凭眺的楼阁式的为主，现存塔分两种：一种是印度兼中国式的，以密檐式为主；另一种是中国式的，主要采用中国传统楼阁形式，以正方形、正八角形为多。塔层数，一般为单数，以七层或九层居多。此外，西藏佛塔一般都建于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中，云南上座部佛塔，则把印度和中国汉藏两地形式加以融合兼而有之。在材质上又分为石塔、铜塔、铁塔、琉璃砖塔、木塔、砖塔和砖木混造塔。此外，还有墓塔。按佛教规定，凡僧人圆寂者，依法位高低，将火化后的骨灰分置在不同级数的塔内安葬。

72. 大慈大悲的化身——观音菩萨给人的影响

观音在我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位女性救世主的形象。据说她可以根据信徒的要求，应机变化，以种种化身，拯救众生苦难。因此成为中国民间最信奉的“四大菩萨”之一。同时，观音在中国寺院中塑成女相，据说盛行于唐朝。因为弱者似乎更有怜悯之心，特别是中国传统女性中间更能获得同情心。

观音又是西方三圣之一，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神。她以慈悲心肠，渡众生出苦海，因此是位大慈大悲菩萨。

相传在浙江的普陀山是她显灵说法的道场，至今到这里朝圣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由于观音具有大慈大悲的人格，据说遇难众生只要念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就能以种种化身前往拯救解脱，因此人们根据想象，将她塑成各种不同的形象，有许多观世音，有六观音、七观音、三十三观音等，而日常所说的观音，则是指总体的圣观音。

六观音，即六种形象的观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天台宗所传的是：大悲观音、大慈观音、师子无畏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大梵至圣观音。据说大悲观音破六道轮回中的六道之一的地狱道的烦恼、业、报三障、大慈观音破饿鬼道三障、师子无畏观音破畜生道三障，大光普照观音破阿修罗道三障，天人丈夫观音破人道三障，大梵至圣观音破天道三障。密宗所传的是：千手千眼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如意轮观音。

千手千眼观音，亦称千眼千臂观音，简称千手观音。很多寺庙都有这种观音像，承德普宁寺的木雕大佛是最有名的千手观音像之一。据说观音听如来说《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后，发誓要接济一切众生，于是长出千手千眼。其形象是一个救世的多面手。

十一面观音，有十一种脸面，或菩萨相，慈悲寂静相，或嗔怒相，或菩

萨相而长有狗牙，或大笑相，或如来相，十一面相各戴华冠。还有一种形象，有十头四臂，右边第一手持念珠，第二手施无畏，左边第一手持莲花，第二手执军持。

马头观音，以头置马头称马头观音，为观音自性身。亦称马头大士。在密教中，又称马头明王，为五部明王中莲花部的明王。此外，在中国佛教中，还有水月观音，马郎妇观音等。

观音是外来的印度尊神，但她却在古代中国受到了普遍尊奉，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明人们总是充满各种需求和各种渴望，观音乐善好施的行为和战胜一切邪恶的形象恰恰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使人的心理达到平衡。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仍然能够碰到种种困难，烦恼滋生，需要摆脱烦恼，取得心理平衡的要求总是存在，因此观音菩萨时时还会有人祈祷，将她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73. 神道设教、宗汇百川——话说道教的创立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末年，它的产生承袭了古代原始宗教思想、黄老思想、道家哲学以及神仙思想，融合了彘纬、阴阳五行学说，吸收了民间巫术、方术，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部分内容的多渠道的汇集和发展。

道教所谓的“道”，从宗教教义上讲，源于古代神道设教的“神道”。

《周易·观卦象辞》有：“观天之神道，而入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庸》有：“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遣，使天下之人，离明盛服，以承祭祀。”鬼神崇拜，神道合流，成为道教宗教观的核心，成为道教神学、道教仙学、道教宇宙观、社会人文人际关系、自身修炼成道等一系列宗教教义、礼法仪轨的准绳。

早期道教思想在刚形成时，就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尊崇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制度，并以忠、孝、仁、义为信教入门的基本条件。认为“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力本。”（《抱朴子·对俗》）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调阴阳、序五行、顺四时的阴阳五行逆变论也深刻地影响着道教的产生。创教者张陵在巴蜀地区草创五斗米道，就把教区分为24治，以配阴阳五行，上层28星宿，下层24节气。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黄庭内景经》、《周易参同契》中均充满了这种思想。

此外，早期道教的形成，正是黄老思想的衍变和老子宗教化、神仙化的产物。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相争的战争后，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遂假借黄帝之言，以黄为本，以老为宗，宣扬无为而治的经世治国术，同时，推崇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为黄帝思想的继续，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称为“黄老道德之术”，成为道教推崇老子为宗主的先河。西汉政权巩固之后，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已不合统治者的政权需要，汉武帝断然抛弃了它而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遂分衍成几个支派。其中一支吸收老子哲学思想中“守雌”、“柔弱”的思想，退隐世事，钻研养生术，推崇黄老作神仙养生家，直接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还有一支发展成“上标老子，次述神仙”的神仙说。这些思想对道教长生成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佛经典籍的翻译、宗教仪式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汉民族的生活，刺激汉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意识，在原有的鬼神崇拜，神道设教的基础上，激发起创立一种表现中国传统的民族宗教来对抗外来宗教的欲望。因此，在东汉顺、桓帝时期，张陵在巴蜀地区草创五斗米教；灵帝时，张角创太平道，标志着道教产生。经过魏晋南北朝道教革新，完善了道教的教义、教规、教法、教礼以及经典文书的搜集汇整。作为宗教信仰的道教，在历史上曾给上层统治阶层提供精神支柱，著名道士法师还成为国师辅臣，辅佐王政；道教还成为社会革命思潮和农民起义的旗帜，成为厌倦仕途，清心寡欲者的归宿。道教对民间信仰有直接和深广的影响；同时，还吸收儒学理论并与之结成联盟，反对外来宗教，在长期的儒释道三教争斗与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道教作为集中民族文化思想、宗教观念大成的本土宗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古代化学、医药学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道教积存下来的大量经籍文书，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4. 神，宗教信仰的依托——道教神学

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没有科学和哲学；一个民族要发展，不能没有信仰和理想。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不仅需要理性思维的存在，而且还需要非理性的超自然、超人间力的追求。中世纪时期，世界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科学和哲学只是奴隶婢女。随着生产力，社会的发展，宗教和科学的位置颠倒了，但人类生活中，以理性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约束自己的同时，也迫切需要非理性的宗教情感来宣泄自己的烦恼，来寄托苦闷的忧思。宗教信仰不等于愚昧和迷信，它是善导人们放荡思维归于正路，满足人们情感的需求。宗教信仰的依托是宗教神学，宗教神学的偶像，正是超自然力和超社会力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东汉以后，先秦黄老学派逐渐分衍成几个支派，一为老庄哲学中的退隐思想；一为“上标老子，次述神仙”的神学。由此，黄帝、老子也逐渐地被神化。人可以变成神，这种神有美好的形象：“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种神有广大的交游力：“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这种神有灵性：“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神是宗教意识中一个人生命的延伸，生命的升华；是宗教灵感中人神的结合体，灵性的载赋；是宗教信仰中力量的扩展，神权的象征。神化的老子，最终披上了道教创世主的外衣，成为最高天尊，并赋予多变的神格，不定时、不定期地变化身形，降临人间，解厄救危，教化民众，祈福禳灾。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的农业国家，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自然在自然灾害，疾病痛苦的阴影中，祈求五谷丰登，社会安宁，把神看作是主管自然、掌握人的生命活动的主体，因此，不得不制造出大量的神灵来保护自己的生存。道教中的神大约有数百神，整个神灵群体中有的是原始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延续；有的是按照国家统治政体而设置的督察人们行为的司簿、司过、司命执业神；有的是由万物有灵论而造出的形形色色保护神；有的是国家民族英雄、褒封的名人或乡里百姓崇敬的贤人衍变而来的神；有的是道教中得道升仙的高道；有的是民间神话人物，这些统统被道教收拢来，作为道教中诸位神祇。此外，还有十方天神，五曜二十八宿神、日月星神等，人们在神灵面前，充满了敬畏崇拜，皈依奉献的

精神。同时也幻想着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控制和影响鬼神，使之听命于人类。作为宗教的神职人员，正是利用人们心理的潜意识、潜动力和灵感的冲击，通过道教的斋醮祭祀，法事法会，与神灵沟通，掌握、控制鬼神的力量，为社会、为人类祈福禳灾。因此，道教是有神、信神的宗教；但又是主张靠自力掌握、运用神力的“人定胜天”的宗教。

75. 神仙就是得道者——道教仙学

道教中的神多由历代人们推崇虚构出来的偶像，而道教中的仙，就是指得道而有灵性的人。仙是由人修炼而成的模范，是与道化为一体的人物，因此，对仙的追求，也就是对道的信仰。

道教中的神仙是指“保性命之真而游术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汉书·艺文志》）的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神仙家之称，战国时期是西方神话、东方仙说交融时期。西方神话系统的偶像是“神”，地理位置一般确定在青藏高原地区，常见的有黄帝、西王母等；东方神话系统的偶像是“仙”，地理位置一般指海上蓬莱三岛，最早流传于战国时齐、鲁、燕沿海诸国。“神仙”是西部高原地区神话流传到西方，并与沿海地区特定的地理条件，人文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而进一步发展为隐居山林、有德行高术、长生不老者的泛称。神仙道教形成，是秦汉以来方仙道、黄老道、巫鬼道，以及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下新生的隐逸阶层，土族天师道道士宗教信仰的结合体。

神仙的核心是出世脱俗。从社会条件看，天灾人祸，战争杀虏，社会成了吃人的陷阱。道教宗教思想要求人们消除七情六欲，追求“恬淡”、“虚心”，人为生存所需的物质是有限的，而内心的宁静，精神的自由是更重要的。放弃精神的超脱而去追求物质的享受，这正是仙人与凡夫的本质区别。道教仙学要求人们站在宇宙的高度，从物质属性去理解生命现象、人生价值、行为准则，否定人的社会生活对自身心理，精神的变态制约。

出世脱俗的核心是隐逸行为，以攀附于神仙，求人生的长久。道教仙学认为自然界万物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自然变化的法则是顺应自然而然，人如能“因任自然”，将自己的身心溶于大自然之中，“乘物以游心”，这样的和谐旋律，会在人的生理，心理上产生良好的反应，以及种种积极的暗示作用，协调人们的情绪、意识，产生激情和维护新的平衡，则更能达到精神解脱的宗教目的。

道教仙学追求长生，而不是灵魂净化后的飞升。“朝菌不知晦朔”，“小年不及大年”，时间是人生阅历深浅的决定因素，因此，学仙者的心理时空观是认为在相等的生命时间空间中，见识广、阅历丰富的人相对“生命价值”就长；在同一生命长度单位内，每个人所获得的知识量相同，那么，人的寿命就是人生价值的绝对保证，因此，求仙者一方面通过各种方法修炼身心，使寿命得以延长，一方面追求获得宇宙天地间无限的知识 and 至高无上的感受，这种建立在内心体验和感受效果的基础上的宗教仙学观，一直影响到明清之际。

76. 道教鼻祖——老子及老子哲学

老子的姓名字号，历来说法不一。据《史记·老子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曾做过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史官，接受过孔子询问古礼的请求。另一种说法是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

老子的思想流传下来有文字可考的是《老子》一书。一般认为《老子》这部书是经过他这一学派编写的非常抽象概括的赞颂体的哲理诗，其中吸收了不少民间谣谚，便于流传。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道”这一最高范畴，把它概括为事物存在与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并非为宇宙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后代道教典籍中多述作“玄道”、“大道”、“真常道”，即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根，本原，都是以老子哲学思想中“道”作为基础的，同时，加以宗教化改造而成。老子本人也由历史人物逐渐神化为道教的教祖，道教之所以以“道”命名，当与《老子》这部经典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有直接的关系。

神秘的不可言说的“道”，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人们要认识这一切，不能凭借耳、目、眼等器官，只能通过实践，主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认识个别的具体事物，可以通过学习，日积月累地获取知识，但要认识最高原理，认识宇宙规律的“道”，必须排除感官经验，通过理性思维，知“天地根”。因此，老子提出了“涤除”、“玄览”两个认识过程。“涤除”指洗涤思想、心灵上的污垢，摒除内心杂念的干扰，排除主观成见，保持客观态度。“玄览”指用深远的思维去考察事物本质所蕴含的哲理，掌握事物的根本规律。

老子的“道”的学说为道教神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老子“静观”、“玄览”的认识论，“专气致柔”的养生学说，自然无为，柔贵谦的处世哲学，又成为道教修炼和出世思想的理论依据。然而，老子从哲学家衍变成道教教主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东汉末年，受佛教影响，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时，也没有本《老子》之说建立宗教体系。汉中时张修、张鲁则奉《老子》五千文为教典，在《老子想尔注》中则以老子为教祖，上封为“太上老君”。到了李唐时期，帝宝认老子为宗祖，道教被称为“老教”，同时，施行了一系列崇奉老子的措施。在儒、释、道三教中列于首位，于是老子的教祖地位得到各道派的认同，从此，哲学家的老子成为中国道教的教祖。

77. 道家道教的风范——庄子及庄子哲学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年）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东北）。曾做过漆园吏。博学善辩，常用寓言阐述玄妙的哲理，著书10余万言。现存《庄子》三十三篇，汉以后将《庄子》分为《内篇》7种，《外篇》15种，《杂篇》11种。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的著作，代表庄子的思想，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或道家其他派别的著作。

庄子的哲学思想源于老子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的观念。宣称“命”、“自然”是主宰人类的最高力量，人类无法超越“死生、存亡、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这种思想为以后道教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庄子认为宇宙世界是不可知的，否认了人的认识能力，排斥了外向型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内向型的精神意向为主导的思维方式，提倡“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提倡“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倡导用“坐忘”、“心斋”的方法，使自己的思维超脱于世俗之上，以求在自我内向观照直觉中，运用自我情感体验，来与天道自然冥合。庄子这种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认识论直接为道教所吸收，发展成道教中重要的修炼方法。

老子学派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没落阶级急剧变化的意识，庄子学派又进一步发展，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到主观唯心主义，以清静淡泊、全性保身为旨趣。魏晋南北朝之际，士大夫趋尚玄学，认为老子导庄学之源，庄子扬老学之波。推崇《庄子》、《老子》、《周易》为三玄，庄子的学术思想才开始在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至于道士喜好老庄之学，在这一时期，也没有与《庄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产生新的道教理论。到了唐代，道士成玄英在《庄子注》中写道：“《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睿冥……”发挥《庄子》恬淡、独化、无为、重玄的思想，使之与宗教超脱精神结合起来，在唐中叶时期，颇具影响。同时也影响到道教教义，不少名称术语，如“太初”、“太清”、“太素”、“太始”、“一气化三清”、“三一混合”等都直接取自《庄子》一书。玄宗开元二十年（733年）置崇玄学，诵习《老子》、《庄子》；天宝元年（742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书名改为《南华真经》，这样就通过术业与宗教双重手段，将庄子与道教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78. 奸令祭酒、三官手书——五斗米道及政教合一的教团统治

道教传统说法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张陵（34—156年），后世亦称张道陵、张天师。相传张陵学道于四川鹤鸣山中，授受天官章本一千二百余卷，造作道书，传授弟子，从受道者交纳米五斗，所以又称五斗米道。张陵传道遍于巴郡，时人张修跟从张陵学道后，传道于陕西汉中地区，发展自己的信徒，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成为五斗米道的另一支派。

据《三国志·张鲁传》引《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緇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可以认为张修在汉中建立了较粗糙的宗教组织，教内规定以《五千文》为主要宗教经典，这就把先秦时期哲学家的老子变为替道教立言的圣人，使道家老子学派的思想，变为早期道教的主要宗教教义。其次，在汉中张修五斗米道团中已有了教阶品位和神职人员的分工。教内人员分为信徒，鬼吏、祭酒、奸令祭酒；鬼吏是初级神职人员，主要教务是为信徒作忏悔思过和治病请祷；祭酒主要负责安排宣讲经典；奸令祭酒则督察布道教务等，是教内最高领袖。张修不同于太平道而创建静室制，作为进行宗教活动的专门场所，成为道教的一个制度流传下来。三官指天官、地官、小

官，信徒请鬼吏把本人姓名、仵悔服罪内容书写在一定规格大小的黄色纸条上，焚烧后，一张沉入水里，表示通达于天地诸神。这种通过道教神职人员与世间神界通达勾通的宗教特有的途径，一直沿用于明清，成为道教斋醮仪式中的重要内容。

公元 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张修也带领道徒响应起义，攻打郡县，但很快被统治者镇压了。刘焉割据益州，张修投奔，封为别部司马，与督义司马张鲁合兵攻打汉中，汉中攻陷后，被张鲁暗杀，夺取了他的兵权，占据一方，在旧有的五斗米道教团基础上，继续用宗教手段推行教化，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重整教阶制度，设置义舍，救济安置流民；用宗教手段去鄙俗，禁杀戒，推行教化。张鲁增饰改革后的五斗米道可称为地方势力割据一方的政教工具，以宗教意识统治民众，以宗教教团控制民众，以宗教戒律约束民众，以宗教术数制约民众。这样，在汉末战乱不息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借助五斗米道的教势，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 30 年之久。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 年）曹操攻占汉中，张鲁投降。不久，刘备又兴兵汉中，当地民众多随曹军北迁，教内上层首领们受魏统治者的收买，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现政权的帮凶，五斗米道的教义逐渐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结合，发展成魏晋时期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另一支，由张鲁第三子张盛东传至江西龙虎山，成为后来正一天师教派。

79.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东汉太平道的革命精神

东汉末期，著名方士于吉（一作干室）在曲阳泉水上得到《太平清领书》170 卷。顺帝时，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套书献给朝廷，顺帝认为此书中“多巫覡杂语”、“妖妄不经”之谈，不予以采用。到了桓帝时，襄楷再次上书推荐此书，仍不受统治者的青睐。灵帝熹平年间（172—178 年），河北钜鹿人张角（？—184 年）得到《太平清领书》后，又把当时民间巫术与黄老崇拜相结合，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广泛收授学生，在民间利用符咒道法，为民众治病，组织群众，宣传太平教义，传扩奉天地、顺五行、清大乱、致太平的政治理想。

东汉末年时期，外戚、宦官专权，豪强地主之间武装割据，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使下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生活悲惨，他们迫切需要从物质生活上摆脱贫困，从精神生活中寻找寄托和安慰，需要可依赖的组织来代替被解体的村落共同体。因此，以“黄天”代表民众，以“苍天”代表统治者，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符命口号，很容易将民众吸引到宗教革命的大旗下。太平道的革命性并不是从宗教教义中引申出来的，而是社会动乱和阶级压迫的产物，是宗教旗帜下现实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所以，仅仅十余年间，信徒数猛增至 10 万多人，组织遍布徐州、幽州、冀州等八个州县，设置 36 方，大方有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各立主师。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终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军英勇奋战，历经十个月，遭到残酷镇压。

数年后，青、徐两州的黄巾军再次起义，转战北海、渤海二郡之间。一度受挫于公孙瓒。后来转入兖州任城、东平等地，起久军发展到百万余人。不久，曹操火并了这支起义军，把起义军中精壮的士兵改编为“青州兵”部众，其余的兵伍作为屯田户。青州兵的家属按照“土家制”的惯例，徙居于

邺城附近。

献帝建安廿年（215年）曹操攻占汉中，不久，刘备又兴兵攻打汉中，当地民众多随曹军北迁。这样，五斗米道的信徒从西南流徙到北方关陇、洛阳、邺城地区，必然会与太平道交融影响，逐步改变、取代了原来的太平道，在曹魏之地形成一种潜在的强劲的道教势力。

80. 除三张伪法，立音诵篆图——北朝道教的革新

魏晋以来，佛教寺院广为建立，使佛教在北方广泛地流传开来。同时，社会上神仙方术兴起，信徒避乱山林，结成了一些松散的神仙道教集团，深深地影响了道教的传扩。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针对旧教的衰落，利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托言老君旨意，对北方旧的五斗米道进行改造，清整组织，创立了适应北方鲜卑拓跋氏统治者和汉族门阀地主阶级的新天师道，使道教与封建皇权结合并正式成为官方宗教。

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他“天师”职称，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亦称《老君音诵诫经》）20卷，用以宣传太上老君的“新科”，用来“请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首先，废除了五斗米道设置的方治称号，并设立道官，规定道官招收信徒，先须考验三年，其间不得另投他师。其次，废除了祭酒私署诒职契篆；第三，废除了祭酒道官的世袭制，以“立身真理，行合轨范，唯贤是授”。第四，废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以及治病滥收赈信的规定。只听从百姓给送纸张、墨、笔，以供治丧求度使用。第五，新教反对滥传房中修炼术，认为旧教“授人大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同时，也反对滥传仙方药饵，特别强调奉道守诫，礼拜斋直，认为修道者必须“精炼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人交游”，凡入道的信徒“男女官努力修斋，寻诸诵诫，火建功，仙道不远”。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再次托言老君下降，传授天中三真太文篆五等、60余卷，号《篆图真经》，以劾召百神，传授弟子。这是一部更迎合统治者需要，为拓跋魏入主中原，并实现佐国扶命，“为帝王师”宿愿而以道教篆图为主的图讖神书。图讖文篆分为五等，各有不同的授受坛位、礼拜仪式以及道冠法衣。书中更勾画出道教天界诸神谱系，宣造天宫静轮之法，使真仙降立。这实际上正是世俗的门阀士族等级制度在虚无的宗教天国中的反映。

由于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崇信，使寇谦之道教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太平真君年间，新天师道在北魏发展到了极盛，使道教从早期民间宗教上升到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为隋唐时期成为国教，奠定了基础。

81. 编纂典章文献，完善教戒科仪——南朝道教的贡献

东晋南朝道教的改革者首推道士陆修静（406—477年），他从少年时即好习文籍，博览强识。经常游弋江川，遍访高士，广搜道经佚文，成为江南道教的一代宗师。他推行的南朝道教改革，重点在对道教经典的整理、道教教义的发展、道门教规的肃饬，以及道教科戒仪式、组织形式的改革等方面。

东晋刘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扩日益广泛，大批佛经律学被翻译介绍，佛教僧团与寺院普遍建立，江南一带出家学佛、研究佛典的文人雅士日渐增多，就连陆修静本人也深受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发展，对道教产生了强烈地冲击，佛教的经典文书可以由西域去印度求取，并通过翻译、改写而广为流传。但道教的典籍只有来源于假托太上老君、诸天神真降临洁嘏的形式来制作，这就大大地限制了道教教理的发展。于是，依靠扶乩撰文、改写佛经章节，抄袭前代医、卜、占、讖等类方书，变成了当时道士编写道经的主要材料来源。由此派生的大量道经经卷，真伪混淆、杂乱无章。东晋后期，《上清》、《灵宝》、《三皇》等大批新经典问世，丰富了道教教义，但各派道士在传经过程中，以讹传误，互相封锁，互无统属，源流不明。陆修静早年即着手收集文献手书，遍访江南名山高士，为整理道教典籍、辨别真伪，考镜源流，编纂经目、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元嘉十四年（437年）他刊正《灵宝经》，撰写了《灵宝经目》。太始七年（471年）撰写了《三洞经书目录》，共著录经书1228卷，同时，首创在道教史上有深远意义的道教典籍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

陆修静在整理充实道教教义时，注重对戒规仪式的改进，而且还为传授《灵宝经》编纂了一整套授立仪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使灵宝经典成为教戒诀要与行世新经相齐备的经部，成为道教中重要部类。此外又增撰编辑了《斋戒仪范》、《太上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等，并在五斗米道原有的涂炭斋、指教斋的基础上，融进上清、洞神各派斋法，制定了“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成为唐宋两代的典式。

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教团的组织形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一改太平道、五斗米道“立治置职”、“领户仙民”的草堂靖治的宗教活动场所，代之而起的是林立般的道馆精庐。南北朝以来，道团的经济来源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租米，而是达官富豪、帝王后妃的施舍，以及斋醮法事的收入。出家道士可以免除租役，至使入道信徒骤增，集团性的道教组织逐渐形成，促使道士们模仿释氏寺院僧团，建立独立的道院经济体系。因此，道馆的建立与兴盛，是道教改革、道教官方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南北朝时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思想的产物。从此，道教、佛教、儒家鼎立，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82. 太极剖判、至理统一——太一教

北宋消亡，南宋偏安政权建立后，黄河流域的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在这国亡家破，民族受辱、社会动荡、民风混乱的华北大地上，士大夫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老百姓也只求“一日三餐有谷粮”。遥对孱弱的南宋政权，北方遗民深感政治前途黯淡，信仰危机日益加深，宗教思想日趋成熟。因此，在这块沦亡的土地上，先后创立了具有新的宗教哲学思想的道教教派太一教，以及与其同时的大道教和全真教。

太一教创立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年）。始祖萧抱珍以“元气浑论，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道家哲学、易学思想为教旨，概称其教为“太一教”。自称得仙人所赐秘篆，擅长祈祷河噤法术，在民间以符篆、符水为百姓治病，赢得河北地区民众的尊崇。他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篆”为名，在河南汲县建立了第一个庵堂，正式传扩太一教。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

为皇室治病，受到宠幸。在皇家的支持下，太一教得到迅速的发展。

四祖萧辅道（？—1252年）与忽必烈来往密切，凭借与元帝室的特殊关系，广交上层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雅士，教派力量渗透于各阶层。太一教在元朝初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太一教以“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门宗旨，以“驾人伦，翊世教”为教门法规，以老子“弱者道之用”为处世原则，是儒教和道家思想的结合体。信奉此教的人必须正式出家，居住宫观。道迹、道品优秀者选作法嗣，改姓始祖“萧”姓，这是道教中唯一的一个派别。

太一教是以拯救民众和社会为目标，重视实践性的主张三教合一的道派，由于不注重本宗教理论的研究，文化水准较低，虽然曾经遍及山东、陕西乃至整个河北地区，到元成宗时代，已无法挽救衰落的趋势。

83. 识心见性、教谨纯一——全真教

金初人王喆（1112—1170年）原名中字，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早年曾举儒生业，兼习射骑。相传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年）遇甘河仙人，传授秘诀，饮馔神水，从此断绝俗念，以所居“全真堂”为名，创立全真道派，改名喆，字知明。因仰慕陶渊明的“高风亮节”，道号：重阳子。在终南山脚下，建筑墓穴，取名：活死人墓，开始穴居修道的生活。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遇马钰、孙不二，收为徒弟，从此在山东宣扬全真教。其后又收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并在文登、莱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与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西归陕西祖籍时，病死于归途中，葬于终南山刘蒋村（今陕西周至重阳宫），从此，全真道尊刘蒋村为祖庭。

全真教虽由王重阳创立，而真正发扬其教旨者，实属弟子丘处机。丘处机（1147—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山东栖霞人。20岁拜王重阳为师。金大定十四年穴居陕西磷溪修炼六年，又至龙门山潜心修炼，开创全真教龙门派。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下诏禁罢全真等教，丘处机回到栖霞。泰和六年，赐所居观名太虚观。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丘处机以宣扬“不杀不争”、“正心纯一”，招安山东起义军杨安儿，深受朝廷嘉奖，名噪一时，信道者日众。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带领弟子18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并以“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劝诫成吉思汗少杀生灵，并以道家思想“清心寡欲为要”、“敬天爱民为本”晓喻元太祖，深受器重，尊称“神仙”。回到燕京后，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会，居白云观，开创传戒制度。元朝统治者赐以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因此，全真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大力发展。

全真教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崇尚符篆，不冶炼外丹，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恶耻含垢，苦己利人”为教宗，以性（精神）命（身体）双修为修道的根本。全真教教理认为：“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身捷径。”“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驹为本，清修为基。节欲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守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全真教祖述道家学说、老

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两宋以来内炼理论和方法，成为金元道教中重要派别，一直影响到明清及近代。

84. 至正守一、龙虎飞腾——正一道与龙虎山正一天师

东汉末年，张陵于巴蜀地区初创五斗米道，声称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伐诛邪伪，与天下万神分付为盟，悉承正一之道。”“正一”是至正不偏，守一不二的意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占汉中，张鲁投降。当地民众遂多随曹军北迁，这样，五斗米道的信仰从西南流传到北方关陇、洛阳、邺城地区、后发展成魏晋时期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另一支，由张鲁第三子张盛东传至江西龙虎山，尊张陵为“正一天师”。李唐之际，教门建树不多，赵宋以后，渐与江南上清派、灵宝派合流。正一道派不推崇个人修持，而以画符授箓，降神驱鬼，祈福禳灾，建设各种斋醮法事为主。宋理宗时赐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从此龙虎山正一天师遂成为江南地区诸道派的首领。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授龙虎山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正一教主”，并主领三山符箓，从此“正一道”的名称遂正式成立，事实上也就是江南地区符箓派道教的总称，统归龙虎山天师领导，并与之北方全真道派相区别。

明太祖即位后，正一派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发展达到了鼎盛，从洪武元年起，四十二代至五十一代天师均封为正一嗣教真人，掌管江南总道教，并可以私放度牒。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敕命道士宋宗真等编纂《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并亲赐御书，制定统一的道教斋醮仪轨，简化道派传统的科仪。明太祖在序文中论述道：“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是看重正一教于社会治理、社会人伦方面优于佛教、全真道而已。明初以来，道教诸派逐渐会归于正一、全真两大派，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了道箓司总管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仙的称号，封赐官位品爵，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正一道士。正一天师掌管天下诸路道教，朝廷贵戚尚好建醮设斋，正一教的地位远较元代大为提高，并凌驾于全真派之上。

明末以后，正一派逐渐衰落。至清帝国，政府对道教更加严竣管理，检束天下道士教派，改授正一真人秩以五品。道光年间，进一步取消了“正一真人”的称号，终止朝廷与龙虎山正一道派的直接朝觐关系。由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西欧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基督教教会的侵入，争夺了大批的信徒。中国古老的宗教意识受到了挑战和冲击，道教终于呈现不可挽回的衰败现象，龙虎山正一天师派道教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

85. 人身天地一鼎炉——道教内丹漫谈

道教内丹修炼功法是隋唐以来集道教服气、存思、辟谷、静功、动功等诸种养生修炼术以及中医脏腑经络学说而成的重要功法。

内丹：内指身体内部；丹指小而圆的精神意识的产物。内丹术中把人身整体比喻作“炉鼎”，把人体内循环运行的经络比作内丹修炼的通道，在人为的精神意识的诱导下，利用体内元气的推动力，把人体分泌的精液（女子指卵巢分泌的精液、男子指生殖精液）经过周身循环的修炼，使精、气、神

凝为“圣胎”，或称“丹药”。这种功法，就称为内丹术。修炼此项功法的派别，在道教内被称为丹鼎派。

内丹术基本分为四个步骤完成，首先是筑基，即保养身体，打好丹鼎的基础。道教内丹以身体为基本，仍以炼功之前要祛除一切病症，补充已亏损的部分。男性要断绝房事，女性要回绝月事。然后改变日常呼吸之法。道教认为“顺行成人，逆行成仙”，所以炼功时呼吸必须是吸时收腹，呼时鼓腹，呼吸以细长、均匀、深厚为佳。

第二是炼精化气，以精气为丹药，用精神意识去诱导，去推动它形成初步的凝结。

第三是炼气化神，是指精、气、神凝结为一，结成圣胎，在体内循行。内丹功关键在于运转大小周天，就是指在精神意志的导引下，使已结成的丹珠沿任督二脉循环。先从背部经过督脉上升，通过尾间、夹脊、玉枕三个部位，上达后脑部，称为通三关。然后沿着前面的三丹田部位下降。三丹田指脑部泥丸、胸部黄庭和腹部脐中。通三关的内丹术语称为“进火”，降三丹田的内丹术语称为“退符”。道教认为人身系一鼎炉，一小天地，天行一周之三百六十度，所以又称为周天功法。

最后阶段是炼神还虚。道教认为丹药炼成后，可以从脑户出入，化为身外之身，永世长存。

道教内丹术初创于李唐之际，五代时，出现了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彭晓、陈抟等人，才把内丹道推向了一个发展高潮。著名丹书有钟离权的《灵宝毕法》、《云房三十九章》、吕洞宾的《沁园春》、施肩吾的《钟吕传道集》、彭晓《还丹内象金钥匙》、陈抟《无极图》等。到了北宋张伯端著《悟真篇》，把内丹功法用诗、词、赋的形式阐述出来，把内丹口诀、炼功体验含蓄地表述出来，使学习内丹功法的人逐渐增多。南宋金元时，内丹派形成主张先性后命的北宗清修丹法和主张先命后性的南宗命功丹法。两宗在元朝末年逐渐合流，形成以《参同契》、《悟真篇》为宗旨的内丹功法。这种功法后被全真教派吸收，流传至明清。今天修炼内丹术的道士或居士，也大多是全真教派的传人了。

86. 锁鼻息飞精——陈抟与内丹道

陈抟（871—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人。少年时，喜研读《易》经，精通《诗》、《书》、方药、数术诸学。在仕途屡遭挫败后，开始访道求仙。曾跟从邛州天师观高道何昌一学习“锁鼻息飞精”方法，（即蛰龙纳气法），后隐居华山，专炼内丹术和睡功，有“睡仙”之称。

陈抟作为宋初道教练养大家，将《易》、《道德经》、《庄子》、《参同契》等道家、道教学说与道教练养术紧密结合，借易理、道家思想以建立其模拟自然的修炼理论；并绘制成图，开创图学，以图解的方式把内丹修炼的过程分为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五个阶段，在阐述性命双修法中，又分为守玄牝、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五气朝元、取坎填离、炼神还虚等若干步骤。正如明末清初黄宗炎《太极图说辨》所说：“图学以来，出于图南，道家者流，杂以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

陈抟《无极图》内丹道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性命双修的体验过程。“性”

指心性、精神，修性即修心，即思想精神的锻炼。“命”指具有生命的活力，是人体的元精、元神、元气，修命即固精养气。陈抟内丹道不作符篆、鬼神之谈，只讲以精为生命基础，以意念专注克制身心引导真气运行，强调精、气、神合凝的变化作用。陈抟曰：“道化少、少化老、老化病，病化死，死化神。神化万物，气化生灵，精化成形。精、气、神三化，炼成真仙。”这里炼气化神的“化”，与炼神还虚的“还”，突出地表现了陈抟内丹思想中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以及物质由量变达到质变的自然观。

《无极图》丹法思想与理论基础，渊源于道家哲学与老庄思想。“无极”是道家们主张的宇宙本原，在老庄思想中主要用来表示道的无形无体、无穷无尽的特点，而在《无极图》中被用来表示世界最终本原、内丹修炼的超脱境界。老子“三生万物”，“各归其根”的宇宙生成论，在陈抟《无极图》中是炼精化气，即把人身、气、神合三为二；炼气化神，即合二为一；炼神还虚，即一归于无，返归自然。这样，构成了两宗内丹逆炼返本、归根复命的哲学基础。

陈抟说：“修玄无别法，只须冥心太无，体认生身受命之处，而培养之，扶植之，保护之而已。故曰归根、曰复命、要不出冥心凝神四字。”“冥心凝神”，内观诸己，正渊源于庄子哲学思想。能作到心斋坐忘，冥心凝神，就可以忘乎一切，入于不死永生的境界。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复归于本源。这正是道家哲学、道教思想、陈抟内丹道所共同追求的境界。

陈抟《无极图》模式及内丹理论与魏伯阳《参同契》、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有相承渊源。北宋初年，《无极图》问世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传至周敦颐，又被改造成为宋明理学的奠基——《太极图》，为道学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而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说。

87. 实验化学的先驱——道教外丹冶炼术

道教外丹冶炼术中把用丹砂、汞、铅等一般矿物质为原料，经过特制的炉鼎烧炼后，结成的化合物称为金丹、外丹；这种方法称为金丹术。把由贱金属的铁、水银等制成金银，（实际上是药金、药银）的方法又称为黄白术。因此，外丹术也通称为金丹术。

服饵金丹可以长生不死，这是道教重要的信仰之一，也是修炼的主要目的。这种思想是早期神仙思想的发展，是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再继续。外丹术使用药物多为天然产物，早期使用的主要是丹砂和汞，东汉时很多炼丹士采用了雄黄、曾青、石胆、砒霜、白矾等石药作为原料。东晋时著名炼丹家葛洪在其《抱朴子》一书中有“金丹”、“仙药”、“黄白”三篇，专讲服饵炼丹之术，所载各种丹法用药遍及各种矿物石药和部分动植物药。唐代外丹术所用药物原料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多使用隐名暗语，唐人梅彪著有《石药尔雅》一书，其中收集炼丹术常用药物一百五十余种，隐名数百种。

道士炼丹，首先要选择名山深处，幽僻之地。根据道教戒规禁忌选择好合丹地点，再筑坛、安炉、上鼎、配料、点火等等。炼制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原料配伍、掌握火候。所谓火候，就是炉鼎中冶炼温度的控制。丹炉一旦升火，必须日夜有人守护，准确计时，按时添减燃料和调节通风量，以达到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猛火、强火、温火、文火等的要求。

外丹冶炼所用方法大致可分为：火法与水法两种。火法包括蒸馏、研磨、

升华、伏火等。水法主要是溶解反应。诸法中最主要的方法是伏炼火法，其中包括温火养炼法、武火煅烧法、煨火煮淘法、炮炙法、煨火熬干法。

道教外丹流派大致分为三个。其一金沙派，推崇服食金沙丹药，可以长生不老。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此派人物中大部分精通医药学。他们认为丹砂是“益人万倍于五谷”，百炼不消，毕天不朽，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另一派是推崇东汉魏伯阳《参同契》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的铅汞派。隋代苏元朗发挥《周易参同契》的太易丹道后，至唐代才逐渐兴盛起来。他们认为“铅汞合天地之元纪，包日月之精华，上冠于乾，下顺于地，总七十二石，统天地之精光，修炼成丹，服之延驻。”（《大还心镜》）著名炼丹道士有郭虚舟、孟要甫、刘知古、金竹坡、金陵子、柳泌等人。第三派是中唐时兴起的硫汞派，此派主以用硫黄和水银合炼成丹，认为“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阴之精。一阴一阳合为天地”（《太清玉碑子》），以之炼成的金沙丹药是金丹大药。三派中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相互吸收、互参互融，其中以葛洪金沙派源远流长。

88. 没有烦恼，没有忧愁——道教的精神修炼

道教教义认为人类受生成形以后，因生存的需要，猎取外物为己所用，但自然界博大无边，无穷无尽，以有限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名利，物欲之起，固然由于外界存在的刺激，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存在，由于“我”生有眼、耳、鼻、舌等器官，由于我有感觉，有思想，有意识，频频接受外物的引诱而产生了烦恼，产生了忧愁，势必劳神伤身，因此，道教法师常常告诫人们：“以名位比道德，则名位假而贱，道德真而贵。”衣食虚幻，实不定营，虽有营术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在道教精神修炼的第一步，就是要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位的奢望，即“去物欲，简尘事”，“塞其兑，闭其门，”塞之则心不动，闭之则万物不入，我心不起，万念即灭，这才是保守本真的方法，也是“收心习静”的精神修炼过程。这一过程一再强调修道立身之人“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事之非当。任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神”，修道者“必静必清，无动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充分强调了“心”的作用，把“心”比喻为利剑，用它来斩断情丝欲魔，达到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

在“收心”的过程中，还要做到“虚心”、“安心”，心不接纳外物，也不分心于外界，这是心对内、对外的两种不同的修炼。做到此，即达到“心不着物，又得不动”的“静定”。在这种“静定”中，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个“动”。便是心能“生慧”，心能把“烦恼”、“忧愁”、“邪念”、“杂想”随时斩断的利剑作用，是对心灵的净化与专一的功夫，这种功夫产生了对外在事物的摒弃与超脱。功夫修炼至此，就达到处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散、本心不起，离乎万境的道教精神修炼的最高境界了。

道教是以古代《老子》、《庄子》哲学体系作为思想基础的，因此对世界的生成，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的认识使它形成了追求在心理上、精神上，社会环境中达到“清静无为”，“离境坐忘”的精神修炼核心。隋唐之际，受到盛传的佛教的影响，同时，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在修炼方法上发展、充实了道教的修炼体系，并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的直接影响。

89. 吐故纳新——道教的呼吸修炼

道教的呼吸修炼，即所谓的“气”的修炼。道教中的“气”的概念，内涵有三个要旨，一指先天气，即父母精血媾胎时的元阳气；一指后天气，即通过饮食物质所化生的能维持生命存在的能动力，各脏腑器官的功能作用等；三指自然界的空气，即呼吸气。道教通过呼吸修炼达到养气全神、祛病延年的作用，这是道教修炼的另一核心问题。

呼吸功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服气法，它与现代气功中所讲的调息、吐纳、内视气功法、守丹田气功法等是相似的。《庄子·刻意》说：“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稽康《养生论》：“呼收吐纳，服气养身”，就是指这种服气修炼。

人体的自然呼吸，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但吸纳新鲜空气，在道教中却有许多种方法，如：服三五七九气法，服六戊气法，服五牙气法等。道教功法认为吸入天地间的四时正气，日、月、星的精气，长存在腹内，就可以长生。至于吐气，在汉代之前只有吹、呵、呼三种方法，汉以后就发展为六种方法了。唐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服气疗病论》曰：“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咽，皆出气也。”修炼之六种吐气功法，可以达到祛寒、除热、解郁、散风、消烦、理气、止极、化滞积的医疗作用。呼吸功法的要旨是通过深呼吸，锻炼肺部的活动能力，加强氧气的摄入量，扩大二氧化碳的排出量。呼吸中要求气息均匀、轻缓而深长，从而达到服气养身、服气疗病的双重目的。

呼吸功法中还有行气布气法，这是在呼吸修炼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气功疗法。当气体进入身体后，在主观意念的诱导下，循行人体内一定的路线，作用于四肢经络、五脏六腑，引起内脏功能的某些非器质性变化。在这一运行中，潜在地就存在着疏通气血，改善机体功能的防病治病作用。所以，《疗病论》曰：“以我之心，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何往而不愈哉！”这种呼吸行气养身疗病功法所根据的理论是建立在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的基础上的。所以，《疗病论》中说：“用气攻病，虽攻其处，肤腠散出，然兼依明堂图，取其所疗之穴，想而引去，尤佳。”这种功法，在现代临床治疗中实践证明确有疗效，尤其对于精神情绪有关的疾病，如：失眠、健忘、高血压、神经性胃病等，均有较好的疗效。

行气疗病功法还包括为他人治病，如：现代气功师用发气、放功运气的手段，为别人治疗疾病的功法。

在呼吸修炼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鼻无出入之气的最佳境界时，即达到了道教的呼吸修炼的最高境界——胎息。这种呼吸吐纳功法犹如婴儿在母腹中的呼吸状态，又犹如龟鹤入蛰时的呼吸方法。《抱朴子·释滞》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认为“一窍即开，元气外泄，泄而不止，劳及性命”，所以这种功法强调息之深沉，吐之微均，使气在体内自我循环，吐故纳新，这是呼吸功法的最高境界。

90. 心灵的忏悔——自首其过疗法

道教的创始人张陵在巴蜀地区传教时，把道教信徒的群体划分为二十四

个治区，设立道教神职人员——祭酒，在治区内建立靖室，专供犯有过失、违反教规、以及患有疾病的信徒在靖室内叩头仟悔、自首其过，以求自新做人。忏悔是许多宗教教规之一，是极普遍的宗教实践。当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由于某些缺点、恶行遭到上天的惩罚时，个人无法摆脱心灵上的阴影，只有依靠宗教神的力量，力图用悔悟、仟悔、自首过错，自陈罪恶，请求神灵上天的宽恕，来补救心理上的失落、内疚和自责，减轻病痛折磨。祈请法师造作三官手书，表白于天、地，请祷服罪。道教中对于那些过失较大的信徒，就要“以黄土泥额，被发系著栏格，反手自缚，口中衔壁，俯卧于地，叩头仟悔，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这就是用自我报复、自我折磨、痛心疾首的方法，来驱除邪魔、病痛，减轻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超强的负荷。

心灵忏悔，自首其过、这样的治疗方法看起来近似荒唐，但在原始宗教体验中，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利用宗教信徒的狂热信仰，调动心理因素的积极活动，以求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正如梅斯所说：“对某事物的信仰，认为它能控制现实世界中的有害事件，这就使某些人把对未来的恐惧和忧虑交托于它——这就必然会导致内心思想紧张的放松。内在安宁的自我就不再妨碍人体的正常功能。”

这样的治疗方法，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均普遍采用。在医疗实践中，对精神创伤造成的某些疾患是有用的。人的疾病不完全是因为病源感染和有害物质的侵入，通常还经历心理因素直接影响功能障碍，从而导致细胞原疾病，发生组织器官、神经系统等的病变。也就是说，人们由于情绪上、精神上过分抑郁或长期处于压抑、紧张的状态下，或是由其他心理原因引起心理生理紊乱失调，致使身体的某部分之间发生不平衡，就产生了疾病。

有了病，却不能科学地认识它，治疗它，这正是古代早期社会的悲剧。一种赎罪心理，一种惩治手段，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和恐惧。个人的无能而无力自拔，这种本能的冲动，内心矛盾情绪转向了超人间的对象，升华为对神灵表示忏悔，顶礼膜拜，乞求宽恕和保护，借助宗教礼仪作为渲泄情感、减轻精神心灵压力的手段，以肉体的痛苦，呼唤神灵的慈悲；以肉体的痛苦，减轻罪恶的份量；以肉体的痛苦，向神灵奉献赤诚的宗教皈依感情，只要使心理状态与外部世界保持平安恬静，那么，通过精神的力量，就可以使整个身体体系尽可能合理地发生作用，达到自我治愈的效果。

91. 疾病以预防为先——道教保健饮食疗法

饮食疗法在祖国早期医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管这类方法的人称作“食医”，即指掌管帝王贵族们的饮食卫生的专职人员，多半是由医生兼任，他们日常的工作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周礼》一书中把当时的医学分为四种：疾医、食医、病医、兽医，可见居于第二位的“食医”，调摄饮食卫生，在古代医学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的食疗专书应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此外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以及北宋《嘉祐本草》、《记类本草》等医药学书籍中均可见到有关饮食治疗、食物禁忌方法的记载。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食疗在隋、唐之际达到了兴盛。据现存古代目录书记载，属于饮食疗法类的专著就有三十余种。

唐代初期被称为医圣、药王的道教学者，医药家孙思邈自幼刻苦好学，钻研医术、隐居山林，不慕名利，以著述为务，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并在医疗实践中，撰述了《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其中第二十六卷专门研讨饮食疗法的方药、方剂，论述了日常生活中所食用的果、谷、菜、肉的性、味、药理作用，服食禁忌和治疗效果。

唐玄宗时，道士张鼎，号悟玄子（一作悟玄子），在他所补撰的《食疗本草》一书中，总结前人食疗理论及方法，吸收当时在民间颇有疗效的食疗单方，成为有重要价值的临床食疗书籍。书中所载食用物品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诸如草木米谷、瓜果蔬菜等均可入药，这样食用简便、寓医于食。所治疾病深及内、外、妇、儿及口眼鼻诸科。治疗对象包括男女老少，孕妇产妇，丹石家，均以预防为先。其次，书中对药物的食用方法、炮制洗涤过程、贮藏方法等，均予以说明。另外，该书还充分注意到食疗的区域性、饮食习惯的特殊性，对不同地区所生产的食用药物均广收博采，同时，对同一药物因产地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疗效也予以注明，还对同一药品尽量细分出其不同部位的不同疗效，以便使患者更好地使用药物达到食疗效果。悟玄子在撰写此书过程中，不仅博采广引，而且通过临床实践，提出新的食疗方法，在正确地合理地使用食用药品方面较以前的同类著作有发展，有提高，有实用。这是对唐代中原地区食疗医学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92. 形体健美保健操——道教的导引按摩术

导引作为一种养生健美保健操，在我国起源很早。《庄子·刻意篇》说：“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里“导引”的意思，是指活动身躯四肢，达到“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的形体健美养生目的，也是日常很好的健身医疗体育方法。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更证明导引在汉代已很流行。三国时名医华佗发明了《五禽戏》，以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来活动四肢。魏晋隋唐后，由导引所衍化派生出来的各种养生运动方术，如：易筋经、八段锦、十二段锦等，名目繁多，都是行之有效的形体健美运动。

道教的导引术不同于其他导引法之处，首先，它是配合气功、服食等修炼方法而行的，因此，在准备工作中强调做功时间应在丑后卯前，清阳之气上升之时，更适宜练功。其次，练功时要解发散梳，道教认为这是条达肝木，疏泄肝经之气的最好方法。从现代医学来看，是为了刺激头皮部的穴位，达到增加末梢血液循环的作用，从而促进大脑神经的血液供应，增强其生理机能，并且反射性地减弱内部郁血，能除疲劳，有利于降低血压。

道教的按摩术有很多方法，大致介绍如下：

摩额法：反复摩擦头额，促使血脉调畅，疏散充血现象，促进大脑和脑神经的血液供应。适用于脑力工作者。

拭目法：循行目眦，眼部进行缓慢地按摩，又称为浴目。可以使眼部血脉通畅，肌肉保持弹性，防止视力疲劳，预防和治疗近视眼，亦可推迟眼脸下垂现象的发生。

摩鼻法：用双手拇指外侧，循鼻两翼上下摩擦，可以促进鼻粘膜的血液循环，使鼻腔通畅，可起到防治鼻病、预防感冒的作用。同时，鼻翼两旁有

面动静脉及眶下动静脉的分枝，又有面神经和眼眶下神经的吻合丛，所以，摩鼻法还有助于增强眼神经的功能，防治面神经麻痹等疾患。

摩耳法：用食指、中指叉耳向上耸动，或以虎口叉耳向后旋耳轮的按摩法。人的耳部神经、血管、淋巴分布得极其丰富，耳壳和全身有一定的联系，为十二经络的诸阳经聚会的地方。所以，人体各部位或内脏的生理、病理情况都直接和耳有密切联系。按摩耳部可以刺激神经，调整和恢复身体各部位的生理机能，起到一定的保健防病作用。

摩面法：增强皮肤弹性，令人面部光泽，防皱，防斑。

摩颈法：能防治颈椎病，刺激颈动脉窦，调整血压，改善大脑供血机能。

摩肾法：这是道教养生最重视的一个方法。肾部是足三阳经、三阴经循行道路，时时按摩活动，可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聪耳目，益肾气、固肾精、强壮腰脊。久久行之，可以防治腰肌萎缩、肾炎、椎间盘突出等症。特别对男子性功能不全，女子不孕症等，均有治疗作用。

此外还有摩胸、摩腹、摩双臂等法，均有良好的形体健美、医疗保健作用。

93. 保精守持的性生活——道教房中术与养生

房中术是早期道教养生方法之一，它开启于先秦时期的神仙家、秦汉之际的方仙道、汉代黄老道。东汉以后，成为道教法术。

道教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适应大自然，摄取天地精气，以促进人体与自然协调，因此，养生必须生理和心理相结合，强调养生实践中人体形、气、神的合一。在这精、气、神学说的影响下，先秦时期的养生家们侧重“保精”养生，强调“保精守持，乐而有节，和平寿考”。同时，形成以依托黄帝、龚子、玄女、容成为代表的、流行于西蜀关中地区的房中派。

房中术又称黄赤之道，本是讲房中禁忌与却病之术。房中禁忌主要认为人们应该爱惜精气，节欲保生，不可放浪性行为。晋朝著名道教学者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说：“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益也。”强调保存精液的方法在养生中胜于药补和饮食动物类营养物质的功能。房中禁忌还应注意时气候的寒暖、风雨雷电的侵袭，以及日常生活中性行为的时间、条件、心理卫生、性行为卫生等诸种事项。

房中术的却病方法，还在于它以“保精贵生”为主。“保精贵生”，方能达到“还精补脑”，精力旺盛，头脑清晰灵活，身体健康、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抱朴子内篇·释滞篇》说：“房中之术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

房中术在后来某些道教书中被宣传为可以行致神仙之术，这纯属于妖妄之说。对于房中术中的迷信部分，我们应该坚决破除。对于其中宣讲性卫生、性节制、合理的性方法、正确的性禁忌等部分，我们应当肯定与正确对待。

94. 渡海舟楫——道教的清规戒律

道教的清规戒律是以防范为目的；宗法律条，是以惩罚为手段。这是道士们在宗教生活、宗教心性修炼中赖以“关内寇”、“防外贼”的宗教法律

条文。

道教认为“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把戒条作为信徒宗教行为规范所必须遵守的条律，也就是强迫性地把信徒们一切宗教活动、宗教行为以及日常生活均纳入条文的束缚之中。这在世俗人们的眼里，看来似乎缺少人情味，而作为宗教意识、宗教心理而言，是必不可缺少的。道教认为人从虚无自然中来，受神抱识，出生为婴儿，是纯情赤子。长大以后，欲望丛生，祸患累乱，六情染着，形神枯竭，内浊乱心，追求名利，坠入苦恼的深海中。有法无戒，犹如渡海无舟，不能返归正途，靠富贵财物，祭祷鬼神，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开度众人，防非止恶，积善得福、遵守戒律，才是福原的捷径。

道教的戒律多有数十种，因道派的不同，教阶的高低，习诵经卷的差异，都有不同的戒条。但在道教宗教心理、宗教行为中最根本的不外乎戒杀生，戒贪欲，戒淫邪。

戒杀生：指不为口欲，不为恶食而去杀害小生物，主动维护生的权利。道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道性，也就是说，众生的生命本质平等，作为人，有什么特殊权力去任意残害生灵呢？有什么资格去操纵万物的生死大权呢？万物以一种食物链的姿态生存着，动物具有生命，植物也具有生命，生命互相融合，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为了维护自我的生命，人类也避免不了杀生，而在宗教道德、宗教心理范畴内，人类必须尽量避免杀生。修行者尊重众生生命，一方面是出于怜悯；一方面是思于因果报应；一方面是出于自爱自重的心理状态。所以，他们认为杀生是成就道德的阻碍，是犯罪行为。

戒贪欲：道教宣扬人自禀形之后，因众欲生而患累起，七情六欲是人心动乱、造恶的根源所在。在物质上过分追求，致使情感放荡无羁，心理造成混乱，精神昏愤，最终身体损伤，发生器质性病变，则后悔莫及。因此，戒贪欲就是告诫人们把生活要求放在维持生命的最低点，把持戒、节欲、卫生、长命、得道的宗教体验作为生活的情趣，把少私寡欲、返本归真作为宗教心理的境界。

戒淫邪：社会上有许多阳光照射不到的罪恶与黑暗的死角，这些死角部是诱人的陷阱。淫邪是这陷阱中最深的不复之境，也是人性堕落的渊藪。外部花花世界不断的刺激，引诱人类的感官、心灵，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人性中的兽性激发出来，严重地腐蚀人心，便失去真正光明的心灵成为污秽犯罪的根源，有的甚至一次失足而导致终生遗憾。要唤起泯灭的人性，复苏失落的心灵，寻找回来的世界，必须从戒贪欲，戒淫邪做起，克制物欲的妄动，思想清静，内心恬淡，这是人类修养的最大关键，也是成就高尚品德的最大根本。

95. 心灵的礼拜——道教的斋醮祭祀

当你漫步在道教宫观的大殿上，听到笛笙箫管吹奏的仙乐，看到身穿彩绣道袍的高功法师，口中吟唱着经咒，脚下步斗踏罡，在香烟缭绕的神坛下，匍匐膜拜着信男信女，不禁要问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祭祀、斋醮礼拜道教的神灵。斋醮祭祷，是中国古代即有的祀礼，东汉五斗米道成立后，承袭了古代祭祀仪式，创建了宗教的特有的向神灵祈祷、忏悔、拜谢的礼仪。

道教设斋修醮，无非是为了“感天地、致群神。解决世罪，灭凶咎、却

怨家、修盛德、治疾病、济一切”，使活在世间的人们祈禳得到现世的福寿，使亡灵孤魂得到超度安宁。激起宗教情绪，向神服罪，以心灵的赎罪感发泄心理压力，以乞求宽恕的呻吟，来自我慰藉精神的躁动，使失落的感情在宗教殿堂中找到依托，这就是道教（包括一切宗教）通过祭祷形式培养信徒的信仰意识，激发宗教感情，皈依道门，修心炼性，积德成真的目的。

道教斋法名目繁多，有金篆斋、黄篆斋、玉篆斋、上清斋、灵宝斋、洞神斋、涂炭斋、指教斋等等，从性质上简单而论，有供斋：即摆放物品，供奉于神坛。有节斋：举行法事事前，当事人及法师要沐浴身体，节制饮食，以此来表示自身的诚意，对神灵的皈依。另有心斋：指除去一切欲望，一切杂念，追求心理上的绝对平静，精神上的自由超脱，达到“疏淪其心，除嗜欲也；澡雪精神，去秽累也；掊击其智，绝思虑也”，使信徒们在祭祀中“无思无虑则专道，无嗜无欲则乐道，无秽无累则合道”。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再与上苍神灵交通，才能获得灵验。

斋醮科仪是道教开展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通过高功法师的宿启、发炉、上香、燃灯、章表、经赞、巡坛等仪式来完成。斋醮科仪也是阐扬道法，弘扬教义的主要方式；也是道教发展民众，联系民众的手段；也是道教徒表达信仰、规戒身心的形象体现。

道教教义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人在天地中，具魂魄，贯三才而立，因此，只有人才能以自己的道功和心灵去感应、去沟通天地鬼神。在道教斋醮中，通过神职人员“志心召请”诸路神仙，六道之灵，通过法师的符篆使有道德者升入仙界，使有罪恶者沉沦地狱。神虽是神灵，但要听从法师的启请；鬼虽是鬼魂，也要听从法师的呼唤。法事中启请何路神仙，召集何等鬼神，一切悉从举办仪式的施主、法师和该仪式的性质、目的而决定。人的意识主宰了祀神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道教的教义宗旨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尽管人们心理上敬神畏鬼，但在宗教斋醮祭祀实践中，却更多地体现了“神为我用”的信念和信心。

96. 威摄鬼神的法宝——道教的符篆图文

道教的符篆是画在纸上的象形会意的复式文字。符是表示神灵启示的信物，下达旨令的凭证；篆是记载着天神名属及相关的咒语，是从天上那里得到的调遣鬼神权力的兵符或护身符，和驱鬼避邪、祈禳赐福的发令书。道教的符篆图文是多种宗教意义的集合体，道士们从这种奇妙莫测的文字中寻找精神寄托，在幻想中体现对自然，对社会的征服心理。它作为人与神、人与宗教世界主宰力量沟通的媒介，是宗教超灵感力的体现，是人类希求借助他力来战胜现实社会中的邪恶、灾害的精神力量的象征。

对符篆在宗教实践中有一定心理效益的现阶段研究，我们认为：第一，空间效益：人们的思维活动目前仍处在三维空间中，而符篆图形文字的功能可能是四维、五维空间中的一种特定的声音和图案。这些特定的音律、图文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具有特殊的效益。

第二，磁场效益：自然界是一个宇宙磁场，人身也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经络磁场。磁场中阴阳物质平衡于自然界，则反映人体是健康的。反过来，大磁场中阴阳失调，也会波及人体内阴阳物质的平衡，从而产生疾病。

符图通过得道高士在气功运气状态中，在纸上，凝聚形成的一个特殊磁场，通过病人的吞服、烧服、佩带、张贴等手段与自然界、人体内磁场相融合、相补充、相调济，共同发挥作用。

第三，心理暗示效益：人类的疾病有一部分来源于精神因素，道教利用高功法师通过宗教意念作用把气功状态下脑海中所出现的宗教图文影象转移记录在纸上成为信息纸，给需求者一种心理灵感暗示，产生对神灵的寄托感，满足病态心理的祈求，通过这一信息在体内的调理，使情绪趋于平衡，使精神得到安慰。

符篆就其可见的外形而言，属于道教书法的一种，又称作符体、符书。通常用墨笔或朱砂书画在宽三寸、长七寸的黄色竹纸上。符篆图文注重以神取定，“注意于形外”。通过线条的千变万化，展示出书法美的表现性与其结构造型的特殊性。符篆有多种用途，符篆画法也就各个相异。法师画符前要凝神用意，一气呵成，在笔锋运转的整体结构中蕴含丰富的想象；在长短粗细的线条变化中，充满着韵律的节奏感统御着宗教的神秘性，体现中国书道美的笔势韵味和中国书道的抽象美。符画中有时也插有人物巨禽，使整个画面呈现对称、不对称的均衡性，复杂的多样化中又透露出道教神权的威严，给人一种超越人世的力的启迪，给人以美与力的安全感。

97. 书海扬帆——道教文献集大成者《道藏》

《道藏》又名《道藏经》，是道教经典及有关文献的一部大丛书。魏晋以前，据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所载道经有六百七十卷，符篆图文有五百余卷。五代宋时陆修静编撰的《三洞经书目录》中记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这是道教经书的第一次汇集。

唐玄宗开元时辑成了《开元道藏》，收书三千七百余卷。

宋太宗、真宗两朝，先后命徐铉、王钦若、张君房校正，辑道书，以《千字文》顺序编排卷本，从“天”字排列至“宫”字，因此称作《大宋天官宝藏》。

与此同时，张君房又摘编其精要文献，撰成《云笈七签》，于是又有“小道藏”之称。

宋徽宗时，增收道书，全藏第一次刻印出版，刻成后底本贮存于闽县天宁万寿观，因此这又称为《万寿道藏》。

金代金章宗时曾刊印《大金玄都宝藏》共六千四百五十五卷。

元初全真道士宋德方刊印《道藏》于山西平阳玄都观，历时八年，刻成七千八百余卷，称为《玄都道藏》。

明成祖永乐年间，由张宇初天师编修道藏，未果身亡，继由其弟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至正统十年（1445年）刊完，总计五千三百零五卷，称为《正统道藏》。这是迄今唯一能见到的藏书。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校刊《续道藏》，凡一百八十卷，称《万历续道藏》。

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曾借北京白云观所藏《道藏经》加以影印，称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正统《道藏》。

近年来台湾艺文书局缩印有《道藏》共62册，精装本。后又刊印了大字本《正统道藏》。另有美国人苏海涵刊印《庄林道藏》。

《道藏》卷帙浩繁，难为大众接受，商务印书馆为了方便读者，从实用与学术价值方面考虑，从《道藏》中选出 176 种，影印成《道藏举要》。清代另有《道藏辑要》，收道书 287 种，其中有 114 种是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另有《道藏精华录》，收书 100 种，其中也有正统《道藏》以及《续道藏》未收的书籍。这些都是源出于《道藏》的选本。

近来研究学者又着力于搜集编纂藏外散佚的道书，汇为《藏外道书》刊行于世。

《道藏》这部大丛书，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在宗教研究史上有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它内容庞杂，编排繁乱，不便检索。30 年代之际，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曾编写出版《道藏子目引得》，便于查阅。70 年代，法国汉学研究中心又出版了《道德通检》。80 年代，我国学者又集体编撰了《道藏提要》，除了可以通过《提要》知晓各书的内容外，书后还附有数种索引目录，方便读者研读《道藏》，了解道教的历史文化。

98. 此曲只应天上有——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是指道士法师们诵经、礼拜、举行各种祭祀斋醮活动中演奏的乐曲和吟唱的词调。道教音乐主要由器乐、声乐两部分组成。器乐中以钟、磬、鼓、木鱼、云锣等为主，另配有吹管、弹拨、拉弦等乐器为辅。声乐以高功法师的神赞诵咒、宣戒经偈、步虚诰符时的独唱、领唱、吟唱，以及都讲的表白、诵奏，道士、信徒们的合唱等形式组成。器乐演奏常用于法事的开头、过门，道士们在仪式中绕殿巡回、队形变化和合唱时的伴奏。声乐、器乐紧密而灵活地配合，完全服从于法事仪轨的需要，以法事情节组合串联起各种诵、赞、颂、偈等，这种说唱形式，就是道教音乐的情节性与贯穿性在道教活动中的运用，它的宗教意为是警戒道士在法事进行中集中精神，倾心念道，加强文本的记诵；在香雾袅袅中，借器乐的韵律，增添宗教感染力，使道士心里纯净，使信徒油然肃穆。心灵的振颤，情感的交融，为宗教活动作好充分的精神、心理上的准备。音乐美离不开声音，而声音只是把我们引向音乐所表现的宗教意境的媒介，它还需要通过人们思维的联想、情感的升华等诸因素的作用，才能体验到宗教价值。

道教音乐作为烘染宗教作用的音乐，已具有舞、仪、乐、歌、颂、赞、吟结合的综合性的宗教艺术体，这种艺术特别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情并茂，风格多样，如幽雅清隽、恬静虚宁的步仙乐章《长空风静月华明》、《玉女真仙齐降临》等，使人进入神仙缥缈意境，心理上建立起良好的宗教环境。道教宣扬祸福报应，追求今世的解脱和来世的超度，道曲《东极妙严宫》、《正果承功上翠微》等，渲染地府的恐惧，歌颂救苦天尊的神力，以此劝戒人们行善积福，脱离苦海，满足普通民众宗教心理的要求。道教信奉神灵，相信神力无边，《英扬奋武震天宫》等道曲正是描述道教执法神接到民间求救信后，下降凡间，斩邪杀魅，为民除害的神灵威力。这正是人们追求的社会生活在宗教天国中的体现，充实了信徒心理的胜利感。

音乐对人体的影响有双重性，它能带领我们遨游天国，召神遣将，伏魔降邪，又能劝善行世，净化社会；而且悠扬悦耳的乐曲，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怡，促进心理健康。音乐的振动频率在 10—2 万赫范围内，人体酶的催化过程也有类似的频率，因而音乐可刺激人体分泌酶和激素，调节血压、

神经兴奋强度，促进身体健康。因此，宗教音乐从心理学上讲是疏松剂，可以起到心理治疗作用。

道教音乐的宗教体验告诉我们，具有浓厚神秘的宗教意味的音乐正是借乐音符号唤起直觉的音乐形象，这种直觉反映了宗教天国感，时空距离感，民众生死感，善恶感，折射到宗教礼仪活动中，启发信徒们创造性的想象；激起心灵深处信仰意识的回归；刺激民众宗教感情与各种感触的共振与交流，心理上积思成感的高层次意境的表现。这种宗教感受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基本心态和生理需求。这时，道教音乐已不单单是演奏出来的音符和乐曲，而是一种超越单纯音符感知境界达到内在超越的和谐。

99. 画苑奇葩——道教绘画艺术

道教绘画除了斋醮法事画外，还包括壁画、宫观建筑中门、窗、柱、梁间的彩绘。法事绘画一般以三清神、帝君、神仙、星图等为主，而壁画、建筑彩绘等，则以宣扬道教教义、弘扬教化功绩为主，内容多涉及道教神仙传说、经文故事、朝圣图、教化图、地狱受难图；作为建筑装饰用的彩绘，多以花鸟、走兽、山水等，几乎中国艺术所表现的领域都能在道教绘画中展现出来。因此，它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各阶级民众的道教信仰、意识观念、心理素质、审美品味。

道教绘画始于汉末，盛行于六朝隋唐之际，以画宗教题材著称的唐人吴道子，不仅为佛教作画，也为道教绘图。洛阳玄元庙壁画《五圣千官像》相传是他的手笔，其艺术技法一直影响到后代。宋时武宗元、张昞以道教壁画而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又名《五圣朝元图》），描写五方五位神仙，即：东方青灵始老君、南方丹灵真老君、中央黄老君、西方皓灵皇老君、北方玄老君与众位仙人神女朝拜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的仙仗行列。为了表达这庞大、神圣、热烈的场面，画家通过稠密重叠、流畅潇洒的衣纹线条，刻画出神将们的威武雄姿，帝君庄严肃穆，仙人们神态飘逸，玉女们俊秀文雅、临风飘动的形态，突出了人格化的神性，把宗教情感输入每个信徒的心目中，产生翩翩欲仙的美的感受。

其次，值得介绍的是山西芮成的永乐宫道教壁画。永乐宫是道教全真教派三大祖庭之一，原址在山西永济县永乐镇的黄河岸边，后因水利工程建设，全宫搬迁至芮城今址。永乐宫主体建筑为三殿一门，由南向北是无极门（又称龙虎殿）、三清殿（无极殿）、纯阳殿（混成殿）、重阳殿（七真殿），诸殿内皆满壁彩绘，为元代壁画的代表作。壁画形式大致分两类：无极门与三清殿为一类，皆以绘画诸神仙群像，其中三清殿壁画高达四米左右，有八个三米高的帝君像，二百八十六个两米高的值日神官像，以及北斗诸星、甘八宿星、天、地、水三官、五岳四读、雷公电母等人格化神仙。整个画面飘逸和谐，缤纷璀璨，弥漫着仙气，反映了道教对自然崇拜，对人格化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另外，纯阳殿和重阳殿为一类，以宗教人物故事为壁画主体。纯阳殿主要是表现道教传说和记载吕洞宾成仙得道的神话故事，如《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八仙过海图》等，重阳殿则以表现全真教创教主王重阳的诞生、少年时经过吕纯阳“传道化”，学道成仙、化度七位弟子的故事连环画，画面内容除宫廷景致外，更多的是表现山川、村野、酒肆、茶楼，在深刻的宗教思想和复杂的宗教人物、人际关系中，充满了人间生活民情风

俗的无限情趣。壁画的创作技法主要是继承唐、宋以来工笔画的传统，采用了重彩勾填、金粉贴勒的方法。博大恢宏，精工妍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东方艺术之冠”。

100. 他山之石，为我神灵——道教石刻造像

道教艺术的石刻雕塑始于北魏，到了隋唐之际，才渐渐地兴盛起来。宋元时代，北方的石刻、石窟，南方木雕工艺得到了大力发展。在这些道教造像艺术中也充分体现了道教哲学、宗教意识通过艺术手法给人们宗教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道教造像艺术强调“法自然”、“以意为主”，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追求特殊的个性、以及精神领域的自由。强调美与善、道与德的和谐。在创作上追求“以神写形”的风格，善于赋予神像人格化。如：宋代老君石像，其形态古朴，造型简炼，依石拟形，浑厚有力，神韵高逸，给人一种法力无边的安全感。四川广元剑阁一带天尊造像，多以端庄严肃、双月平视、须眉清秀为主。表现出一种超然、宁静、淳厚的风度。这些石像作为宗教权力的象征，透露出聪睿、智慧、洞察一切的威严，在广大信徒心目中加深了安全感、信任感，同时，对心中的保护神寄予无限的宗教依托，使忧愁焦虑的信徒，从祥和的威仪中，得到安慰和力量；使误入歧途的信徒，从慈善的目光中得到指示，净化心灵；能唤起更多的民众皈依在神的脚下。护法神王灵官，身披铠甲，手执钢鞭，竖眉立眼，驾于云端，它是神权的维护者与执行者，能纠查一切善恶，使鬼卒望而生畏；一副严正不阿的面孔，使信徒心理上崇畏而信赖，威摄着不良徒众，敦促他们改邪归正。又如：土地公的形象，多以丰硕矮胖、须眉长垂、笑容可掬的样子呈现在信徒的面前，给人一种宽厚、无私、温和、慈祥的慰藉。

道教石刻造像是神性人格宗教化的结合体，通过形象直接作用于感官视觉，给人们宗教意识的启迪，揭示道教思想的旨意。同时，通过造像的雕塑，又反映了道教信徒们的希望、追求、理想和好恶的审美心态。这就是宗教艺术的力量。

101. 花月神仙会——道教八仙集团的传说

中国自古有以“八”称事的传统，如淮南王刘安见八公理事的故事，杜甫诗中有“饮中八仙”的诗人，唐人江积有《八仙传》，五代时道士张素卿绘有八仙真形图八幅，这八位神仙是李已、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瓚，均是道教中的得道者。宋元时期八仙传说盛行，但已与唐代八仙名目完全不同，盖指钟离权、吕洞宾、韩湘子、兰采和、曹国舅、其他的有指徐神翁、余仙翁、风僧寿；有指元壶子、李凝阳、李八百；有指李元中、刘海蟾；有指李铁拐、张果、何仙姑等等，名目并不统一，这种现象直至明初依然，大概因民间流传不一。八仙人物名目的变化形成现在所传的八仙，是经过明人吴元泰加工定形的。吴元泰在其神魔小说《八仙出外东游记》中既定下了现今的八位仙人，小说中的故事如为庆寿东渡过海等已加工成了民间文艺、戏曲艺术的脚本。因此，八仙故事也因此而传之弥广，八仙集团的信仰也就形成了。

钟离权为五代时后晋、后汉年间人，遂有“汉钟离”之名。仕后汉为将军，一次奉旨征讨吐蕃，失败后逃入深山而迷路，得异人，便师事之。老人以长生秘诀、金丹火诀、青龙剑法传授。后又遇华阳真人，传授太乙刀法，内丹火符，后入崆峒山修道成仙。关于他的传说出现于宋朝初年，至北宋徽宗时，逐渐丰富起来。

吕洞宾的神仙传说，最早见于北宋初年，后越演越烈。其实吕洞宾本是五代末宋初的一名隐者，精通剑术，修丹炼药以救济世人，有名声在世。北宋徽宗时，岳阳出现了《吕洞宾自记碑》，碑记他是京北人，唐末举进士不第，游华山遇钟离权传金丹大药；遇苦竹真人，传驱鬼避邪之术。常游行宁京、两浙之地，先度弟子郭上灶，后度赵仙姑，均已成仙。《自记碑》出现后，对吕洞宾的纷繁传说也就逐渐统一起来。至明代又加上钟离权以黄粱一梦超度吕洞宾的故事，并结合其他仙迹而演化成今天所传的八仙故事。

韩湘子字清夫，唐吏部侍郎韩愈的外甥。自幼落拓不羁，不喜诗书，少年时出家为道士，相传有异行。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潮州，韩湘子于蓝关相见。后世遂以此敷衍而成仙话流传。

兰采和传说他是赤脚大仙降生，化为乞丐，混迹于市井之间，行歌乞讨，警悟世人。兰采和的故事盛传于唐末五代，流传久了，形成了神奇而丰富的神仙故事。

曹国舅名佾，生性恬静，淡泊寡欲，虽为皇亲，却视功名富贵如浮云。一心向道，隐迹山林。相传后遇钟离权、吕洞宾授受道家秘法，得道成仙，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卒于徐州萧县玉虚观。关于曹国舅的其他一些传说，多为后人衍化增添而来。

张果，唐时隐居山西中条山的高道，有异术，屡被皇室召见。由于传说他已有数百岁，便称为张果老。每次出行，均乘一白驴，倒骑驴背，日行数万里。歇时驴可折叠起来，放入行囊中。用时以水咒咒又恢复白驴原形。后世存诗记其事，曰：“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因此，张果老倒骑驴的神话，一直流传至今。

神仙李铁拐并无真实人物为其所本，而是把几个传说人物的仙话附会在一起而形成今世的八仙故事。魏晋时有仙人李八百，精于丹鼎之术，顷刻间能拐行八百里，故名铁拐李。又宋代有刘跛子，相传遇吕洞宾于君山，修习灵龟吐纳气法，后得道成仙。又传说唐代开元、大历年间，李元中学道于终南山，后阳神出舍远游，其肉身被老虎所啖，阳神返回后无所依托，不得已乃附路旁饿莩之尸而起，从此蓬首垢面，袒腹破足，倚杖而行。即成了今天八仙传说中的李铁拐形象。

八仙传说中唯一的女仙即何仙姑，唐代广州增城县人。少时随女伴入山采茶，走失伴友后迷路山中，至东山峰下，遇一道士施舍仙桃，从此不饮不食，能轻身飞行，往来山谷间。后隐于末州，唐中宗景龙年间白日升仙。据一些史料记载，宋代还有一个何仙姑，永州人，幼年时遇异人给桃食之，遂不食人间五谷，后得道升仙。道教八仙的传说，是把诸多关于何氏女的神奇故事附会于一身而来，并且到了明清时代，又增添了吕洞宾度何仙姑的故事，把何仙姑纳入道教八仙集团中，增添神话色彩。

道教八仙集团的八个人物分别代表了社会上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八个方面，均以得道成仙的故事来度化劝人，这正是宗教仙话布道的目的。八仙传说受到民众的喜爱，编成民间艺文、戏曲剧目，广为流传。

102. 道教女神——妈祖

妈祖原名林默娘，福建莆田湄州屿人。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因发语迟缓，故取名默娘。传说十三岁时，道士玄通授玄微秘法，窥井水而得圣符，从此聪颖过人，善操医术，能占卜预知。父兄出海遇难，默娘跳入海中，救出兄长，并在海上飘泊三天三夜，终于身负其父尸体返回，她的孝行感动乡亲。在她盛年早逝后，特意建立祠庙祭祀她，希望她的英灵能保护海上的人们。这种信仰很快在沿海一带传开，并有许多灵验的传说，于是林默娘便成了沿海渔民船户的保护神、希望神，人们尊称她“妈祖”，受到隆重的礼拜。同时，也受到历代帝王的封敕，宋徽宗宣和年间册封她为天妃，其后历经元、明、清各朝，共褒封60次左右，直至碧霞元君，天后圣母，天妃娘娘等称号。殿宇金碧辉煌，御赐庙额，甚至列入国家祀典。

妈祖是人民群众尊崇的最高女神，元朝时，有人把妈祖当成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不少地方的妈祖庙由佛教僧人主持，民间流传有《观世音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的宝卷。在明代道观中也供奉天妃圣像，永乐七年（1409年）民间也流传有《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的经书。崇祯十三年（1640年）加封天妃娘娘为碧霞元君，各地竞相先后造起碧霞元君祠，香火极盛，其中以泰山碧霞元君祠最具规模。

妈祖是护海女神，随着沿海远洋贸易的发展，妈祖信仰传遍了东南亚一带，其中最盛的还算是台湾。

台湾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移民大多是从福建一带迁去的。郑成功东渡收复台湾时，就曾亲自祈求妈祖护佑军队过海作战。光复宝岛后，即拆毁荷兰人所建的教堂，改造成妈祖庙，称为“开台妈”，世代信奉不已。清代以后，妈祖信仰在台湾进一步发展，庙宇林立，香火不断。信徒们认为从妈祖故乡湄州屿妈祖庙请回的圣像最灵验，因此，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徒经历千辛万苦，回到湄州恭请圣像。而且，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九月九日妈祖诞辰和升化纪念日时，全岛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庆典、灯火游行等，热闹非凡。

103. 全真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

白云观在北京西城西便门外，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初名天长观，以祭祀老子玄元大圣祖。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经过重建，改名太极宫。元灭金后，白云观一度被毁。元太祖时，遣使自奈曼国迎长春真人丘处机来大都，丘处机遂将太极宫加以修复扩建，改为长春宫。从那时起，才成为北方全真派道教的中心，成为全真第一丛林，堪称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再次重修，改名为白云观，留传至今。

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栖霞县滨都里人。师事全真教祖王重阳，潜心修道。王重阳死后，开创全真道龙门派宗法。他曾觐见元太祖，劝其止杀安民，并用道家“清心寡欲”、“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开导元太祖。太祖深契其言，赐号“大神仙”，拜为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坐化于白云观，弟子安葬于老律堂后的处顺堂（即今邱祖殿内），以示祭奠。明朱国祚《题白云观》曰：“一言止杀古人难，多少逋臣藉尔安，辛苦捐躯文信国，得归也拟著黄冠。”

白云观曾经明、清两代的修缮和增删，建筑群分东、中、西三路和后花园。观南向，门前有一牌楼。入山门，左右有钟鼓楼各一。中路是全观的主要建筑，共五进，依次为：灵宫殿、玉皇殿、七真殿（亦称老律堂）、邱祖殿（供奉邱真人像）、四御殿、三清殿（供奉三清塑像）。楼阁上为三清阁，收藏大明正统《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左右配殿有：藏经阁、朝天楼、宗师殿、南极殿、半姥阁、罗公塔、八仙、吕祖、元君等神殿。后花园中假山回廊，玲珑成趣，正中是全真教戒台。整个观宇，端庄凝静，古朴素雅。

白云观内珍藏着不少道教文物和文献，其中以“镇观三宝”最为著称。其一是收藏在三清阁楼上的大明正统《道藏》，是道教文献经典集大成的著作。解放前，很少有人能看到，专门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每年阴历六月初一至初七，观内道士就取出《道藏》书本摊于观前晾晒，称为“晒经会”。其二是唐代老子石雕坐像，质地为汉白玉。石刻刀法古朴遒劲。现存观内文物陈列室中。其三，是一部刻在祠堂内的《松雪道德经》，外人很少有机会看到。除此三宝外，白云观还藏有唐代石刻老子像、六十甲子殿内甲子诸神像等，现均有拓片流传。

104. 地轴天关、一柱擎天——太和武当山

武当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岳，一名仙室。位于湖北省均县以南，地处华中。山峦绵亘起伏，延伸八百余里。主峰天柱山犹如一根宝柱，直插云天，有“一柱擎天”的美誉。主峰四周，七十二峰姿态各异，形成万山来朝的奇观。武当山是道教著名的福地，元人刘道明撰《武当福地总真集》说：“武当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回六百里，环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嵩嵩之储副，五岳之流辈，唐虞柴望徧祀之地，七十二福地之一。乾兑发原，盘亘万里，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所以命名为武当山。自古以来，武当山就是道士修炼成仙的福地，相传战国时的尹喜、汉代阴长生、晋代谢允、唐末吕洞宾、以及宋人陈抟、明人张三丰等，乃至道教所奉的真武大帝，都曾在武当山修炼。现在武当山不仅是全国各宫观道院道士交友的重要场所，也是各路香客朝山进香的道教圣地。

武当山以风景绮丽驰名天下，同时，宏伟壮丽的宫观建筑更是著称华中。武当建宫立观，追溯至贞观年间，均州太守姚简始建五龙祠，以后又建太乙、延昌、神威武公庙等。宋朝时推崇真武大帝，致使武当山建筑更具规模。到了明代，成祖朱棣自谓享真武大帝的阴祐，才荣登帝位，于是尊封真武大帝为“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大建宫观群，历时十一年，耗资近百万。

武当山建筑群的设计和布局，从规格大小到间距疏密，都是充分利用和配合武当山峰峦岩涧，迂回曲折，宫观随山势的雄伟高险和奇峭幽深忽高忽低，若明若暗，时隐时现，使武当山更增添了神秘色彩，不论是道士还是游客，都似进八仙山瑶阙，玄妙超然。整个建筑群体依附三百处，最著名的有八宫（迎恩宫、紫霄宫、太和宫、南岩宫、五龙宫、五虚宫、遇真宫、净乐宫），两观（元和观、复真观），还有三十六庵、三十九桥、七十庙等。

在武当山宏伟壮观的建筑群中，不能不提及的是耸立在仅二十多平方米的峰顶上的金殿，又称为金顶。原有元代铸的古铜殿，后移八山莲峰转辗殿内，现存为永乐廿一年（1423年）所建紫禁城环抱的金殿。殿中供奉披发跣

足的真武大帝铜铸鎏金像，是艺术珍品。

其次是大岳太和宫，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共有建筑五百一十一间。太和宫正殿内供奉真武神，下列六部天君。宫前为朝圣殿，两侧为钟鼓楼，另有皇经堂，供诵经使用。

太元紫霄宫，建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位于展旗峰下，左边是青龙山，右边是白虎山，原建宫殿庙堂八百余间。紫霄宫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以龙虎殿、十方堂、紫霄大殿，父母殿为主轴。龙虎殿中塑有元代名塑家刘元一派的传世作品青龙、白虎泥像，是武当山泥塑艺术珍品。紫霄殿内供奉的是明代御制铜鎏金真武坐像四座，一是武身，另是老、中、青青身坐像。另有铜铸鎏金的八大神君、大小不同的28尊武神像。

105. 青城天下幽——青城山

自古青城客，不睡青城地。

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

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

——杜甫《丈人山》

青城山位于四川灌县西南三十华里，背靠岷山，以大面山为主峰，天师洞为中轴线，方圆占地二十多公里。它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中第五洞天名山，现为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地区之一。

青城山全山有36峰，72洞，108处胜景。诸峰环绕，茂林修竹，形如城廓，终年青绿，所以，有“青城”，“青成都”，“青城天下幽”之称。

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山上宫观遍布，迭宕起伏，宛如仙境中的琼宫玉宇。目前尚存的主要宫观有天师洞、祖师殿（这两处均列为全国道教重点宫观）、长生宫、建福宫、朝阳洞、上清宫、玉清宫等。

天师洞：分三层殿宇，最高层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传教时住过的洞屋；中间是黄帝祠，下边是古常道观，道教中合称这三座殿宇为天师洞，亦称第五洞天，青城山宝仙九宝洞。古常道观创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年），始名延庆观，唐时改称常道观，宋代又改名昭庆观、又称黄帝祠。现存殿宇建于清代。观内正中是三清大殿，供奉着三清教主。所塑神像的特征是：玉清元始天尊手中拿一圆珠，象征洪元世纪，住在清微天之玉清宫，是三清之首位神。上清灵宝天尊怀抱太极图，住禹余天之上清宫，象征混元世纪。太清道德天尊手持宝扇，象征太初世纪。常道观三清大殿是青城山道教主要活动场所，也是香客游人朝神膜拜的殿堂。每逢朔望斋醮日，大殿中香烟缭绕，仙乐齐鸣，使人们飘然于神仙世界。

祖师殿：原名洞石观，始建于晋代，宋时改称清都观，后又称储福观，真武宫。现存宫殿为清代所建。殿内主要供奉真武帝君、东岳六帝、张三丰祖师、吕洞宾祖师等神像，并有八仙壁画和其他诗文刻石。唐代玉真、金仙公主曾在此修道，死后葬于此山。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也在此修道，著书，死后也安葬在此处。

长生宫：系蜀汉后主刘禅为隐士范长生所修建的宫观，坐落在丈人峰下，青溪从旁流过，幽雅清静。

建福宫：原名丈人观，始建于唐朝，到宋孝宗时改名为建福宫。传说轩

辕黄帝同蚩尤作战，黄帝请青城山的宁封助战，在此建筑醮坛，祭祀天地，最终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黄帝封他为五岳丈人，统管五岳名山，故此为丈人观，正殿中供奉着宁封、杜光庭两尊泥塑像，后殿中供奉着太上老君、东华帝君、王重阳（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三尊塑像。

青城山以“幽静”为特色，自古以来不少羽客隐士修道结庐而居，有许多仙人奇士的传说流传至今。青城山色幽深，仙气弥漫，诚如《青城甲记》所说：“天仓诸峰，屹然三十有六；灵仙所宅，祥异甚多，有瑶林琼树，金沙玉田，甘露芝草，天地醴泉之异焉。”

106. 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与华山道教

华山古称西岳，又称惇物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名山之一，位于陕西省华阴县南。《水经注》曰：“远而望之莲花状”，又曰：“西方为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说出得名的缘由。其西面有少华山，所以华山亦称太华山。

华山雄伟壮观，惊险崎岖，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称号。华山山峰主要有莲花峰（西峰）、落雁峰（南峰）、朝阳峰（东峰）、玉女峰（中峰）、云台峰（北峰）五峰组成，其中以西峰、南峰最险峻。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虞舜均游历过华山。而且秦始皇、汉武帝、汉光帝、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在位时，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却没有提及他们登上过华山，这是由于山路险峻的缘故。

华山在道教中又称为西元洞，三元极真洞天，是“十大洞天”中的第四洞天。另有三十六小洞天，如莲花洞、太上洞、贺老洞、希夷洞等，其中华山洞又名太极总仙洞天。道教宫观很多，山下有西岳庙、玉泉院；山上有王母宫，群仙观、东道院、镇岳宫、玉女祠、翠云宫。有的宫观虽然面积不大，但历史悠久，古朴高雅。其中东道院，镇岳宫、玉泉院列为全国重点宫观。玉泉院相传是道教华山派祖师陈抟隐居修真之地，位于华山北麓谷口，是上山必经之地。院为四合院式的庭院建筑，分东、西、中三部，中轴线以“希夷祠”为主，主殿为老祖殿，供奉陈抟塑像。西部有山荪亭，传为陈抟所建。希夷洞内有玄武石雕刻的希夷睡功卧像。

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唐末五代时人，出身儒家，有济世治国的大志。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功名纳仕的理想屡遭失败，于是出家修道，游历山川。先居武当山九室岩，修炼服气辟谷术成功后，又移居华山云台观、少华石室，先后共四十余年。在山居隐修的生涯中，撰写了《指玄篇》、《无极图》、《先天图》、《钓潭集》等著述，阐述先天易学的精旨，发展道教内丹修炼的功法，独创“一睡八百年”的睡功气功法，开启了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被奉为道教华山派的始祖。

107. 孕育于麦加的统一和复兴——伊斯兰教的起源

在当今的时代，各种宗教仍然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陪伴着人类的精神、物质生活，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伊斯兰教便是千姿百态的宗教文化之一，它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主要流行于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等地。“伊斯兰”一词，阿拉伯文的原意为“‘服从’，

意指“顺服”独一无二的真主安拉，即可获得安宁。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它们都是不规范的习惯称谓。其信仰者称为“穆斯林”、“穆民”、“信士”。现在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者，约有 12 亿人。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总是同人类的社会经验史密切相关。伊斯兰教便是伴随着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一神论宗教信仰。由于创教过程也是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所以伊斯兰教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政教合一、族教混同的特色，并深深地影响着它的发展历程。

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际，它的故乡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原始公社制行将解体、阶级国家即将形成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生活在半岛北半部的主要是游牧民部落，称为贝杜因人，而在半岛西北部的麦加，则因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成为一座商业城镇，社会发展进程也更快。部落社会向以自然崇拜为精神生活的基本形式，每个部落皆有自己供奉的主神，它是部落的精神象征和区别于另一部落的基本标志。据说当时供奉于麦加天房（圣寺）的偶像多达 360 尊，而由实力强大的望族来掌管天房的钥匙，既是精神权威也是经济权益的一种象征，因为每逢朝圣节期，周围南来北往的部落民不仅前来圣地朝拜神明，而且顺便在集市上经商。因而，麦加的地位愈益显赫。麦加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位于国际交通的交叉口，南往也门，北达叙利亚，东至波斯湾，西接红海，四通八达。然而，这一得天独厚的地位后来却因传统商道的改变而遭到沉重打击。6 世纪下半叶，由于拜占廷与波斯萨珊帝国之间连年战争，经幼发拉底河（今伊拉克）到波斯湾的东西商道被毁坏，商人们被迫改道由叙利亚经希贾兹（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的南北商道。但此时的也门也在外族的统治下已经分崩离析，而半岛北部的几个阿拉伯王国也已不复存在，于是经济中心转移至半岛西部。阿拉伯半岛的战乱和社会经济危机，使统一和复兴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而麦加的独特地位使之有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麦加的破落贵族穆罕默德（570—632 年）开始了他的创教、布道活动。为统一阿拉伯半岛，他在当时部落宗教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便于打破部落界限的全民信仰的独一无二的真主观念，以传达真主启示的使者的身份传播新信仰。他以真主的名义谴责高利盘剥、为富不仁，号召善待奴隶、赈济贫民、改善妇女的地位，宣传奉主命行善者必将在来世进天园、享福乐，而至死不信道、不忏悔的恶人必将下火狱、受天罚。最初他的布道活动因遭到麦加商业贵族的强烈抵制而收效甚微。后于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率早期信徒转移到麦加北部的麦地那，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力量日强。在其后的 10 年间，穆罕默德又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经过连年的军事征战和布道活动，终于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后继者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终于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创建了一个横贯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也由阿拉伯民族宗教演变为世界宗教。

108. 从孤儿到先知的历程——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570—632 年），作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全世界十亿多穆斯林的心目中，他是真主的使者、伟大的先知，受到无限敬仰和爱戴。其生前的言行被奉为圣言、圣行，信穆罕默德使

者和先知为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之一。

然而，这样的一位伟人却曾经是个孤儿。他出身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古来氏部落哈希姆家族一个没落贵族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相继由祖父和伯父收养。12岁起随商队出外经商，来往于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在艰苦跋涉、辗转各地的旅行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接触到外域的风土人情。25岁时，与当地一位富孀结婚，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开始积极参与麦加城的公共事务。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能改变麦加及阿拉伯半岛社会贫富不均、部落仇杀的混乱状况？怎样消除买卖奴隶、残杀女婴等社会陋习和弊端？因而常去麦加郊外的希拉山洞隐修。至40岁时，接到了真主通过天使传达给他的启示。大意是说他已被真主选定为使者，向世人传告来自真主的信息。从此正式履行宣教使命。

麦加时期（610—622年）：传达的启示以宗教仪式和道德说教为主，号召人们放弃多神崇拜，只崇拜唯一的真主（安拉）；要求人们停止部落仇杀，行善戒恶；禁止高利盘剥，善待孤儿、奴隶，救济贫民等。得到少数贫民和奴隶的支持，但也遭到麦加贵族和富商的抵制与迫害，迫使部分信徒逃亡外地。622年，穆罕默德率早期信徒迁居麦地那，得到当地居民支持和拥护，信教人数剧增，力量日强。这转危为安、转弱为强的迁徙之日，被定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元年（公元622年7月16日起始）。

麦地那时期（622—632年）：穆罕默德将信徒*组成一个称为“乌玛”（意为民族）的共同体，相当于部落联盟。此时的启示以社会内容为主，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商贸、圣战、天课、对外关系等。实为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团的基本准则或章程。为巩固新生的伊斯兰政权，穆罕默德曾率穆斯林军队与反对派多次争战，互有胜负。628年，与劲敌麦加贵族签订“侯德比亚和约”。利用和平环境，派使者走访阿曼、巴林等地，致信罗马、波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国王，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时机成熟之际，于630年一举攻克麦加。穆罕默德下令清除了克尔白神殿内的偶像，确立了对独一真主的信仰。与此同时，承认麦加贵族的宗教和经济上的某些既得利益，麦加贵族也服从穆罕默德的权威。来自各地

*伊斯兰教信徒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

的代表纷纷向穆罕默德表示归顺，这在伊斯兰教史上称为“代表团年”。632年3月，穆罕默德率大批穆斯林朝觐麦加，发表了称为“辞朝”的演说。同年6月8日在麦地那去世。至此，穆罕默德完成了他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使命，纷争的各阿拉伯部落在独一真主的旗帜下实现了政治统一。他的后继者们又将伊斯兰教推向世界。

109. 伟大的奇迹——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

凡属体系完备的宗教，一般都有一部经典，作为信徒精神与物质生活的神圣指南。《古兰经》便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涉及礼仪、教义、法规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既是穆斯林行为举止的最高准则，也是他们思想观念的源泉。伊斯兰世界种种的教派、学说、思潮、运动，皆与对《古兰经》的不同理解有关。它还是阿拉伯语文中最早的一部文献，包含有历史、文学、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天文、地理等广泛知识和内容。整部经典的语言韵律优美、文辞超绝，堪称阿拉伯文学的一部不朽之作，穆斯林视此为伟大的奇迹。

按穆斯林的信仰，《古兰经》并非人为之作，而是真主启示的汇集。据说，经文的原本存放在天园内真主的宝座旁，用丝绸捆扎，有宝石装饰，天使哲布勒伊来每年从天园带给穆罕默德看一次，并在 23 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向穆罕默德口授了经文的全部内容。

全部《古兰经》共 30 卷，114 章，6200 多节，约有 7 万多个字，32 万多个字母。分为麦加章和麦地那章两部分，风格各异。麦加时期，穆罕默德传教伊始，处境艰难，章节的言辞流露出某种伤感和遗憾的心情，但又不失激情，以简短、精练、激昂、热烈为特色。以华丽的词藻描绘天园的宁静美好，以生动的语言渲染地狱的阴森恐怖，从而劝说古阿拉伯人坚定信仰，扬善止恶。麦地那时，穆斯林已形成政教合一的社团。故经文章节较长，言辞平和、演说细致，意在为新政权立法。

穆罕默德在世时，陆续启示的经文由他的弟子们背诵记忆，或记录在树叶、石片、兽皮上。他去世后，一些弟子们先后在征战中阵亡，能背诵全部经文者逐渐减少。为防止经文散失，曾有专人将所背记的资料进行整理、核对，并成书保存。由于当时各地的穆斯林朗读、记录、传诵的经文很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后由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组织著名弟子，以古来氏方言为标准，重新标点和抄写，统一了经文，称为“定本”。今天在伊斯兰世界通行的《古兰经》，皆以奥斯曼“定本”为依据。

在伊斯兰教发展的过程中，《古兰经》的整理与编纂带动了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以及阿拉伯语法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兴起。在《古兰经》问世以前，阿拉伯人并无书籍，只有一些用不同的方言吟诵的诗歌，或描写战争、或歌咏爱情，来体现部落的生活。由于有了《古兰经》，阿拉伯人才真正有了文学。阿拉伯语成为一种有魅力的语文，它是当今世界许多穆斯林民族的通用语种。摩洛哥人、埃及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他们虽然讲着各不相同的方言，彼此可

*哈里发意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能不太听得懂，但只要一写出阿拉伯文——《古兰经》的语言，就会相互理解。它是各国穆斯林思想、文化观念的共同基础，是沟通情感的桥梁，因而成为阿拉伯文学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价值的一部划时代的光辉文献。

110. 宇宙万物独一无二的主宰——伊斯兰教的真主观

伊斯兰教提倡一神论，信奉独一无二的真主。对真主与世界、真主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如何认识真主，有一套基本理论和见解。

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主宰者。他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日月星辰、天体运行、植物、动物、人类的生长发育与灭亡，都是按真主的意旨和所定规律与法则在运动。真主无形象、无方位、无比拟，无所在而又无所不在，超然绝对，自在永恒。真主大仁大慈，又全知全能；他对人对物无所求，能支配一切而又不被一切所支配。真主具有许多德性和属性，《古兰经》中归纳有 99 个美名：创造者、万能者、圣洁者、深知者、明察者、公判者、智慧者等。穆斯林以念诵这些美好的词汇赞誉真主的高贵品德。

真主与宇宙是创造与被创造、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与真主是崇拜与

被崇拜的关系。《古兰经》记述，真主在创造了人形之后，又吹入了灵魂，具有精神。故人在真主所造之物中是最高贵的，人类能够认识真主。

穆斯林对于真主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各派观点不一。在早期、穆斯林们坚信，只要树立真主独一、真主全能的信仰，人类的善恶行为自不待说。然而面对现实中的无限问题和罪恶又涌起疑问，如果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行为全部是真主的意志，那么世间的罪恶难道也是真主的责任吗？那将如何理解真主的仁慈与公正？伴随着信仰的疑问，穆斯林对真主的认识越来越理性化。

宿命论派坚持一切由真主前定，反宿命论派认为善恶取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穆阿太齐赖派则强调，真主赋予人以理性，人类凭藉理性辨别是非善恶，当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真主的公正赏罚。将宿命论派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对认识真主作重新解释的艾什尔里派，在肯定真主前定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有个人意向，真主在创造人的行为时按个人意向情况而定。他对每个人的个人意向了如指掌，虔信者必有善行，不义者定会作恶。这种主张被宣布为逊尼派（正统派）的官方信仰。著名教义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引入正统信仰，提出通过信仰与心灵、知识和理性认识真主。信仰是心，理性是知识，只凭知识不可能认识真主，还必须以心、以感觉、体验、行为和意志净化灵魂，达到认识真主的目的。

苏非派对真主独一的解释是：除真主外，无物存在。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真主的自我显现和外化，必定要返回本原。所以人认识真主，要以“与主合一”为最终目的。他们提倡爱真主，视此为纯精神的神圣之爱，爱真主者会排除一切俗世邪念，忘却自我，也就获得了生命的永恒。苏非派还以神光论思想来说明人认识真主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认为真主是至上之光，绝对之光，宇宙由不同程度的光与暗构成。每个人于先天受神光照射程度不同，所以并非人人都可以认识和接近真主，只有坚持功修者才能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另一条认识真主的道路是神智论，神智来源于真主，是关于真主的神秘的、直接的知识。它不是靠理性所获得，而是人于先天就已获得的，由于受到后天俗世物欲的纷扰而被淹没。如能专一地爱真主，把真主作为真理一样追求，抛弃一切俗世的诱惑，就能回忆起真主于先天赐予人的知识。人也就获得了真知（神智）。而达到此目的是靠直接经验或直觉而幻觉到自己与真主同一，这需要在个人功修的基础上经导师指导方可实现。

苏非派这种认识内心经验的教义被吸收进正统信仰当中，伊斯兰教的真主观也从此达到了系统完备的程度。

111. 六信——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根据阿拉伯文的音译，称为“伊玛尼”。正统派解释为内心的虔信、信仰的表白和身体力行。信仰内容涉及人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但最基本的信仰有：信真主、信天神、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一些伊斯兰教学者还把信前定列入信条，故有“六大信仰”之称。

信真主是全部信仰的核心、前提和基础。相信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他大仁大慈、全知全能，独一无二。真主创造人类，也能在人死后将其复活，接受审判和清算。所以人对真主要敬畏和顺从。同时，真主又是大恕的，人们在归信之后就能得到他的各种仁慈和恩惠。

信天神，也称信天使、信天仙。真主用光创造并差遣的天神，无性别、无老幼，圣洁无邪，数目繁多，遍布天上和人间。他们的职责是传达真主的启示，执行真主的命令，监察和记录人们的行为，管理天堂和火狱等。著名的四大天使：哲布勒伊来负责传达真主的启示，《古兰经》就是通过他传达给穆罕默德的；米卡伊来负责观察宇宙，掌管人间食禄；阿兹拉伊来专司死亡，又称“取命天仙”；伊斯拉非来负责在末日吹响审判号。据说每个人左右各有一位天神，右边的记录善事，左边的记录恶行，以便在末日时由真主赏善罚恶。

信经典，相信真主在不同时期和历史背景下降示给众使者们的一切经典。其中主要有：穆萨的《讨拉特》（旧约）、尔撒的《引支勒》（新约）、达乌德的《则逋尔》（诗篇）及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但是《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降示给人类的最后一部经典，应当遵循这最后一部经典行事。

信使者，相信历史上真主派遣到各民族中的众使者。据传，真主曾先后向世人派遣过 300 多名使者，《古兰经》中提到的有 25 位。如人祖阿丹，在众使者中品位最高；努哈曾奉主命造方舟以避洪水；易卜拉欣曾建造麦加克尔白天房；穆萨传犹太教；尔撒传基督教；穆罕默德则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称为“封印使者”，最伟大的先知，是至圣。

信末日，相信宇宙万物及人类终有一天会全部毁灭，在那日，真主会使一切复生。一切复生的灵魂和肉体都将接受最终的判决，行善作恶各有所报。

信前定，相信天地间一切事物，自然界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四季变化、人生祸福、贫富贵贱、美丑善恶等均服从于真主的预定与安排。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真主预先就知道他的选择，并根据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进行裁定。从而告诫人们用自己的理智判断善恶，选择信仰，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112. 五功——伊斯兰教的基本功课

伊斯兰教的基本功课指穆斯林为增强自己的宗教意识，体现和坚定内心信仰而必须履行的一套宗教仪式和制度。它共有五项：念、礼、斋、课、朝。

念是五功之首，以虔信态度念诵“清真言”，又称“作证词”。内容是：“我作证，穆罕默德，主的使者。”一个人要归信伊斯兰教，必须当众念诵“清真言”，只要念诵并承认这一点，就表明他已立誓言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从小到大，以至临终前，都必须每天念诵清真言，这是穆斯林一生听得最多，念得最多的话语。

礼是礼拜，穆斯林每天必须五次面向麦加克尔白方向诵经、祈祷、跪拜。从拂晓至日出为晨礼，午后至日偏西为晌礼，日偏西至日落为晡礼，日落至晚霞消失为昏礼，晚霞消失至次日拂晓为宵礼。每周五，要求穆斯林到清真寺进行集体礼拜。每年还有两次会礼，分别在开斋节和宰牲节举行。礼拜的意义在于使信徒将全部精神和意志集中于追寻真主的喜悦和后世的报酬，从而恪守教律，防止丑事和罪恶。礼拜还是涤身消罪的一种方式，拜前必须做小净和大净。小净用清水清洗手、口、鼻、脸、脚等部位，大净沐浴全身，要求礼拜者身、心、衣服都要整洁。在没有水或身体有病不能接触水的情况下可以土代水，称为“土净”或“代净”。此外还规定，在旅途中进行“短礼”，战争期间进行“轮礼”。

斋，指斋戒。穆斯林在斋月（伊斯兰教历每年9月）每日从破晓至日落禁绝一切饮食和房事，以锤炼意志，修身养性。除斋月斋戒外，信徒为某些心愿可自动把斋；或由于犯有过错而自疚，以延长把斋时间作为向真主忏悔的一种方式。

课，是天课。早期指由有钱人向穷人自由施舍、赈济孤儿等自愿行为，后正式规定为必纳的课税。在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按规定的税率纳课一次。一般现金和商品纳四十分之一，农产品纳二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完纳天课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救济贫困，为传教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出资捐赠，是伊斯兰教的经济制度之一。

朝，指朝觐或朝圣。凡有条件的男女穆斯林一生中必须至少朝觐麦加圣地一次。朝觐时间在伊斯兰教历每年12月8日—12日之间，主要仪式有：受戒、绕行天房、驻“米那”、站“阿拉法特山”、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山间疾走、射石打鬼、宰牲献祭等。朝觐者必须是成年人，健康、理智健全，有足够费用，并考虑路途是否安全。如条件不许可，暂不去朝觐、或雇请别人代为朝觐。由于历史上麦加是阿拉伯半岛经济中心，故《古兰经》还允许朝觐者去麦加从事贸易。斋月又是阿拉伯人习惯的不动干戈之月，称为“禁月”，圣地为不得侵犯之禁地。所以朝觐曾是当时阿拉伯社会团结统一的象征，今天仍是各国穆斯林交流思想感情、相互联系的桥梁。

113. 统一、民主、平等、自由——伊斯兰教的政治学说

伊斯兰教政治理论的基础源于《古兰经》，其政治学说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联，可归纳为几点。

一、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的人。真主创造世界，掌有天地的国权；使者是由真主挑选的品德高尚完美的人，引导世人按真主的启示过有意义的生活；因此穆斯林应当绝对服从真主和使者。而世间的主事人或执政者则被看作是代表真主治理世间一切事务，也应当服从。不过《古兰经》要求执政者应当具有同使者一样完善的品德与作风，要大公无私，主持正义。

二、提倡民主协商，反对专制独裁。《古兰经》号召所有公众的事情应通过协商解决，反对专制。穆罕默德之后的四大哈里发都较忠实地继承了这种民主精神和优良作风，被称为“正统哈里发”，他们执政的这一时期被视为伊斯兰教史上的“典范时代”。

三、提倡平等自由，反对剥削压迫。《古兰经》强调人们生而平等，自由不可侵犯。一个人如果遵循正道，行善戒恶，便会达到自由安宁的境界。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在肤色、血统、能力和财富等方面的差异不能成为一部分人优越另一部分人的条件，不允许存在种族歧视。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人类应当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而不应存在剥削、压迫、仇视、战争。

四、维护信仰统一，反对分裂。“穆民皆兄弟”，穆斯林因信仰真主而统一于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在真主所降示的宗教上，不得有分歧和破裂。尽管伊斯兰教创立后不久便发生了教派纷争，但这一政治主张对维护内部团结，统一信仰依然具有影响和作用。

五、维护和平，以“圣战”反对侵略。伊斯兰教一词的本意为“顺从”、“和平”。但如果自己的同胞、民族、宗教或国家受到侵犯，穆斯林就应当

为信仰、为主道而战。为圣战而牺牲者在后世将获极高的奖赏。从古至今，圣战思想成为穆斯林对外征服、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当代国际争端中的巴勒斯坦问题、阿富汗问题、两伊战争问题等都有着伊斯兰教圣战思想的因素及影响。

伊斯兰教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还集中体现在哈里发制度方面。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教确认的唯一合法的国家体制。哈里发兼有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他执政的国家必须弘扬伊斯兰教精神，执行伊斯兰教法，为民众谋利益。哈里发必须通过选举产生，由德高望重、主持正义的虔诚穆斯林当选。但是正统哈里发以后的统治者不再由民主推举产生，而是实行世袭制，哈里发个人的生活作风也走向奢侈，以封建帝国取代了早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1924年，土耳其革命正式废除哈里发制，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伊斯兰国家主要的政治制度，传统哈里发制成为历史的过去。

114. 施舍、济贫、廉洁、公正——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

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是穆斯林参与现世物质生活的准则。其主要经济主张和观点是：

(1) 承认私有财产所有权。《古兰经》指出：“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真主创造世界万物，万物归真主所有，世间一切财产也归真主所有。人们拥有财产只是暂时替真主代为管理。财产所有权是一种社会职责，以有益于全体社会为目标。

(2) 合法谋生，鼓励生产。人们拥有的财产，其来源必须合法，或通过劳动，或通过继承。《古兰经》鼓励人们通过各种谋生手段，如经商、放牧、种植等获得生活资料与财富。允许商业贸易，但要买卖公平，给足份量，反对弄虚作假；允许借贷，但要订立契约，有人作证，并规定以抵押方法保证双方利益。此外，战利品分配和接受他人施舍也属正当财产收入。利用合法手段获得的财产应充分利用，造福社会，不允许财产闲置。《古兰经》还谴责囤积财富、垄断投机，反对贪污、贿赂，严禁高利贷。凡以抢劫、偷盗、诈术欺骗、赌博、放债、投机、垄断、受贿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钱财都是罪恶的，会受到真主的清算。

(3) 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防止贫富不均。伊斯兰经济思想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为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保障公益事业和济贫，《古兰经》提出一套有关施舍、赋税及天课的法规制度。其中天课是一种强制性宗教义务，按拥有财产的比例缴纳，并统一管理，将天课收入用于公益福利事业。施舍是从富人的财产中拿出一定的份额归于贫民。有钱人自觉自愿地行善施舍可纯洁自身，获得真主的报酬。还提倡有节制地消费财富以满足生活需要、用于主道为目的，过分享受会导致自私、贪婪和冷酷。此外，教法规定，一个人死后，所留遗嘱只能处理他个人三分之一的遗产，其余三分之二供亡人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人分配。甚至在场的亲戚、孤儿、贫民也可获得一部分。从而对财富的代代积累和巨富的形成有所限制。

以上原则在早期阿拉伯社会得到实施。随后，穆斯林在对外征服中，战利品和剩余产品大大增加，生产水平不断发展提高，原有经济结构与制度逐渐解体。特别是近现代，伊斯兰国家政治独立后，在经济上面临许多问题，一些穆斯林学者再次思考以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治理经济问题，他们建议成

立伊斯兰共同市场，建立伊斯兰银行，特别是无息银行，试图按伊斯兰经济思想与原则达到经济发展与繁荣。《古兰经》中所阐述的经济主张与思想，成为当代伊斯兰经济理论的基础。

115. 劝善戒恶——伊斯兰教的伦理观

伊斯兰教的道德是一种宗教道德，其伦理观始终以宗教信仰为前提、核心和目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思想品德的修养，都应服从于信仰。

伊斯兰教不提倡禁欲与苦行，允许信徒享受今世生活。但今世与后世相比，后世的报酬和永恒的福乐更优于今世生活和享受。今世生活是“虚幻的”、“暂时的”、“欺骗人、迷惑人”的，“而在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善恶有报，行善者死后进天园，作恶者下火狱。

既然善恶有报，劝善戒恶就成为道德规范的中心。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除完成必要的宗教功课外，还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像《古兰经》所提倡的，做到主持公道，秉公作证，不徇私情，谦逊、宽恕、以德报怨，虔诚、坚忍、诚实、顺从、克己、廉洁、自持等。虔敬的生活就是坚持礼拜、诵经、记念真主等各项宗教功课，积极行善、施舍济贫、为主道而战、善待父母、亲属、孤儿、穷人、近邻、同事、旅客、奴隶、俘虏等。中庸之道、舍己为人、近贤远恶、为善事与他人相互合作、讲礼貌、文明待人等也属善行。

一切美德和善行的培养都取决于信仰，遵循正道，坚持功修，就能远离罪恶与不良行为，从而守正自洁，超脱缺点，过美好高尚的生活。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心灵，那么整个民族就会进步，社会就会随之繁荣。虔信者必定是行善者，可在后世得到加倍回赐与无限恩福。

《古兰经》所对的恶行有：顺从私欲、饮酒赌博、淫乱、傲慢自大、谎言、讥讽嘲笑、恶意猜测、嫉妒等，这些行为对社会与人类有害无益，应当禁止。

116. 善恶有报——伊斯兰教所说的“天园与火狱”

天园与火狱，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信末日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注重现世生活，但归根结底把后世作为人的最终归宿。一个人如果在生前虔信行善，死后可进天园；而今世作恶或叛教的人，经过末日审判后会被罚下火狱，永世受难。

《古兰经》中关于天园和火狱的经文数量很多，其中对天园的描述具体、美妙、生动、极富吸引力。信道而且行善的人“将享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那里气候宜人，“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他们是幸福者，“享用金镯和珍珠作装饰”，“穿着绫罗绸缎”，“享受无刺的酸枣树，结实累累的香蕉树，漫漫的树荫，泛泛的流水，丰富的水果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他们“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服侍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疼，也不酩酊”；“他们有所喜爱的鸟肉，还有白皙美目的妻子，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她们常为处女，依恋丈夫，彼此同岁”。天园里的居民“听不到恶言和谎话”，“听不到闲谈，只听到祝愿平安”，无忧无虑，

“毫不辛苦，毫不疲倦”。

与天园的美妙情景截然相反，《古兰经》中对火狱的描绘阴森恐怖，令人生畏。“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火狱“用人和石作燃料”，犯罪作恶者“在火狱中要垫火褥、盖火被”，“饮脓汁”，“带着桎梏成双成对地被捆绑”，“衬衣用沥青所做，火将笼罩他们的脸”；“在毒风和沸水中，在黑烟的阴影下，既不凉爽，又不美观”。火狱的刑罚“用沸水浇头，铁鞭抽打”，“用火烧红的金银烙前额、肋下和背脊”，“颈上套着铁圈和铁链”；“他们每因愁闷而逃出火狱，都被拦回去”，“所有的天门必不为他们开放，不得入乐园”。

这种对大园与火狱的描绘，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现实与自然生活条件有关。半岛土地贫瘠，广布着干燥的草原和沙漠，气候灼热，雨量稀少，又无常流的河道。要求摆脱自然压迫的痛苦，渴求水和树荫，是人们的强烈愿望，天园的美景正是向往中的绿洲的缩影。而长期生活在半岛的人们对炎热、缺水、特别是烈火一直怀有恐惧不安的心理，火狱的惩罚在穆斯林的心理上形成巨大压力，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天园，来世的幸福，定会专心于信仰，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穆斯林。

117. 发源于清真寺的教学与研究——伊斯兰教育体制

伊斯兰教育体制建立在传统宗教教育的基础之上。历史上，它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以及思想文化艺术的繁荣而逐步得到完善，今天，它在伊斯兰国家的正规教育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穆斯林宗教、社会、文化中心。先知曾把清真寺作为讲道讲学的场所，麦地那的先知寺是世界上第一所清真寺，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所宗教学校。而后，各地的清真寺几乎都被用作重要的教育中心。穆斯林求学者一般在附属于清真寺的小校内接受基础教育，读书识字，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初等算术、历代先知故事、诗词等。而后进入寺内接受中等教育，以《古兰经》、圣训、教法为基础课程，开设文学、史学、圣训学、教学法等分科讲座。学生追随某一学者或教师学习，在完成学业后，经过考试和答辩通过，便可自己设座讲学。

随着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至阿巴斯王朝时期，产生了更高一级的教育与研究机构。哈里发麦蒙在公元830年于巴格达创建的“智慧馆”、成为伊斯兰教第一所高等教育机关。内设翻译学院、图书馆、天文台和科学实验中心，从事翻译引进外来文化、以及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哲学方面的教育与研究。11世纪，塞尔拉人又创建了尼查姆大学，为政府所承认的最规范的宗教大学，专门研究沙斐仪派教法及正统的艾什尔里派教义学。类似高等学府还有：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摩洛哥非斯城的卡拉维因大学和突尼斯的齐东奈大学，以及遍布于中亚、南亚、西班牙地区各主要城市的成百上千所清真寺附属院校。许多著名学府发展至今，如开罗艾资哈尔大学自970年建立起，先后教授和研究什叶派、逊尼派学说以及苏非神秘主义哲学；并进行医学、天文、数学方面的研究。目前，艾资哈尔共有4万多学生，所属中小学校遍及埃及各地。派往亚非欧国家的教育讲学团共1200多个，一直保持着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文化的传统。

除清真寺与高等学府之外，学者旅行也是当时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一些著名学者为追求知识，不畏艰险，饱受磨难。语言学家们跋涉于沙漠之中，寻找文学创作与语言研究的素材；圣训学家云游四方，收集整理圣训。君士坦丁堡等地丰富的希腊古典书籍，吸引着那些思想家和智者贤人；学者们的足迹遍及伊斯兰国家各地，成为流动的教学与研究。

今天，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保留有传统的宗教院校，分别由国家教育部门或宗教部门进行管理。在国立文科院校中，伊斯兰教义学、教学法、哲学等学科的教育成为专门的课程。

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也是在寺内进行。由阿訇传习宗教基础知识，并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修辞学、圣训、教法、哲学等，属穆斯林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为伊斯兰教经学院，培养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教职人员，为发展伊斯兰文化，促进伊斯兰国家的思想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118. 穆民心中的纪念——伊斯兰教的重大节日

伊斯兰教的重大节日每年有三个：开斋节、宰牲节和圣纪。

开斋节定在伊斯兰教历的10月1日。据《古兰经》记载，真主在斋月（伊斯兰教历9月）中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穆斯林在此月中应当斋戒，每日白天禁止饮食和房事，称为“把斋”或“封斋”，斋月最后一日看到新月后即可开斋。开斋节期间，伊斯兰各国的穆斯林都举行聚礼讲道或其他庆祝活动，携带食品走访问候亲友；节前每个家庭对贫困者散发施舍（一般相当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在中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十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中国穆斯林称此为“肉孜节”（新疆地区称谓）、“大开斋”或“大尔代”（大节日）。

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在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12月是世界穆斯林朝觐麦加之日，在大朝觐的最后一天宰牲献祭。据阿拉伯民间传说，先知易卜拉欣奉真主启示和命令，宰杀自己的儿子易斯玛仪献祭。易卜拉欣出于对真主的忠诚，举刀要杀之时，真主又派天使改用绵羊代替。宰牲的习俗由此而来，并成为伊斯兰教的重大节日。此时，世界各地穆斯林在清真寺举行聚礼，宰牛、羊、驼互相赠送，招待亲友，施舍穷人。在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穆斯林还举行叼羊、赛马、摔跤等文体活动，以示纪念。

圣纪，指伊斯兰教历3月12日穆罕默德诞生纪念日。相传，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也适逢此日，故又称为“圣忌”。中国穆斯林习惯上把这两日合并纪念，俗称“办圣会”。该日各国穆斯林在清真寺聚礼，听伊玛目（教长）讲述先知穆罕默德生平，更多地诵经、赞圣。有些地区的穆斯林也宰牛羊或聚餐设宴，这是仅次于开斋节、宰牲节的第三大节日。

此外，伊斯兰教还有一些纪念日，如伊斯兰教历1月10日，称为“阿术拉”日。相传阿丹、努哈、穆萨、尔撒等先知均在各自时代的这一天获救；还传说真主在这一天创造人、天园和火狱等；伊斯兰教什叶派将此日作为哀悼日，纪念阿里之子侯赛因于680年1月10日殉难于伊拉克卡尔巴拉。届时在伊拉克的库姆等圣城，开罗的侯赛因清真寺举行隆重哀悼仪式和游行。

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妇女于伊斯兰教历6月15日纪念法蒂玛节，在中国称“姑太节”。法蒂玛是穆罕默德之女、阿里之妻，曾随先知攻占麦加和参加

辞朝，受到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的尊崇。

教历7月27日为登宵节，相传穆罕默德在621年这天夜晚，乘“天马”由麦加到耶路撒冷远寺，并在那里登宵，遨游了七重天，黎明前返回麦加。

教历8月15日为“白拉台”夜。真主在这夜将大开饶恕之门，穆斯林于此日念经、封斋、施舍，以求真主赦免罪过。

教历9月27日为“盖德尔夜”，《古兰经》文始降于此夜。

类似纪念日，都有相应的传说。穆斯林在此间更多地念经、施舍和礼拜，以示纪念。

119. 伊斯兰宗教学科的渊源与基础——经注学

经注学是伊斯兰教关于《古兰经》及其注释知识的学科。主要研究经文降示的时代背景、原因、内容、经文注释的原则和条件等。

穆罕默德时期，弟子们对经文大多能够领悟，不解之处由先知亲自解释。但经文是在23年的漫长时间里零星降示给使者的，经文的含义，有的明确，有的隐晦，而且圣门弟子们语言文化知识有差异，对传教事件了解的程度不同，因而很难准确理解和把握经文的真义。因此，在穆罕默德以后，弟子们为解释《古兰经》兴办起各类学校。早期弟子中对经文注释最多的首推伊本·阿巴斯，他被誉为《古兰经》注释之父。是麦加学校——第一个经注学校的创立者。

公元9世纪，《古兰经》注释已成为一门科学。学者们开始按照经文的顺序系统注释各个章节，经注学著作大量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塔百里（？—922年）的《古兰经注释大全》，以“传统注释”著称。主要依据先知和圣门弟子的传述，个人意见也须有弟子的传述作为证明。巴阿维（？—1116年）的《降示线索》、伊本·凯西尔（？—1372年）的《古兰经注》、苏尤提（？—1505年）的《传统注释概要》等，均属此类。

《古兰经》注释的另一来源是“意见注释”或“理性注释”，由经注学家凭借个人见解作注，不再只限于先人的传述。经文降示的社会背景，穆罕默德的传教经历，以及古代阿拉伯语言知识等，都可作为经文注释的重要依据。如法赫鲁丁·拉齐（1149—1209年）所著《幽玄的钥匙》、巴达维（？—1291年）《降示背景及注释真谛》、伊本·哈亚尼（？—1344年）《注释大全》，以及穆阿太齐赖派、什叶派、苏非派一些经注学著作都属于“意见的注释”。

至近代的经注学著作，多以两种风格相结合，不受教派思想观点的束缚，侧重于经文在修辞学方面的奇迹。

《古兰经》注释本很多，据说仅的黎波里图书馆所藏就不少于两万种。它成为伊斯兰教圣训学、教义学、教学法以及伊斯兰哲学等传统学科的渊源和基础。

120. 伊斯兰教的传述知识——圣训学

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除向圣门弟子传达《古兰经》经文以外，他个人的举止活动、口述的一些非“启示性”言论，被弟子们代代相传，构成“圣训”。

最初，圣训一直是口头传述和记忆。随着哈里发国家内部派别斗争的发展，伪造圣训日渐增多；同时，法学家也需要从经训中推断法令，迫切需要收集、整理和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圣训。由此产生了圣训学。

圣训学专门研究圣训传述的根据和传述内容的真伪。传述根据包括传述系统和来源，如某一条圣训来自何处？分为“朔至穆罕默德的”、“传述联贯的”、“传述中断的”、“系统传述的”、“单人传述的”等。圣训传述者的可信程度如何？生平、信仰与道德状况，在传述系统中的等级地位等。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布哈里（？—869年）的三部传记史书，称为《大传》、《中传》、《小传》，以及伊本·阿布杜·巴里（？—1070年）的《弟子介绍》。关于传述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辨别真伪。对矛盾的圣训、生僻的圣训、停止的与被停止的圣训作研究。归纳出不同类型的圣训，如“正确的”、“不可靠的”、“疑难的”、“不可接受的”、“篡改的”等。

圣训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六大圣训集和四圣书。六大圣训集是布哈里（？—870年）和穆斯林（？—875年）的《圣训实录》、提尔米基（？—892年）、阿布·达伍德（？—888年）、奈萨仪（？—915年）和伊本·马哲（？—886年）汇录的《圣训集》。为逊尼派奉为权威的六本穆罕默德言行录。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布哈里和穆斯林的圣训集，被称为“两真本”。布哈里一生游历16年，结识千名圣训传述人，收集到60万条圣训，但最终只选用了2761条，可见其准确度极高。穆斯林是布哈里的弟子，与他的老师一样博学多识。共收集30万条圣训，精选出7275条。这两真本传播于伊斯兰各地区，并有许多注释本。

四圣书是什叶派圣训学家汇集的四本著名穆罕默德言行录。库拉尼（？—940年）的《宗教学大全》、库米或苏杜克（？—991年）的《教法自通》、穆罕默德·本·哈桑·图西（？—1022年）的《圣训辨异》和《法令修正篇》。共收集圣训四万多条，不仅限于穆罕默德的言行，还包括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第四任哈里发600—611年）和他的后继者（诸伊玛目）的言行。为什叶派宗教与世俗立法的根据。

121. 伊斯兰教的行为规范——教法学

教法，阿拉伯语称作“沙里亚”，意为“行为”、“道路”，指真主所指定的广大穆斯林民众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是《古兰经》和圣训明文规定的不可改变和替代的神圣法令。教法学，称作“菲格海”，意为“领悟”、“理解”，是理解教法的一门宗教学科。历代法学家们根据对经文的理解，在不违背神启法律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法律推理和类比判断，从而协商公议，不断整理、加工、改造、制定和编纂出成文法律。教法正是通过教法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得以充实完善，成为穆斯林宗教、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行为法规，称之为“穆斯林法”，在中国又称“回教法”。

教法内容主要涉及宗教礼仪制度、民事法律规定和刑法。信仰礼仪规定的目的是使穆斯林通过坚持各项宗教基本功课而认识到宇宙万物及人类与造物主的关系，从而加强内心信仰，做到行善戒恶。民事法律规定包括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贸易关系、契约合同等一切有关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和法规。刑法是惩罚穆斯林犯罪行为的规定，如对杀人罪规定抵命或交付血金；对偷盗抢劫罪断手或断足；对奸淫罪处以石击或鞭刑；对叛教罪处以死刑等等。

在中世纪，教法不仅是穆斯林个人持身律己的行为准则，也曾是国家的基本法，涉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影响十分广泛。教法以判例、法学家的著作、学说为主要形式，通过宗教法庭和伊斯兰教法官得以贯彻执行。近代以来，许多伊斯兰国家对教法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定，经典里论述较为集中明确，与穆斯林个人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这一教法的核心领域和主体部分，经过一定改革沿用至今。而传统伊斯兰教法的其他门类，如商法、刑法等皆为各国的现代世俗立法所取代，旧的宗教法庭也大多被现代世俗法庭所代替。

教法学是在经注学、圣训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门尖端宗教学科，是伊斯兰教三大传统学科的集中体现，对了解伊斯兰教和的精神及其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122. 伊斯兰教法的四大渊源

伊斯兰教法的渊源是神圣的，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教法学家们所运用的“公议”、“类比”原则。

《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包容万象，但其中作为“律例”，具有法律内含的经文，主要散见于麦地那篇章中，包括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等宗教礼仪，贸易、契约、利息、租赁、抵押等民商事事务规定；结婚、离婚、遗嘱、继承等婚姻家庭事务；以及凶杀、偷窃、通奸、抢劫等刑事惩罚条律；从个人生活、道德规范到国家大事，如战争、和约、战俘及战利品分配等，《古兰经》都有概括性的原则规定。这些关于律例的经文，是教法学家最主要的立法依据。

“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立法依据。《古兰经》中的律例有的集中明确，有的简短、概括，如命人礼拜，但没有规定礼拜的具体时间和仪式，规定缴纳天课，又未分析课税的种类和数量。类似情况，就由“圣训”作为解释和补充。特别是8—9世纪，随着圣训学的发展，多种不同版本的“圣训集”问世，圣训立法日益流行。而且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许多现实问题需要作权威性法律解释，圣训以其先知的权威、充实的内容和灵活变通的解释适应了各地立法的需要，也取得社会的承认。

类比，当某一有争议的问题在经训中无明确规定可依时，准许以类似的经训明文为前提，通过比较，运用理智推导出符合经训本意的结论。由于这种类比易带有推测性质和随意性，所以教法学规定，只有精通经训知识的权威教法学家才有资格运用类比。由此而产生的类比律例经公议核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公议，原指全体穆斯林社团就重大问题的一致意见，在教法学上，指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权威教法学家就某一教法问题的一致见解。经训原文的引用、理解和解释，以及类比推理的结果是否正确，都取决于公议的结果。伊斯兰教法的理论体系和实体法部分，正是根据权威教法学家们的公议创制而成。

这四大教法渊源被称为传统的渊源，从属于这四大基本来源的还有“择优判例”、“公众利益”和“习惯法”原则，属教法学家运用理性进行创制和判断的依据。

123. 伊斯兰教的四大教法学派

在教法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法学著作的编纂与汇集成果的涌现，也形成了各个不同的教法学派。这是由于教派纷争、宗教政治观点各异、文化水平、地理环境以及对经文理解和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从 8、9 世纪至 14 世纪，在众多的法学派别中，只有以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命名的四大教法学派为逊尼派中公认的、正统的、权威的教法学派。

阿布·哈尼法（699—767 年）创立的哈乃斐学派，原是伊拉克的库法学派。由于伊拉克地区伪造圣训现象严重，所以该派在制定教法时，除根据《古兰经》外，审慎引用“圣训”。比较注重法律推理，强调教法学家个人意见和判断的价值。又有“意见派”之称。历史上，该派曾得到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成为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中流传较广的一派。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突尼斯、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细亚等地。中国穆斯林大多属于此派。

马立克·本·艾奈斯（715—795 年）所创马立克学派，起源于麦地那。那里曾是圣门弟子和教法学家云集之地，伪造圣训的现象不多，所以该派严格坚持经训明文规定，并注重当地教法学家和学者们沿袭下来的传统“公议”结果。在使用“类比”时，如与社会需要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可对圣训原则作适当的修改，根据集体利益需要立法断案。该派学说受到正统派推崇和拥护，现盛行于沙特阿拉伯的希贾兹地区、巴林、科威特、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等地。

沙斐仪（767—820 年）创立的学派，坚持以经训为立法权威，更注重“圣训”和类比，广泛使用“公议”。为天启法令与人类理性判断的结合，为消除学派分歧付出了努力。沙斐仪本人所著《法源论纲》成为教法原理学之原始资料。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西南部、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地的穆斯林奉行该派主张。

罕百里派，创始人伊本·罕百勒（780—855 年）是保守的正统派代表，坚持教法的每条规定都须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即使是可疑的圣训，也予以承认。很少使用“类比”和“公议”。在四大教法学派中以坚持经典传统著称。现盛行于沙特阿拉伯，是该国的官方法律学派。

124. 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教义学

教义学即伊斯兰教正统派的经院哲学，又称“认主学”、“凯拉姆学”。凯拉姆，阿拉伯文原意为“言语”、“谈话”、“演说”。凯拉姆学是依照逻辑与论辩方式表达其信仰的学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作“穆台凯里姆”，指运用哲学推理捍卫教义信仰的学者。

穆罕默德时代，有关信仰或神学的讨论主要依据《古兰经》文，或者由穆罕默德本人予以回答。这类回答构成后人汇集的圣训内容之一。正统哈里发时期，除依据《古兰经》外，还依据口头传述的圣训或圣行。此时的争论认真、虔诚，并无敌意，神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也不明显，更没有形成不同的神学学派。只是由于哈里发问题而产生的哈瓦利吉派与什叶派在教派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派的神学主张。

倭马亚朝时期，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发展，使神学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

教派和教派斗争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论涉及政治、宗教、信仰及伦理问题。如：真主除其本体外，还有无视觉、听觉等各种人格化的属性？人的各种行为是真主的前定，还是个人意志自由的结果？《古兰经》是永恒的还是被造的？类似问题引起人们对早期教义和经文内容的思考，力图对简朴教义作系统和严谨的论证，从而找到统一穆斯林思想和信仰的标准。从8世纪中叶开始的对古希腊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运动，为伊斯兰世界引入了逻辑和哲学，一部分穆斯林神学家开始借助于人的理性或逻辑思维解决宗教理论问题。是继续强调天启、传统或经训，还是依靠理性？围绕这一问题所持立场方法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神学派别，如盖德里叶派、穆尔吉亚派等。随之产生的穆尔太齐赖派，是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中受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以推理为基础，对有关信仰的各种哲学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试图用更精湛的宗教观念代替和更新那些流行的正统宗教观念。他们只承认真主的本体，不承认真主有任何人格化的属性，拥护人类意志自由，相信真主是公道的，只进行合理的、理智的、完善的创造。人们可以根据真主赋予的能力和理性分辨是非与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真主会根据人们自己创造的行为赏善罚恶。他们还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创作之一，而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永恒的经典。阿巴斯王朝时，穆尔太齐赖派的唯理倾向观点，一度得到官方的支持。但由于该派过于强调思辨，从事烦琐的神学论证，其深奥的哲理只为一部分知识阶层所接受；他们关于《古兰经》系“受造之物”的观点得罪了一批虔诚而又坚持经训的圣训学家，刺激了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故被正统神学家们斥为异端，不久又被官方宣布为非法。以理性主义探索宗教问题的方法和自由主义观点一度失败。

10世纪，艾什尔里（873或874—935年）脱离穆尔太齐赖派，转到正统派穆斯林的阵营，对启示和理性、信仰和哲学加以调和，以逻辑和思辨方法为教义作论证。他强调真主万能，支配一切。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真主前定，但人又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必须在真主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反对《古兰经》被造说，认为它是真主永恒的语言。艾什尔里派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被奉为官方信条。一个世纪后，艾什尔里被认为是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的创始人和权威。而后，逊尼派伊斯兰教官方信仰的正式确立和进一步完善的工作，则由安萨里完成。

125. 经院教义学集大成者——安萨里

自艾什尔里派学说被奉为官方信仰之后，它自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艾什尔里派教义所坚持的思辨和论证方法只在宗教学者或宗教教师阶层有所作用和影响，还难以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官方信仰有待于大众化和普及化。与此同时，苏非神秘主义已经广为流行，苏非派成员主张个人虔修重于履行宗教功课，探求真主或宇宙的奥秘优于遵循教法。奉行以简朴、苦修、内省、坚忍、克己、安贫的生活方式求得对真主的爱悦，以神智（真主的精神之光与人的心灵的交通）认识真主，以自我净化灵魂达到与主合一的最终目的。有些苏非派学者在理论上将自身与真主视为同一实体，从而导致泛神论思想。这种信仰和礼仪方面的神秘化逐渐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相背离，受到正统派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的谴责，常被视为“异端”。在这种状况下，统治阶级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使伊斯兰教深入人心，成为群

众自身的信仰；另一方面，使具有广泛影响的苏非神秘主义为正统信仰服务。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是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安萨里。

安萨里(1058—1111年)是艾什尔里派神学家的弟子。自幼学习教法学、神学、哲学和逻辑学，也随苏非导师研习苏非学说。在巴格达伊斯兰最高学府尼查姆学院任教时，致力于神学、法学与哲学研究。曾以苦行僧身份游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并赴麦加朝觐。在隐居的十年期间，完成巨著《宗教学科的复兴》，并写有大量著作。他以个人内心的神秘经验肯定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发现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真理”。在他的影响下，苏非主义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认可。苏非派强调内心精神生活、个人直觉经验、以及思辨的神秘的爱等思想融进了传统的宗教信条当中，伊斯兰教经院教义学增添了新的活力，也达到了它的最终模式。

安萨里作为一位神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苏非家，享有“伊斯兰教权威”的声誉，被后来的神学家们认为是重建了伊斯兰教。晚期的先辈派教法学家们，如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力图恢复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对艾什尔里—安萨里的神学体系予以抨击，拟从正统信仰中排除神秘主义因素。但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自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完全处于安萨里学说的支配之下。

126. 宗教与哲学的交融——伊斯兰哲学

宗教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立足于虔诚的信仰和繁缛的礼仪之上，一个基于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证。但是哲学又是从宗教中脱胎而出，有着宗教的痕迹与烙印。伊斯兰哲学就是如此，它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种总的看法或世界观。在阐述和讨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不仅带有宗教的以及经训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思想意识形态，主要是希腊罗马的思想和观点，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原理结合起来。因此说，它本身是宗教与哲学相互交融的产物。

伊斯兰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自四大哈里发时期至倭马亚朝时期的对外扩张运动，使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的版图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原有的伊斯兰文化在与被征服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得到丰富与发展。阿巴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与学术文化复兴，又引进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东西方古代文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观点，新柏拉图派的哲学观点及思想，都被引进哲学界，成为穆斯林学者以理性和科学论证宗教的武器。他们所思考和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关于完美的真主与不完美的世界之间的矛盾，真主的独一性与宇宙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真主的前定与人类意志自由、善与恶之间的矛盾与关系等等。在通过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进行精心研究和多方面解释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伊斯兰哲学又分为不同的派别。在早期以穆尔太齐赖派为代表，强调理性、思辨及严密的论证方法，反对盲信盲从。后以艾什尔里派为代表，将宗教与理性相结合，被作为官方经院哲学。最终由安萨里将其与神秘主义调和，使伊斯兰经院哲学达到完善。

在苏非派内部出现的哲学派别，不同于经院哲学，而是神秘主义的苏非

哲学。他们关注人与真主的关系问题，人与真主如何统一，人的本原和人的灵魂如何复归真主？在这方面，他们以新柏拉图学派的“流溢说”为基本模式，认为宇宙万物及人类，均来自真主，又复归真主，因此应提倡人与真主的接近与合一。至 12 世纪发展起来的苏非哲学，以神秘主义理论家伊本·阿拉比为代表，其思想带有强烈的泛神论观点。认为“神于万物之中”，“认识自身的人也就认识了他的主宰”。人与神接近，造物主与被造物同在。

与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不同的世俗哲学，其哲学家一般不是神学家，而是具有专业知识的自然科学家、医生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按接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不同而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

此外，什叶派思想家中的伊斯玛仪派神学家，及“精诚兄弟会”团体内，都有值得注意的哲学思想。

近现代以来，伊斯兰哲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趋势。

中国的伊斯兰哲学，具有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思想相结合的特点，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7. 伊斯兰教的主要派别

教派与教派斗争贯穿于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其中有政治派别、法学派别和神学派别之争，各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代表了伊斯兰教及其思想发展的主流。

教派的产生起源于先知的继承人问题。前三任哈里发都是通过选举或前任遗嘱而继位。此时伊斯兰教对外开拓成功，财富剧增，外来民族成分增多，阿拉伯统治阶级的生活开始奢华，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也较严厉，伊斯兰教内部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对哈里发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愈加激烈。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刺揭开了伊斯兰教内部政治斗争的序幕。阿里通过人们的效忠接替哈里发之后，立刻遇到了劲敌。在与反对派穆阿韦叶斗争接近胜利之时，由于接受“依经判断”（对穆阿韦叶“依据《古兰经》判断”的主张妥协退让）而使自己的部下分歧，出现了脱离和反对阿里的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一词意为“出走”）。至此，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第一个宗教政治派别。

哈瓦利吉派的政治主张是提倡平等自由，认为哈里发应由穆斯林自由选举产生。一切符合哈里发条件者，不分民族、种族，即使是黑人奴隶也有权当选，不必一定要出自先知家族。他们视穆阿韦叶为阿拉伯贵族利益代表，阿里向他妥协，就等于失去信仰，成为背教者。因此，他们暗杀了阿里之后，一直不断发动起义和战争反对穆阿韦叶为首的倭马亚政权。^{*}并形成一些支派，如阿兹来格派、苏夫利耶派、纳吉德派、易巴德派等。在波斯、伊拉克、半岛和也门有过较大影响，但最终仍被镇压。只有易巴德派于 8 世纪末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过易巴德派国家，又被后来的王朝所征服。从此，作为政治派别的哈瓦利吉派运动彻底结束。

哈瓦利吉派的政治军事活动失败，但其教义思想引起了神学争论。该派认为，行为是信仰的基本条件，犯大罪者就不是穆斯林，应视为背教。伊拉克圣训学家哈桑·巴士里认为犯大罪者只是罪人，仍不失为信士。他的学生瓦绥勒·本·阿塔和欧麦尔·本·俄拜德认为其地位居于信与不信者之

^{*}穆阿韦叶是倭马亚朝第一任哈里发，他将传统哈里发制度改为世袭制。

间；二人离师，另创穆阿太齐赖派。另一些人提出到世界末日时由真主去判断，称为穆尔吉亚派（意为推迟派）。

在神学争论中最有建树和发展的是穆阿太齐赖派。早期穆斯林曾接受赏善罚恶取决于真主的信条。宿命论派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但随着骚乱和争战事件的发生，部分思想家不禁提出疑问，真主不可能允许他的信徒做坏事。那么无疑，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持此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反宿命论派。穆阿太齐赖派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信条：人有意志自由，可以根据真主赋予的能力用理性检验宗教信条及人的行为善恶。这种思想曾受到推崇而盛行一时，但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后又受到压制和迫害，于 12 世纪近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艾什尔里派体系的盛行。

艾什尔里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神学家，艾什尔里派学说成为官方正统信仰。该派教义思想、立法根据及神学理论都是不断适合统治阶级需要，因此得到历代哈里发或政府的奉行与支持。

在政治方面，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认为哈里发只有古来氏人可以担任。在法学方面，逊尼派学说由于六大圣训集和四大法学派别的确立而近于完备。在神学方面，又由于艾什尔里和安萨里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正统派信仰与思想。至 16 世纪，逊尼派已成为人数最多的派别，一直作为阿拉伯统治阶级的正统信仰。

与此相对立的什叶派，始终没能居统治地位。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哈里发应当从出身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中产生。认为穆罕默德以后的哈里发应当是阿里。又提出伊玛目（穆斯林的领头人）不会犯错误，他只不过是暂时隐遁起来，还会以救世主身份重现，给大地带来正义与和平。这种伊玛目不谬说、伊玛目隐遁、救世主再现的思想，更进一步神化了阿里及其后裔。由于长期受压抑迫害，允许本派信徒在必要时隐瞒自己的信仰。又因为他们在斗争中有许多首领和教友殉难，因此也有圣徒、圣墓崇拜。在立法方面，以本派的四部圣训集为依据。其中还有许多支派，十二伊玛目派曾于 907—1147 年控制着波斯，其信仰成为伊朗政府的国教。宰德派曾于 901 年在也门取得政权，至今在也门穆斯林中依然占多数。伊斯玛仪派于 10—12 世纪，在北非建立过法蒂玛王朝，该派是印度穆斯林的多数。伊斯玛仪派以下的一些小支派，如阿萨辛派、卡尔马特派、德鲁兹派、穆斯塔阿里派等，于 9—11 世纪陆续进行过多次反对正统派哈里发的运动。各派教义礼仪不尽相同，但都以反对当权者为目标，代表了什叶派运动的主流。

在伊斯兰教派运动中还有占独特地位的一派——苏非派。在最初，它只是一种苦行的生活方式，认为现世的浮华虚荣是罪恶和不幸的根源。所以要超世脱俗，努进行心灵净化。11 世纪，正统派神学家安萨里将其纳入正统派信仰，苏非派成为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的一部分。现在苏非派教团遍及北非，传播至叙利亚、埃及、印度、阿富汗、南亚次大陆、也门、土耳其等广大地区。

早期的教派斗争及其发展，对了解伊斯兰教义学、神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极为有益。近现代以来的教派运动与思潮，如瓦哈比派、赛努西派、玛赫迪运动、巴布教派运动等，其思想和教义成为现代伊斯兰社会运动的渊源。

伊斯兰科学的起源来自两方面，一是《古兰经》和“圣训”，它是伊斯兰教经注学、圣训学、教法、教义学等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为穆斯林的文化学人们提供了知识与灵感。一是在伊斯兰教征服的各地区早已产生的其他人类文明的科学传统，它与传统伊斯兰教学科相互协调与融合，为伊斯兰文化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始于倭马亚王朝后期，活跃于阿巴斯王朝前期的翻译运动，为伊斯兰文明注入了新的内容。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有波斯的文明、印度的科学和古希腊的思想。大量波斯文史籍、文学名著、诗歌、散文、寓言故事，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及注释等被译成阿拉伯文。波斯诸王的历史与行政管理经验被阿拉伯人所借鉴，波斯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主义风格与浪漫主义情调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文学创作与生活方式；其中表达厌世思想的诗歌又成为伊斯兰教苏非派文学的思想渊源。印度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医学，包括天文学，主要通过波斯人传入伊斯兰教；另一部分则得益于许多印度学者。他们携带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名著被译成阿拉伯文，它启发和促进阿拉伯人进一步翻译和探讨古希腊托勒密（约90—168年）的天文学著作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275年）的几何学著作。阿拉伯人还从印度人那里获得有关格言、谚语、寓言、故事等一系列值得深思和含义深刻的传说。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是通过埃及亚历山大科学活动中心而获取的。托勒密人于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亚历山大大学，曾是数学、物理学、文学艺术、哲学的研究中心。部分希腊哲学著作在这里被译成古叙利亚文，大多通过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介绍给阿拉伯人。在哈里发帝王的首都巴格达所建立的“智慧园”内，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古籍被译成阿拉伯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物理学》、《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名著都被翻译引进。除医学、数学、天文学以外，逻辑学与哲学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新柏拉图主义对苏非派思想影响尤甚。

此外，中国的造纸等项技术，对伊斯兰科学的开发也曾起过促进作用。来源多样与分布地域广阔，形成伊斯兰科学的特点，使之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科学与文化。

129. 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穆斯林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

在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穆斯林继承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古希腊、波斯和印度的重要科学成果与文化思想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各项自然科学。

在数学方面，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印度数字——0、1、2、3、4、5、6、7、8、9和十进位法，并把这种方式传入欧洲。这一贡献归功于著名数学家花拉子密（760—850年），他是阿拉伯人中第一个把字母排列顺序改用印度数字排序的人。西方学者引用他的方法，取代了繁复的罗马数字，使运算大为简便。这对西方人的生活与思想，包括从纯数学到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花拉子密还系统阐述了代数学和几何学，发明以代数符号解题的方法。他的代表作《积分与方程计算法》，至16世纪，一直是欧洲数学教育与研究的参考书。阿拉伯人还研究了面积、体积，如何计算三角、四角锥体和圆锥体，他们算出圆周率为 3.141596535898732 。在三角学中，首先使用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弦、余弦及其相互间的函数

关系，使三角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依据欧几里得的原理，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并将几何学原理运用于建筑学。

在天文学方面，阿拉伯人主要依据印度重要天文学著作《西德罕德》和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所著《天文学大成》。在各地设立天文台，使用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进行观测与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他们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论证了地球是圆形体、地球自转以及潮汐与月球运动的关系，对托勒密的天文学名著详加考订正误。通过对子午线的长度进行实地测量，推算出地球的圆周二万多英里。还创造了太阴历和太阳历，分别用于宗教仪式和农业生产。著名天文学家巴塔尼（约卒于918年）编制的“萨比天文表”被译成拉丁文和西班牙文，他修正了太阳轨道和某些行星轨道计算的方法，从理论上证明了发生日环蚀的可能性。比鲁尼（约卒于1048年）的著作《古代遗迹》记述和研究了古代各国人民的历法，《马苏蒂天文典》为一部天文、数理、地理学百科全书。其他著名天文学家还有花拉子密（760—850年）、艾布·马沙尔（788—886年）、苏非（？—986年）等，皆闻名遐迩。

在医学方面，穆斯林继承和发展了希腊、印度等民族的医学遗产，注重翻译医学名著，创建发展医学院校，开设药剂工厂，将正确的医疗方法及有益的处方编辑出版。对眼科、伤寒、霍乱、天花、麻疹等疾病，较早地总结出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法。许多穆斯林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从事医学研究，拉齐（865—925年）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古希腊名医），一生著述极丰，有《天花与麻疹》、《精神疗法》、《医学集成》等论著，总结了希腊、波斯、印度等先人的医学知识，也记录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哲学大师兼医学家伊本·西那（拉丁名为阿维森纳980—1037年），对人体生理、病理有精深的研究，在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物运用方面成就极大。他的《医典》约百万字，书中研究了760多种药物的性能，是阿拉伯文医学杰作，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对欧洲医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波斯名医阿巴萨德·达威亚著有《综合百科全书》，是当时医务工作者的常备手册；安达卢西亚宫廷医师阿布·卡希姆（卒于1013年）编著了巨型《医学手册》30篇，他在外科手术方面极为著名；阿里·本·阿巴斯（卒于994年）为第一位药书编写人，植物和草药学家伊本·比达尔（卒于1248年）走访各地，采集研究植物特点，所著《草药集》包含有1400多种草本植物的药用。伊本·祖赫尔（1091—1161年）的《医疗之便利》和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医学纲要》等进一步总结和丰富了阿拉伯的医学文化遗产。

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以航海贸易活动著称于世，他们的足迹遍及亚非欧各大洲，为地理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艾布·宰德·巴勒希（？—934年）的《区域志》、伊本·赫盖勒（卒于977年）的《省道记》、麦斯欧迪（900—956年）的《黄金草原》等都是早期的地理学著述。12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和制图家伊德里斯（1100—1166年）写有《旅游漫记》，地理学家雅古特（1179—1229年）的名著《地名辞典》被誉为百科全书，艾布·菲达（1273—1331年）的《地理辞典》是又一部杰作。著名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曾四度赴麦加朝觐，游历亚非许多国家，行程十二万公里，并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分来过中国。其不朽之作《伊本·白图泰游记》是研究当时中亚、北非、印度、中国等地区和国家社会风情的重要资料。

在物理、化学和光学等方面，阿拉伯物理学家所列各种物质的比重表数据与现代数据极为接近。是他们最早发现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快。物理学

家伊本·哈赛姆（965—1038年）著有《论光学》，纠正了希腊科学家认为光线是从眼中射出的错误，提出物体上的光线反射入眼中才产生视觉。他对光的反射、折射问题，日蚀、月蚀、彩虹等自然现象也有研究。阿拉伯人还利用物理知识和力学原理制造杠杆、天平、水钟、自动供水机和机械玩具等。在化学领域，穆斯林的决定性作用是完成了从炼金术至化学试验的过渡。最先发明了蒸馏、溶化、结晶、升华等方法，能制造硫酸、硝酸、氢氧化钠、氧化汞等多种化合物，并将化学运用到金属提炼、皮革与纺织印染、玻璃制造、造纸等项工业技术上。著名化学家伊本·哈彦（8世纪后期）被称为“化学之父”，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对欧洲化学界有很大影响。

穆斯林还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伊斯兰各国，并传至西方，使西方文化有了发展和复兴。

阿拉伯人高举科学的旗帜达数世纪之久，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30. 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伊斯兰教对文学与艺术的影响

阿拉伯的文学艺术丰富多采，有优美动人的文学作品、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还有宏伟壮丽的伊斯兰建筑以及独具一格的绘画、书法等艺术，音乐如璀璨的明珠，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放射异彩。

早在伊斯兰教前，阿拉伯半岛繁荣的集贸市场上，总有各部族的诗人和演说家来此聚会，吟诗赛歌，展示文采。著名的七首“悬诗”（又称金水诗，据说用金水书写在麻布上，悬挂在麦加克尔白的墙上）就是当时诗赛中当选的佳作，流芳百世。早期的诗歌以描绘大自然的美景，歌颂豪侠勇敢的气质和坚贞不渝的爱情为主题。倭马亚朝时又出现了政治诗，或赞颂统治者，或嘲讽时局和社会现实。至阿巴斯朝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诗歌创作大有进展，名家荟萃。宫廷诗人艾布·努瓦斯（757—814年）以饮酒歌为主要题材，反映统治阶级的生活与思想。文坛巨匠查希兹（775—868年）创作了《动物集》，集民间传说、警句、格言、谚语、神话、笑话及风俗习惯于一体，成为包罗万象、妙趣横生的文学佳作。穆泰奈比（915—965年）是自称有预言才能的叙利亚诗人，他的诗以歌颂战斗生活、富于生活哲理而著称。10世纪，阿拉伯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优美的散文诗——《麦嘎麦》，语句押韵，体裁新颖。它由白迪阿·宰曼尼·哈姆丹尼（976—1007年）始创，至哈利利（1054—1122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其名著《麦嘎麦特》（《韵文故事集》）几百年来倍受欢迎，成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重要文献之一。阿拉伯诗歌的题材常常与宗教思想相结合，如艾布·阿塔希亚（748—825年）的大部分诗歌以苦行厌世为主题，有宗教和道德教诲的色彩。苏非思想家伊本·阿拉比（卒于1240年）及埃及诗人伊本·法立德（1181—1235年）的诗作，都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人主合一的神秘主义意境。埃及大诗人蒲绥里（1212—1296年）的诗篇《布尔德》（又名《斗篷颂》）叙述了作者梦见先知穆罕默德给他披上一件斗篷，从而奇迹般地治愈了他的瘫痪症。在颂扬先知之中，表达了苏非的思想与情感。

除诗歌外，民间故事也是阿拉伯文学的重要组成。最著名的《安泰拉传奇》是阿拉伯人早期部落生活的真实写照，被誉为阿拉伯的《伊利亚特》（古希腊史诗），在东方穆斯林世界广为流传。《卡里莱和笛木乃》为寓言童话

集，借禽兽之言，抒发哲理。波斯穆斯林文学家萨迪（1209—1291年）所著《古力斯坦》（汉译本名为《真境花园》）是一部诗文相间的佳作，寓宗教哲理于生动有趣的故事当中，并附有格言式短诗，警喻世人。中世纪阿拉伯文学的瑰宝，当推《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它汲取波斯、埃及、伊拉克、印度等国的文学故事为素材，经过数百年的加工、修改和补充，至16世纪最后编定。书中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众多的主人公笃信安拉、顺从主的旨意，因而获得勇气和力量，从而化险为夷，出现奇迹。字里行间体现出对伊斯兰教及其精神的弘扬。该作品自18世纪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之作。

在文学方面，最值得推崇的是《古兰经》，它是宗教经典，又是优秀的散文杰作，读起来抑扬顿挫，富于感染力。不仅是修辞学方面的奇迹，又是研究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政治制度的可靠依据。

在艺术领域，穆斯林创作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民间手工艺品，精美的地毯、陶器、玻璃制品、金银宝石首饰、贵金属镶嵌、象牙雕刻等等，显示了阿拉伯人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巧。

宏伟壮丽的清真寺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最高体现，巍峨的圆顶、高耸入云的尖塔、宽大的庭院、华丽的厅堂，以及精巧的弓形架构为清真寺群体建筑的特征。各地的宫殿、城堡、陵墓、学校、公馆、旅店等建筑物也反映出穆斯林高超的技艺和自然科学成就。

在手工艺品、建筑物、织品饰物及书籍装璜方面，穆斯林喜爱用花卉、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和阿拉伯字母雕绘出各种优美的花纹。特别是用各种字体的书法抄录的《古兰经》或先知的格言，与装饰华丽的图案浑然一体，成为广为流传的一种伊斯兰艺术形式。

阿拉伯人也非常喜爱音乐，伊斯兰教前已有商队歌曲、战争歌曲、宗教歌曲以及情歌、颂歌、挽歌、节日喜庆歌等，配之以方形手鼓，长笛、芦管、双簧管等民间传统乐器。游吟诗人们也常常写诗作曲，使诗歌和乐器得以发展。早期伊斯兰教神学家曾视音乐为信仰上的禁条，但随着伊斯兰教对外征服的胜利和财富的积累，社会风尚从质朴渐趋高雅，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对音乐喜闻乐见。从倭马亚朝起，音乐艺术普及流行，在阿巴斯朝的文化复兴时代，希腊、波斯和印度音乐的影响使阿拉伯的音乐理论家获益非浅，出现了许多乐理学家及有关乐理的专论专著。伊斯兰教正统派思想家安萨里也有这方面的论述，从而使音乐对苏非派的仪式起了重要作用。阿拉伯音乐对中世纪欧洲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31. 丰富独特的社会科学——伊斯兰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与被征服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相结合的同时，穆斯林不仅创造出绚丽多采的文学艺术和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同时也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科学。以他们独特的见解、新颖的思想，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和贡献。

穆斯林的史学，最初是以记载穆罕默德及其弟子们的生平与事迹为主，后又出现了编年史和人物传记。如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约768年）的《先知传略》记述了伊斯兰教早期的征战。后经伊本·希沙姆（？—约834年）校订，成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的重要著作。瓦基迪（？—约823

年)的《武功记》着力于早期伊斯兰教战役和远征史的研究。另一位记述伊斯兰教征战史的史学家伊本·阿布杜·哈克木(?—876年)的著作成为穆斯林征服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最早文献之一。波斯人巴拉祖里(?—892年)的《贵族家谱》和《各地的征服》，分别描述了伊斯兰教第一世纪的历史及阿拉伯帝国各行省的史况。雅古比(?—891年)的《列国志》是阿拉伯较早的历史地理学著述。

阿拉伯编年史的鼻祖是塔百里(838—923年)，他倾注了40年时间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神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其宏篇巨著《历代先知和帝王史》以编年体裁记述了从创世纪直至公元915年的历史。后辈史学家伊本·艾西尔(1196—1231年)的《历史大全》就是在此基础上又续写至1231年。伊本·艾西尔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莽林丛狮》记录了穆罕默德的7500位弟子的列传。以“阿拉伯的希罗多德”著称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是第一个用记事体编写历史的人。他的不朽名著《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内容除阿拉伯古代史外，还涉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自然科学、宗教和哲学。其后，艾布·菲达(1273—1332年)、载海比(1274—1348年)对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传记作家伊本·赫尔康(1211—1282年)的《名人录》，记述了865位穆斯林名人的生平。贾巴尔·库图比·哈勒比(?—1363年)撰写的《名人亡灵录》，包括有506位人物的传记。大马士革史学家萨法迪(1297—1363年)的27卷宏伟传记，囊括了有史以来的14000名人物的生平介绍。

中世纪中最杰出的穆斯林史学家应推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他的传世之作《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表述了他的史学观点，认为历史的对象应是社会生活，自然条件和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等因素对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他因此而成为阿拉伯新的历史科学的创始人。

在哲学领域，阿拉伯人的主要贡献是将希腊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原则和观念相互协调，使一切外来成分适合自身的特性和需要。早期哲学以讨论真主问题为主，出现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阿拉伯最早的神学——哲学派别穆尔太齐赖派。而后，艾什尔里将理性主义观点纳入正统信仰，创立了官方神学派别穆太凯里姆派。在安萨里的努力之下，正统教义学又与苏非思想相结合，最终形成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而真正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则具有强烈的世俗倾向，尽力把神学排斥在外。如肯迪(796—873年)、法拉比(870—950年)、伊本·西那(980—1037年)、伊本·巴哲(?—1138年)、伊本·图斐利(1100—1185年)和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等。他们多为自然科学家和医生，重视经验知识，推崇理性。其中，伊本西那和伊本·路西德在哲学上的成就最高。伊本·路西德以接近唯物主义的观点评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大胆提出“双重真理”说，认为哲学和科学的真理同宗教的真理并存，哲学与伊斯兰教义没有分歧。他还认为宇宙万物及其运动有自身的规律，并不受神的支配。他还提出应该根据社会的性质及其文明的程度来制定法律，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法律都是不同的，不存在什么适合一切时代的永久性法律。他们的哲学思想和重要论著传入西欧，促进了欧洲中世纪文化和哲学的发展。

阿拉伯语言学的研究随着宗教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对《古兰经》的诵读和理解，推动了阿拉伯语言学和语法学的研究，也促进了阿拉伯辞典编

辑工作的开展。语言改革的前辈艾布·艾斯瓦德·杜艾里（？—688年）用古叙利亚语的规则统一确定了阿拉伯语语法，为非阿拉伯人掌握《古兰经》的语言提供了方便。国家的文件往来、教义宣传、以及新的扩张运动需要传递信息或颂扬英雄的战绩，因而演说与带有韵律的散文兴起，代替了原来的诗歌形式。哈利利·本·艾哈迈德（？—约786年）在前人基础上首创阿拉伯的韵律学。8世纪末，巴士拉学者波斯人西伯威息（？—约796年）正式编著出第一部完整的阿拉伯语法学著作。而后，阿拉伯语不仅作为宗教语言，也是学术语言和社交语言，从波斯语和其他外来语中吸收了大量新词汇。又通过对希腊、波斯、印度科学和哲学著作的翻译运动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科技与哲学术语。由于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阿拉伯语对欧洲语言以及非洲其他地区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语言都有一定影响。

132. 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传播，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同时进行。穆罕默德去世后，麦地那的哈里发政权在平定半岛反叛势力之后，开始大规模对外征战，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至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661—750年），穆斯林的军队攻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西进埃及（640年），消灭了波斯萨珊王朝（642年）。至8世纪初，阿拉伯人已征服中亚大部地区、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征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十年间征服了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在阿拉伯半岛之外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大帝国。最先征服的这些地区现在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

伊斯兰教伴随着征服的胜利而成为阿拉伯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民族宗教演变成世界宗教。它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是，阿拉伯人在征服后，保留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行政制度，没有破坏；对异教徒只苛以赋税，而不强迫改宗。与拜占庭或萨珊帝国的苛政相比，他们的统治容易接受。加之伊斯兰教义简单易行，没有繁琐礼仪和教阶制，提倡平等和朴素的道德，许多非阿拉伯人被新宗教所吸引，自愿皈依，并积极参与各宗教学科的建设，共创伊斯兰文化。

阿巴斯王朝灭亡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已四分五裂，已不能凭借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此时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穆斯林商人、学者交往、移民、通婚，以及苏非派传教师的活动再度得以传播。西非、东非及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即是如此，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

今天，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近十亿。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伊斯兰国家有40多个，主要集中于亚非地区。在欧洲、南美和北美等地仍有穆斯林少数民族。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在当今最有活力，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对民众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是不容忽视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

133. 伊斯兰教在中国

在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保安、撒拉和东乡族。其中回族散居全国各地，其他九个民族都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始于唐宋时期。当时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已有直接往来。公元 651 年，大食国（中国史书对阿拉伯的称呼）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遣使来华，史学家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标志。其后的一百四十八年间，来华的正式使节见于记载的有三十七次之多。他们向唐朝介绍阿拉伯国家情况和伊斯兰教义习俗，唐朝廷对他们也是优礼相待，有的使节还被封以官职。

贸易方面，西北陆路上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长途跋涉，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海上交通，来华的航队扬帆万里，历尽艰险，从波斯湾、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驶向我国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通商口岸，其中以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居多。他们带来大量珠宝、象牙、犀角、药材、香料，又带回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药材，故这条航道有“香料之路”之称。

8 世纪中叶，唐肃宗曾借大食兵平定“安史之乱”，平乱后一些大食兵落籍中国。而此时来华的穆斯林商人也日渐增多，其中不少人留华不归，与当地汉人通婚，他们的聚居区被称为“蕃坊”，建有礼拜寺和公共墓地，有自己的宗教与生活习俗。其后代逐渐成为中国的穆斯林。

宋代来华的穆斯林有增无减，且多具有较大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势。大食商人朝贡进奉者之多，国库空虚的南宋从港口对外贸易中获得相当的岁收。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10 世纪中，我国五代、北宋之际，统治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哈拉汗王朝的苏托克·布格拉汗首先接受伊斯兰教，尔后进一步推行伊斯兰化，用暴力使汗国的全体居民改奉伊斯兰教。至 15 世纪末，扩及全疆。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建立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在征服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各族人被调集参加忽必烈对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分驻各地，屯田农耕，有的成为工匠和学士，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有定居在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地。由于西亚、中亚诸国均属蒙古帝国管辖，因而西北“丝绸之路”与海上“香料之路”通畅无阻、空前繁荣，来华之穆斯林远胜于唐宋时期。商人、学者、传教士、达官贵人、旅行者等不同职业的人纷至沓来，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各大城市留住下来。故史书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元代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有较大实力和影响。从中央到行省各地方的官职都有穆斯林充任。如阿拉伯人后裔赛典赤·赡思丁，子孙三代都居高官。城市中有擅长经营的“回回”富商大贾，散居农村的“回回”已建立起以农为主的经济生活。穆斯林中更不乏学识渊博之士，他们在天文、历法、医药、建筑、火炮、工艺、诗画、经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由于穆斯林曾积极参与了元末人民起义和反元斗争，所以明朝开国以来对伊斯兰教取宽容政策。任用穆斯林上层为统治者服务，并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只许“回回”与中国人结婚，不得在本族中自相嫁娶，致使回回人口大量增加，回族正式形成。13—17 世纪，我国的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些民族的祖先原属中亚的突厥族和蒙古族人，迁徙至青海、甘肃一带后与当地藏族、回族、汉族人长期共同生活、通婚后形成的。

明代穆斯林的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农村，回族内部有了地主和农民之

分，城市中有富商大贾、达官贵人与平民和普通手工业者之分；穆斯林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教长兼地主的寺院经济。同时由于商业经济发展，一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穆斯林文化和宗教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也从国外传入，影响日增。

至清代，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压制政策，设立乡约制度，由一乡的首脑具体担保和监督穆斯林的行动。伊斯兰教各民族内部阶级分化更加明显，地主阶级、宗教上层相互争权夺利，导致教派分野，西北地区出现了门宦制度即教主兼地主的政教合一制度。教主自称是神人，是教徒与真主接近的媒介，他们管辖各个教坊，权力世袭，教主死后的葬地建筑“拱北”（圆顶墓），要教徒加以朝拜。这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与我国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一种道门。内部等级森严，并分成许多支派，如“哲合里耶”（朗诵派）、“虎非耶”（默读派）、“嘎迪里耶”、“库不利耶”派等。在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回族聚居区还出现世袭伊玛目制度，是封建宗教上层分子与官僚、土豪共同操纵清真寺大权，压迫信教群众的封建制度。由于穆斯林处境远不如前代，故清统治三百年间，在云贵、陕甘、新疆爆发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人民的起义和反清斗争接连不断，具有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性质。

明朝后期实行海禁，来华穆斯林减少，清朝封建统治者又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因此中国穆斯林以经堂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宗教教育制度应运而生，培养宗教职业者以自立图存。一批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义进行汉文译著活动，介绍阿拉伯各国文化。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先后问世，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哲学得以创立。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再度受到限制，但穆斯林知识分子为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纷纷办学堂、创刊物、出版书籍，多种汉译《古兰经》相继问世。伊斯兰教各类社会团体与学术机构也逐渐增多。特别是伊斯兰教新式教育得以倡兴，30—40年代，穆斯林兴办的学校先后派出留学生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形成明末清初后我国伊斯兰宗教学术文化的第二次高潮。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元代传入有阿拉伯天文历算之学与天文仪器，明代回回历与中国历法共同沿用近四百年。元大都（北京）和上都（内蒙图伦附近）均设立回回药物院。波斯文药典被译成汉文，并在明初出版发行。与此同时，我国的造纸术、炼丹术、指南针、火药、脉术、印刷术等被阿拉伯人采用，又介绍到西方。明朝太监、著名穆斯林航海家郑和曾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走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并绘制了麦加“天房图”。为中阿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我国史籍中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情况的文献是唐代杜环的《经行记》，我国最早的《古兰经》通译本是李铁峰的《可兰经》（1927年北平版）。以后是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1932年北平版）、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1943年北平版）、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北平版）等。以中国知名学者马坚的《古兰经》通译本（1981年社科出版）为最新、最普及之作。我国较早的清真寺有广州怪圣寺、西安化觉寺、泉州清净寺、杭州真教寺、北京牛街清真寺和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其建筑风格一般为中国宫殿式、也有阿拉伯尖塔圆顶式。

目前中国全国性的伊斯兰教团体是1952年创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其宗旨是团结各族穆斯林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加强同各国穆斯林的

友好联系。在培养宗教学者和人才，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34. 伊斯兰教的发展

自 19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控制了伊斯兰世界的广大地区之后，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影响逐渐渗入到伊斯兰教的传统社会当中，面对这种威胁和挑战，穆斯林知识分子和部分宗教学者开始思考伊斯兰教向何处去？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如何发展？

他们共同的观点来源于 13 世纪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的“先辈派”学说和 18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思想。认为只有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纯洁的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生活的楷模。而中世纪以后形成的伊斯兰教法及制度违背和扭曲了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要使伊斯兰世界得到复兴，恢复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光荣，就应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修正中世纪正统教法学家的传统见解及各种错误意见，以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作为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判断是非、衡量取舍的标准。但并不要求将社会完全返回到 7 世纪穆罕默德所生活的时代，而是托古改制，通过复古的主张进行宗教与社会改革，使伊斯兰教重新具有活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对如何进行宗教与社会改革？改革的出路在哪里？伊斯兰教内部有不同的思潮和倾向。

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 年）、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 年）和塞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98 年）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提倡科学和理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改革伊斯兰教育制度，改造穆斯林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并改革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伊斯兰教法。认为现代科学、哲学以及理性、正义、平等原则乃至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并不矛盾，可用来服务于伊斯兰教信仰和穆斯林社会的进步。

20 世纪，埃及的阿里·拉兹克（1888—1966 年）和伊朗的阿里·沙里亚提（1933—1977 年）将现代主义思想推向更加激进的世俗主义，主张政教分离，改变传统的宗教与社会制度。指出所谓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完全是一种世俗的政治体制，并不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现代穆斯林各民族有权选择政府的形式，废除哈里发制度，改革伊斯兰教法并将其从国家法律中排除出去，这并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还提出早期的伊斯兰是革命的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而现存的伊斯兰已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制度。坚持早期伊斯兰教的价值与原则，只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并不意味着建立宗教的或神权的统治。现代社会的领导责任只能由人民选举优秀分子来承担，宗教学者并不具有特殊地位。这种政教分离的主张引起正统派宗教学者的强烈反对。故而又出现了抵制世俗化运动、为伊斯兰传统辩护的新传统主义倾向。

叙利亚宗教学者、现代主义思想家拉希德·里达（1865—1935 年）认为，改革的出路不是盲目引进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而应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政治实践为理想蓝图，建立现代伊斯兰国家。哈里发是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国家的治理采用协商原则；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的政治基础，但不是实行中世纪以来教法学家制订的条文，而应是《古兰经》、“圣训”和早期穆斯林公社的实践所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建人哈桑·巴纳（1906—1949 年）也坚持认为，伊斯兰教的衰落不在于伊斯兰教本

身，在于盲目因袭中世纪形成的伊斯兰教法与教条，应回到早期伊斯兰教中去。因为它是一种完美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可以解决人类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所面临的问题。关键是通过建立伊斯兰教国家，才能实现伊斯兰教理性、正义、民主、平等的原则。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用教法及其体现的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但并非不加创新地固守传统的教条，而应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灵活运用教法的原则。尤其反对传统宗教学者在解释教法方面享有特权。

新传统主义的任务是对正统宗教学者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进行批判，拯救和改造处于没落和停滞状态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又要抵制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避免伊斯兰教在西方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冲击下瓦解。它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所奉行的道路和目标。

与此同时，坚持和固守传统宗教制度的伊斯兰传统主义思想也从未泯灭。它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巴基斯坦宗教学者毛杜迪（1903—1979年）。他解释伊斯兰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以真主为最高主权者和立法者。真主的权力由哈里发、伊玛目、艾米尔（穆民的长官）来行使。在实行教法方面，宗教学者占有特殊地位，他们是教法的解释者和监护人，辅助统治者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他的这些思想被当代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1902—1989年）所实践，反映了什叶派传统主义思想。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教是包含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制度，伊斯兰教法是解决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指导和标准。只有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穆斯林社会才能进步和富强。因此需要由精通教法和教义的专家即教法学家承担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责任，建立由教法学家和宗教学者个人或集体领导的政府，行使真主授予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绝对服从这种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共和国”，正是由什叶派教士独掌大权的宗教政治制度，霍梅尼本人则是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国家元首。

伊斯兰传统主义维护传统教法权威和神职人员的特权地位，代表了与传统宗教制度联系最为紧密的宗教学者阶层的要求，对当代一些穆斯林国家推行官方伊斯兰化运动具有很大影响。

在众多的思潮和倾向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主流。不论传统主义还是新传统主义，政治纲领及改革的途径方式虽不同，但都以建立完全的伊斯兰国家为最终目标。以加强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为准绳。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社会的侵略和渗透，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政府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本世纪20年代兴起的“穆斯林兄弟会”揭开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序幕，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又把这种运动推向了高潮。另外，阿富汗的“圣战者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号召党”等，都属于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主张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治秩序，当代中东地区的许多暴力事件与这些组织有关。有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主张以和平方式达到建立伊斯兰社会的目的。40年代由毛杜迪在巴基斯坦建立的“伊斯兰促进会”就强调穆斯林严格律己，按伊斯兰教法行事，通过宣传、说服、甚至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方式逐步使社会“伊斯兰化”。在当今伊斯兰世界面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危机的形势下，原教旨主义成为伊斯兰教内部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和手段。

除原教旨主义以外，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在当代也得到部分实践。阿富汗尼在 19 世纪时曾提出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全世界穆斯林拥戴一个共同的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大帝国，以对付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但这种主张过于强调宗教的共同性，在阶级和民族矛盾日益增长的时代，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封建君主，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最终难以实现其目标。

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泛伊斯兰主义，不再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和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大帝国。只强调全世界穆斯林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提倡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广泛联系与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摆脱西方控制，促进伊斯兰各国的繁荣与发展，复兴伊斯兰教事业。为此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1926 年成立）、伊斯兰世界联盟（1962 年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1970 年成立）。80 年代以来，又出现各类国际性、地区性伊斯兰组织机构，如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新闻通讯社、伊斯兰国家广播电视组织、伊斯兰发展基金会、伊斯兰教科文组织等。

在发展道路上，20 世纪 50—70 年代，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源自阿富汗尼等一些主张宗教与社会改革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穆斯林兄弟会的部分领导人对此也有论述。主要强调伊斯兰教有关公正、平等的社会主张与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伊斯兰教所讲的平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途径来实现。因而一些奉此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曾采用国有化、土改和合作化、计划经济、公费医疗、兴办公共福利事业等措施，其目的旨在发展民族经济、发扬传统文化、争取社会正义、平等和共同富裕。这种思潮又是多种意识形态复合的产物。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基础，强调伊斯兰特性和尊重固有的伊斯兰传统，是一种宗教的社会主义。被称为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国际理论”。近一、二十年来，在实践中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还在摸索和调整之中。

当今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具有活力，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原教旨主义作为伊斯兰教思想发展的主流，一直被列为令人瞩目的国际性问题之一，值得长期探讨和研究。

135. 安第斯山区的太阳神崇拜——印加宗教

印加人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源自安第斯山中部的库斯科谷地，属于克楚亚部族。12 世纪，印加人建库斯科城堡为首都。13 至 14 世纪时，势力日强，逐渐向外扩张。至 15 世纪中叶，印加人几乎征服安第斯山区的所有部落，建立高度集权的、强大的国家体制。印加帝国的势力范围，北起今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南境，南至今阿根廷的图库曼和智利中部，长达 4800 多公里；西起太平洋，往东深入亚马逊森林，包括今秘鲁和玻利维亚。

在印加的官方祭祀中，对太阳神印蒂的崇拜居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太阳神被视为促使禾稼成熟者和农作物的保护者，印加王族的祖先。首都库斯科的太阳神庙，是主要的宗教圣地。神庙由岩石构筑，中央大殿用金砖砌成。太阳神偶像是一个硕大的金制日盘，周为光束，中为人面。君主称“印加”，即为太阳神之子以及该神的最高祭司。神庙还供奉司雷电和气候的男神，掌

礼仪、历法的月亮女神，以及其他诸星为神灵。其中有的神被认为专管人间某些特定事务，或主宰某些特别用途的动物。印加人还崇拜去世诸王的木乃伊，认为其具有超然的神力。

印加人力图将他们的太阳神崇拜与各地原有的古老神灵相联系，从而产生一位无名的高位神，被认为是其他诸神和一切活物的创造者，但已将权力交给其他诸神而退隐。它有许多称号，主要称号是“维拉可卡”。15世纪时，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对它的崇拜在贵族中流行。它被称为“世界之尊师，普天之最足智多谋、年高德劭之尊长”，是远古的文化英雄，印加各部落的创造神。因为它是一切权力之源，故无需建神庙、设圣地，仅有一人形金像。祈祷时，常向它献上第一篇祷词，然后依次对日、雷、月、星及地母、海母祈祷。其主要崇拜中心，在古代文化的发源地蒂亚瓦纳科。

祭祀都在室外进行。神庙只是神像居处和法器储存处，以及祭司和“特选的妇女”住所。参加祭祀者要洁净其身，常常伴以认罪、悔改，在活水中沐浴等活动。祭典以供奉牺牲为主，祭品常为骆马、豚鼠和伊拉麻果（一种热带果品）。新王（“印加”）登基或重大出征时，则举行人祭，常以神庙特选的妇女为祭品，有时也用她们的幼儿或战俘作牺牲祭神。祭司的等级分明，有完善的教阶制度，并参与政治活动。大祭司为终身制，掌握实权，可婚娶，其下各级祭司由其任免，兼任各地官职。各地设有祭司学校。特选的妇女自幼选入神庙培养，成年后或作君王贵族妻妾，或留居神庙服务，需要时则作祭品献神。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后，印加宗教和文化发展同归渐灭。

136. 源远流长的犹太教

犹太教属世界宗教最古老的一神教，起源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的近东地区，其信徒称犹太人。尽管犹太教的信徒相对而言并不多，但犹太教对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便在今天，犹太民族及其国家以色列在世界政治与文化舞台上仍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而犹太教则是认识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的主要背景知识之一，因此，了解犹太教不仅将有助于认识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且还有益于理解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演变和发展。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原属游牧部落民族，后定居迦南（今巴勒斯坦），开始向当地的迦南人学习务农，逐渐形成农牧社会。据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了防止希伯来人被迦南人同化，曾四处游说称部落神耶和华为万能之神，而耶和华则视希伯来人为其“选民”，还和他们订了“圣约”，赐福保佑他们。为了增强犹太人氏族的凝聚力，得以在颠沛流离的游牧社会生活中保持氏族的团结统一，在农牧社会中自立生存，亚伯拉罕首先提出以信奉耶和华为唯一神的宗教信仰，成为犹太教宗教信仰的创立人。犹太人传说的另一位民族英雄摩西，在公元前13世纪曾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摆脱了埃及法老的残酷压迫，在沙漠中长途跋涉达40年之久，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奔向那“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迦南。途中登上西奈山，领授由耶和华传授的十条戒律，即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戒”。其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宗教信仰：要信奉耶和华为独一至神，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其二为宗教伦理：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他人的一切。摩西为了解决犹太人的苦难，试图建立一种公正的人类社会，同时也为了锤炼犹太人氏族用以抗衡异族强权欺压的坚韧毅力和持久不衰的耐力，提出以道德伦理来拯救其民族的思想，成为犹太教道德伦理的奠基人。后来的犹太教律法便是以摩西十戒的伦理原则发展形成的。从此，犹太教便在西奈半岛诞生。在犹太教早期的创立和发展史中，曾有很多杰出的人物做出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如大卫王创建并完善了犹太教的礼仪教制。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等。

弱小的犹太民族尽管在长达 3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饱受各种异族强权势力的奴役欺压而未泯灭消亡，反之却顽强生存，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传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惊人的贡献，犹太教——犹太民族的认同不能不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教不仅开创了世界宗教一神教的先河，对继之而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先后曾起到过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其他诸多领域如哲学、思想、艺术、科学与医学、文学、教育、音乐、电影及戏剧等，都曾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做出卓越的贡献。

犹太教首创的一神教思想，成为继之而后产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一神教的教义核心或基础。犹太教对世界宗教的头一个主要的贡献，是其首创的一神教思想。尽管一些古代宗教在犹太教产生前亦曾有一神教观念，但它们所想象的一神却缺少犹太人一神的某些特征。以色列人的一神即上帝所独具的特征，包括：（1）他是超验的，也就是说他超脱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他甚至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2）上帝是万有的。他没有时间、地域或人文环境的局限，他无所不在。（3）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4）尽管上帝超脱于他的造物，但与其又有连带关系，上帝是自然演变和人类发展的操纵者。他的意志通过自然现象诸如良田沃土或自然灾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政治与军事的历史得以显现。此外，他还惩恶扬善，是人类行为的终审法官。

犹太教对世界一神教的第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在宗教道德与伦理方面。大多数我们通常认可的有关基本的人类的权利与责任、伦理行为和正义的准则，最初都源自于摩西十戒。譬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人们有思维能力和意志自由对于行动作出抉择。不仅如此，人们还有责任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因为这是人类存在的目的。做出有悖道德的错误抉择或逃避生活中的道德挑战，都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些道德思想之所以在世界很多民族的人们当中成为共识并得以广泛应用，原因在于它们最初是由犹太人表达上帝意欲实现一种公正的人类社会的信仰而提出的。

对世界宗教的第三个重要的贡献，是有关为自己社团服务的思想。犹太教教导人们，要对得起上帝赋予的生命，也就是说上帝寄希望于人的这种造物能有所回报。善行传统和在教育、卫生健康及政府各部门的或任何一种社团工作的“上乘表现”，对犹太教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传统也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犹太教对以后的世界宗教还产生很多其他的影响。基督教的很多基本教义和思想，诸如救世、末日审判、启示、个人祈祷、祈祷仪式、精神净化等等，都直接源于犹太教。《圣经》思想也源自犹太教，《希伯来圣经》成了基督教《新约》的一个来源。尤其是《新约》的《福音书》借鉴了很多《希伯来圣经》的预言。基督徒亦将《希伯来圣经》视为神圣，并相信它预示了载于《新约》中的基督生平的很多事件。犹太教无疑对伊斯兰教亦曾产生过

很大影响。不仅《古兰经》与犹太教有渊源关系，伊斯兰教的把斋及教法也是以犹太教的模式为基础的。此外，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基本结构设计，也是借鉴于早期犹太会堂的建筑式样。伊斯兰教的公众祈祷仪式和他们的祈祷程序，也都与犹太教的类似。

137. 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

犹太人不仅指的是一种宗教群体，而且指的也是生活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的一种文化群体。四海为家的犹太人总是参与他们所居国家的广泛的文化与政治生活，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自 1911 年以来，全世界先后曾有近百名犹太人后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诗歌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和生理学奖。

早在古代和中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在吸收古希腊和其他外来文化基础上，曾在自然科学各领域获得长足的进展，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人（主要是西欧）却步履蹒跚，落在其后。而当时的这种欧亚大陆的文化差异，正是靠以四海为家的犹太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才在中世纪逐渐得以弥补。他们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将阿拉伯人的文化瑰宝介绍给欧洲人，填补了他们的文化空白和差异，促进了西欧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为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从 9 至 13 世纪，犹太人凭借其在异族间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优势，曾大量将阿拉伯人的科学著作译介给西欧。10 世纪起，在俄玛亚哈里发王朝的开明统治下，在巴比伦、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特别是西班牙南部柯多瓦王国以色列人聚居中心，曾汇聚众多学识广博的犹太教士。由于犹太教自身特点所决定，他们不仅集宗教信仰和人文知识于一身，而且犹太人的四海为家的民族特点还决定了他们往往都通晓数种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在 12、13 世纪的西班牙，由于卡斯底国王的支持，曾以托莱多为中心组成专门翻译介绍阿拉伯学术著作的学院。另外在法兰西西南部的普罗旺斯和南意大利也分别建立了翻译介绍古希腊与阿拉伯学术著作的中心。在托莱多中心的犹太教士一般都通晓阿拉伯文和卡斯底文（西班牙语一支），而希伯来文又是其母语。由于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有相近之处，因此常用希伯来字母拼写阿拉伯语，形成犹太—阿拉伯文。这样，在将阿拉伯文学学术著作特别是天文学和代数学著作翻译成西班牙文时，遇到欧洲语言中无对应词汇时便可借用这种犹太—阿拉伯文作为外来语。这些生活在欧亚大陆区域之间的犹太教士兼学者，不仅通晓异族的语言，还熟悉异域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譬如拉丁文化、阿拉伯文化、拜占庭文化及自身的犹太文化传统等。这类文化传统知识一方面有益于他们成功地进行异族异域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促使了文化的相互繁荣和发展，特别促进了 12 世纪西欧已经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对 13 世纪西欧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德国学者大阿尔伯特及其学生汤姆斯·阿奎那的思想都有重要影响，为 14、15 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38. 犹太教——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源泉

《希伯来圣经》包含了很多对艺术与建筑、特别是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

这表明以色列人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都曾具有丰富而悠久的艺术传统。数百年来，在伊拉克、摩洛哥、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美国，都先后修建了很多著名的犹太会堂建筑。但是这些建筑设计大部分反映了所在国家的宗教或民族建筑风格，比如大多数 19 世纪的美国犹太会堂，都是按照希腊式、罗马式和哥德式建筑设计的。近些年来，开始尝试兴建试图反映古代犹太建筑风格的会堂，如在美国堪萨斯城建成的帐篷式样的美丽的犹太会堂。

在绘画与雕刻艺术方面，《希伯来圣经》的故事题材和犹太人的颠沛流离的曲折生活经历，都曾激发过犹太和非犹太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中世纪以来在西方修建的大教堂，都大量装饰取材于《希伯来圣经》的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著名雕刻家和画家米开朗琪罗曾雕刻了《摩西》和《大卫》的不朽塑像，并创作了以《圣经》传说为题材的西斯廷教堂的精美绘画。伦勃朗亦曾受《圣经》传说的启发，创作了《大卫与扫罗》、《犹太新娘》等绘画精品。文艺复兴时期的非犹太人艺术家借鉴《希伯来圣经》人物传说及欧洲的犹太人生活经历进行艺术创作不乏其例。生活在世界很多国家的犹太艺术家，不仅秉承了自身悠久的艺术传统，还融汇了所在国家的民族艺术风格，发展和创立了很多新的艺术流派和创作风格，其中享誉世界的有意大利的肖像画家阿美迪欧·莫迪里阿尼、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卡米勒·毕沙罗、生于俄国后定居法国的犹太画家马克·夏加尔以及生于美国的英国肖像画家雅克·爱泼斯坦等。

《希伯来圣经》以其特有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在世界文学经典宝库中占有极重要的一席之地。犹太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对现代思想的形成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学领域，犹太作家和诗人也是硕果累累。很多犹太作家注重对犹太人生活经历的文学描述。幸免于纳粹大屠杀的瑞典诗人奈利·萨克斯以其诗作《飞翔与变形》赢得 1966 年的诺贝尔诗歌奖。曾三位美籍犹太作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1928 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埃里·韦塞尔，亦曾幸免于纳粹大屠杀并移居美国。他的作品如《夜晚》等往往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经历有关，作品极富震撼力，感人至深。1904 年生于波兰的伊萨·巴沙维·辛格侧重于中欧的依她（即犹太人）文化，维妙维肖地大量描写了犹太人的民俗与民间传说。作品有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等，获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15 年生于加拿大的扫罗·贝洛则注重对芝加哥和 20 世纪美国生活的描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犹太人，但重点并非描写其宗教生活。主要作品如《奥吉·玛琪历险记》等都是世人皆知的杰作，197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9. 崇尚教育与科学的犹太学人

教育、尤其是对年青人的教育，在犹太教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犹太教教育的传统重点一直是犹太宗教。在拉比犹太教时期，宗教学校注重犹太教法律的教学，侧重于《圣经》和《塔木德》。这类传统的宗教教育机构一直延续至 18 世纪，在此期间曾培养大批著名的法律人才。摩西·迈蒙尼德在法律、宗教及哲学方面的辉煌业绩，从根本上改变并提高了犹太人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在欧洲，一些犹太人逐渐步入知识界，某些人最后成了著名的领袖或学者，如曾任英国首相和保守党领袖的本杰明·迪斯累里、德国诗人兼政论家亨利·海涅、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他们于 1921

年和 1922 年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犹太人逐渐在欧洲的名牌高等学府树立起令人敬仰的学者形象。二次大战期间，很多欧洲的犹太血统的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从纳粹铁蹄下逃脱到美国，在那里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继续教学或从事科学研究，获得显赫成果和崇高声誉，迫使美国取消大学中针对犹太人的“限额制”，从此，凡是符合入学条件的犹太青年都将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在美国大学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使得犹太人涉足过去被排除在外的法律界、商界及其他待遇优越的职业界成为可能。

犹太人对科学和医学发展的贡献，一直是很重要的并且也是非常显著的。德国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明科夫斯基（1858—1931 年）开创了对糖尿病的研究，发现糖尿病系一种胰腺物质（后确认为荷尔蒙胰岛素）受到挤压所致。出生德国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年）堪称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以提出构成原子能开发基础的相对论而著称于世，爱因斯坦因此于 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因受德国纳粹迫害，于 1933 年定居美国。他曾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在 1952 年还曾被推举为以色列国总统，但是他谢绝了，他自认为不适合任此公职。美国医生及医学研究者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生于 1914 年）于 1953 年研制出治疗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试验性疫苗，而接种这一尚属试制阶段疫苗的首批对象便是索尔克、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种疫苗经证实是安全有效的，于 1955 年 4 月获准在美国推广应用。为此他荣膺很多奖励和荣誉，其中包括由总统艾森豪威尔颁发的总统嘉奖和国会金质勋章，但他拒收任何物质奖励，对改良疫苗的研究工作却一直是锲而不舍、孜孜探求。另一位美国医生巴鲁赫·撒姆尔·柏拉姆伯格（生于 1925 年）发现了一种可激发乙型肝炎抗体的抗原，其他研究人员根据他的这一发现研制出一种有效预防乙肝的疫苗。鉴于他在病毒性传染疾病的起因和传播方面的研究和发现，1976 年被授予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另一位美籍犹太人医学研究者罗塞利恩·雅洛（生于 1921 年）于次年又获得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他曾致力于揭示内分泌系统秘密的研究，并找到一种测量血液微量物质的方法——放射免疫测定法，它在科学与医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在确定糖尿病人血液中胰岛素缺乏测定中尤其有用。他的发现为糖尿病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还有很多著名的犹太科学家极大地发展了医学理论知识和治疗方法，如细菌学家奥古斯·冯·瓦色尔曼医生发现梅毒血清实验即瓦色尔曼氏反应；血液学与免疫学家保罗·埃利希医生发现最早的抗梅毒药物；阿尔弗雷德·赫斯发现维生素 C 可治疗坏血病；生物化学家、研究维生素的先驱卡西米尔·芬克首先使用维生素 B 治疗脚气；微生物学家阿尔伯特·萨宾医生研制出预防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

140. 犹太教对音乐、电影和戏剧的影响

《圣经》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以音乐、歌唱和舞蹈形式赞美上帝。长达 150 篇的《诗篇》便是犹太人的赞美诗歌集，据说大卫王还为其中很多诗篇谱曲。犹太教的音乐对西方音乐文化曾有重要影响。在欧洲音乐史上，格列哥里吟咏调曾长久不衰，而它的原型则来自于犹太教会堂中吟唱《诗篇》的独唱。很多现代作曲家、包括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都为《诗篇》和《希伯来圣经》的很多其他部分谱写了乐曲。德国作曲家韩德尔的代表作清唱剧《弥赛亚》，便是以希伯来先知的很多经典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在古代犹太

会堂音乐和宗教民间乐曲都是口头相传的，只有到了近代才被谱写在乐谱上。在 19 和 20 世纪期间，各类音乐书籍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有 1847 年出版的塞缪尔·诺姆鲍赫的三卷本歌曲集《以色列的宗教歌曲集》。而最广为流传的传统犹太宗教乐曲集为 10 卷本的《希伯来东方乐曲宝库》（1914—1932 年）。一些受欧洲文化传统影响的具有犹太血统的古典作曲家，曾创作了很多不朽的艺术精品。这些伟大的作曲家包括德国作曲家费力克斯·门德尔松和加克莫·梅耶贝尔、法国作曲家雅各·阿列维和雅各·奥芬巴赫、俄国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匈牙利作曲家卡尔·戈德马克、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德·勋伯格。当代犹太裔伟大的作曲家为美国作曲家阿龙·科普兰，他以交响乐《阿巴拉契亚山的春天》享誉世界乐坛。在众多的犹太裔作曲家中，厄奈斯特·布洛克堪称名副其实的犹太音乐作曲家。他的作品题材大多与会堂仪式乐曲有关，主要作品有《所罗门》、《以色列交响曲》等。

犹太裔作曲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乐器演奏家亦人才济济，当代世界著名的美国小提琴演奏家雅斯克·海费兹、弗里兹·克莱斯勒和伊萨卡·斯特恩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美国的钢琴演奏家阿瑟·鲁宾斯坦则以擅长演奏肖邦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享誉全球。在歌坛与乐坛的表演艺术家更是不乏其人，著名指挥家列奥纳德·伯恩斯坦的《西边的故事》成为百老汇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其他著名的音乐界人士还包括哈默斯坦父子、梅尔·托姆等人。

犹太艺术家在早期电影制造业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对电影表演艺术的发展做过杰出的贡献。好莱坞的梅特罗—高德温—梅耶电影制片厂便是由一群犹太人创办的。名震影坛的演员不胜枚举，如吉恩·怀尔德、吉瑞·刘易斯、托尼·兰德尔等。

犹太人极具喜剧表演天赋，犹太喜剧演员在卡茨基尔山区犹太人避暑胜地（即“罗宋汤”游乐区）的剧院和在纽约市的歌舞杂耍厅领衔表演，他们不仅自我嘲讽，而且还风趣地针砭美国社会的时弊。杰克·本尼和米尔顿·伯勒是美国广播和电视的明星人物。曾主演过喜剧影片《动物饼干》、《歌剧院之夜》、《大商店》等的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家族马克斯兄弟的影片，被列为美国喜剧的经典之作。当今的喜剧大明星则是伍迪·艾伦。

141. 犹太教——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和人生哲学

古代以色列人屡遭异族强权的劫掠和奴役，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他们靠宗教维系民族的生存，致使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生存紧密相连，逐渐演变为民族的认同。从犹太教经典的构成来看，其宗教神性信条较少，而人生教诲和宗教律法条文较多，这表明它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和现实生活的伦理道德。伴随历史的发展，犹太教早已演变为一种伦理道德生活方式，而以遵行“神的律法”为主要社会实践形式。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认为，犹太教并不重视宗教信条，它虽强调律法，但其实质是对人生的伦理态度，他自己从中深受影响的是热爱知识，热爱公义和个人的独立意识这三点。由此看来，犹太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哲学。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 年）是对中世纪哲学和思想发展贡献最突出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不仅撰写大量的希伯来法律论著，逻辑学、法学、医学、数学、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述亦颇丰。他试图论证哲学与宗教都指向同一真理，将犹太教哲学化，认为自然科学与犹太教律法都应研习。17 世纪

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犹太家庭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提出有关上帝、伦理和自然的极为激进的思想，为此被逐出犹太人众会。他否认上帝的超然存在，认为上帝即自然体系，上帝即无限；在道德论上，认为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础，人唯有了解自身行动的原因，主动采取行动时才是自由的，因此追求这种知识即品德。斯宾诺莎赞同迈蒙尼德的主张，认为圣经中违反自然规律的神迹都可解释为比喻，对知识落后的原始人有其社会、伦理与智力的需要，他对宗教神性信仰与自然科学知识之间的对立与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客观的、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普遍宗教说，其目的为使人按公义、仁爱行事。尽管斯宾诺莎未创立什么新的哲学流派，但他的著作特别是《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都对以后的哲学家和诗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8世纪之后，受欧洲工业革命的冲击，一些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德国犹太人也开展犹太启蒙运动，主张犹太人脱离宗教文化的孤立状态，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大潮。该运动的倡导人摩西·门德尔松（即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致力把犹太教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结合，促成了改革派犹太教的发展。门德尔松接受斯宾诺莎的主张，认为犹太教并无信条，而是信仰某些历史奇迹，遵行宗教律法，以图在世及过世后的幸福；认为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以其意志创世，目的在实现至善。门德尔松的宗教思想对德国思想界特别是康德都有重要影响。

现代犹太教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使犹太教的思想模式破旧立新。其代表人物为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是人生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获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卡尔·马克思则发展了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的基础。对西方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还有马丁·布伯和美国哲学家哈奈·阿伦特。

